

K250.3
1
2:4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A769759

E250.3
1
2:4

文化史料

丛刊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A769759

目 录

-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1)
- 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 黄廷复 孙敦恒(8)
-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郑天挺(26)
- 一代画师——忆吾师徐悲鸿 张安治(31)
- 田汉的童年** 田海男(56)
- 邵飘萍传略** 杜钟彬(88)
- 邵飘萍采访新闻轶事 宋北风(95)
- 苏曼殊的生平 黄忞华(98)
- 刘大白事迹述要 陈于德(104)
- 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 王庆华(113)
- 管翼贤与《实报》 冀以锐(124)
- 早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王道元(128)
-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上)** 清华大学校史组(135)
- 我所知道的京剧富连成科班 万子和(153)
- 中华书局历史点滴 徐秀成(171)
- 评剧的起源 徐存甫(177)
-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二)** 刘开渠(180)
- 我和明月社(下) 黎锦晖(206)
- 我的舞台生活(三) 袁世海(247)
- 《文化史料》第一辑至第三辑目录及第五辑篇目预告 (271)
-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

一、家世与婚事

梅先生名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生于天津。他们这个梅姓，据家谱上说，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到他这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近照
(在其北京住宅阳台上)

一代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他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他父亲虽考取了功名，但始终不得志，家境清苦，失意之下，常吸鸦片烟。

梅先生一九〇九年考取清华第一批官费留美。十月到美国，次年入美国吴士脱工业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五年后回国。出国前，家里给他定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

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

说起梅先生和我的婚事，还得先说说我的“家世”。我们韩家原籍安徽。前十代搬到天津。梅先生的叔祖和我祖父是世交，因此，我们彼此熟悉。我父亲与严修（严范孙）先生也是世交。我们家里房子不够住，父亲向严老借房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我们弟兄姐妹七人，都在严老门下读书，是严老培养起来的。我十三岁上幼稚师范，十六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八年半。

再说梅先生刚回国时曾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当过干事。当时我在女青年会当学生干事。我曾去邀请过梅先生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后来直到在清华任教的几年中，有替他保媒说亲的，他概不为所动。据他兄弟说：“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直到他快三十岁的时候，经严老先生从中介绍，始与我缔结婚约。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先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我们于一九一八年订婚，一九一九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

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

二、家庭生活

婚后，我在家当家庭妇女。八年半中生六个孩子。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孩子们带大。梅先生在家里很少说话。关于公事，更是一句也没有。对孩子们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他们挑吃。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盘里的菜都吃完，喜欢吃的，爸爸再给你们添，不喜欢的就不给了……”孩子们觉得条件不高，就把分给的菜都吃掉，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适应后来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在清华大学旁听了英文、日文和逻辑，前后共两年。那时我已四十岁了。后来在国外，甚至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还在夜校念英文。梅先生对我像对我们的孩子一样，十分民主，愿意工作就让你工作，愿意念书就让你念书。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一九三八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与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

备其它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为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我把卖“定胜糕”得的钱，给两个大孩子每人六十元，读中学的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也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工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抗战胜利后，三校同人准备迁回京津。做过零工的教授夫人们，又在昆明街头摆起“地摊”，处理用不着的和带不走的东西，有旧衣、椅套、毯子和各种日用品。虽然还是“摆地摊”卖东西，但抗战胜利了，比起当年做糕时的情景，真是别有一番喜悦在心头了。

胜利回北京时，我带大女儿祖彬和女婿经上海到北京。后来女婿又取道上海到美国去。当时祖彬留在清华大学，任英文助教。

三、离开大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征集青年学生担任军事翻译员时，西南联大很多学生响应了。我的儿子祖彦也报名参加了。当时他在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成绩不错。老师认为他放弃学业从军很可惜，可是梅先生却没有阻止他。梅先生对自己的孩子，也像对他的学生一样，从不勉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而是让他们自己去选择道路。这样，祖彦在译员训练班受训期满后，又在云南边境战地当了一年随军翻译，以后又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留在美国念书了。

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梅先生飞抵纽约。以后，在华美协进社内设立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一九五五年台湾请他去当“教育部长”，并筹建新竹清华原子反应堆。十一月梅先生赴台。

我没跟他去台湾，而是自己留在纽约。我是一九五一年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去到美国洛杉矶，又转往纽约的。六十二岁时，我开始找工作。我在衣帽工厂里做过工，在首饰商店里卖过货，还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最后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我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

一九六〇年梅先生患骨癌病重，我赶到台湾去看他。他住在台大医院。我白天去病房里陪护，晚上住在设在台北的清华办事处。这样，我陪了他两年。

梅先生病危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劝他写一个遗嘱。他不作

答，显得有些不高兴。胡先生把此事告诉我，我说请贻宝弟劝劝他，因为他平时最听这个兄弟的话。但经贻宝劝说，他也没采纳。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先生在台大医院逝世。

梅先生在台湾病时的治疗费和住院费都很高，台湾当局的“教育部”和新竹清华大学都不能开支这笔费用，于是先记账。他逝世后，治疗费、住院费以及治丧费都从前几年他七十寿辰时清华在美国、香港和台湾校友赠的寿仪里开支。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先生在台北医院中
(后左夫人韩咏华，右女儿梅祖彬)

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情况下（当时我也在场）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后来我想，他没有个人的财产，所以也无须写什么遗嘱。

四、关于回国

我的儿子祖彦，于一九五四年取道巴黎，通过亲友的帮助，在人民政府安排和资助下，辗转回国。

至于梅先生，记得当他常来常往于美、台之间的那段时间，国内有一位朋友（教授）曾写信请他回国。看了那封信后我问梅先生：“你看共产党怎么样？”他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但最终他也没有回来。据我想，他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顾及面子，觉得不好行动。

最后，我自己回国来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教育界很多同人都回国来访问。我想，“大家都回去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看看？”梅先生故去以后，我自己没有立家，而是跟着两个女儿过。家事不多，也没有什么负担，并且儿女之中还有在国内工作的，我也想看看他们。这样，一九七四年夏，我就回国来探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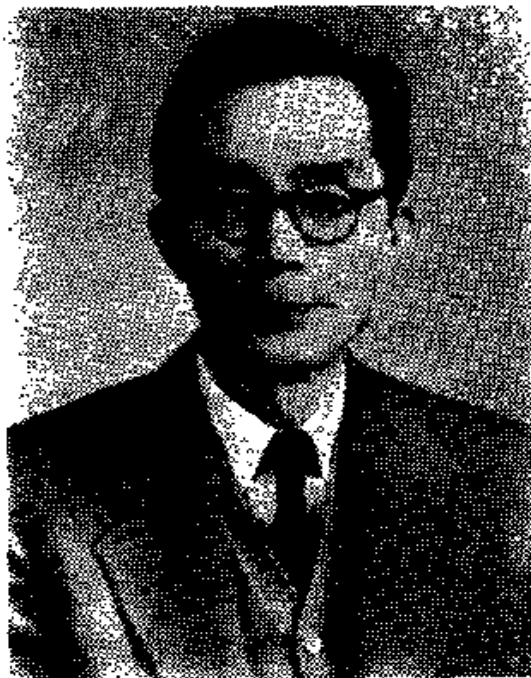
这次回国探亲，见到了无数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而且有幸能和邓颖超同志会面。在会见时，我表示了愿意回国定居的想法，当即得到了邓大姐的支持。因此，在那次返回美国后，我就向驻美联络处提出回国定居的申请。

一九七七年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申请得到了批准。当年夏天，就重新回到了祖国。我回国后，政府给了我优厚的生活待遇，还特邀我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来，住在英、美的几个女儿女婿们，也曾先后回来探望，和我团聚。我的晚年生活可说是很美满的。只因年纪过高，未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总是深觉遗憾。

（一九八二年四月廿七日于北京）

梅贻琦先生与清华大学

黄延复 孙敦恒



梅贻琦先生像

梅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曾祖汝钰、祖茂先，父臣（字伯忱）。天津梅族最初是于明成祖时由江苏武进北迁来驻防天津卫的，到了清朝末叶，家道中落。庚子之乱，梅贻琦曾随父母至保定避难，乱后返天津时家产已被洗劫一空。

一九〇四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改名南开学校）。梅贻琦是年十五岁，入该校第一班就读，成绩优异，为张伯苓氏的得意门生。一九〇八年毕业，名列第一，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翌年，清政府“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一批庚款游美学生，梅贻琦以平均七十五分的成绩考中（名列第六）。一九〇九年十月赴美，翌

年春入吴士脱工业大学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习电机专业。在校期间，勤学奋勉，曾把撙节下来的“膏火”聚少成多，寄回贴补家用。一九一四年，梅贻琦从吴士脱大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因其在校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一种奖励学术上有成就的学生的组织）。在美期间，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协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务。一九一五年春，梅贻琦回国。初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书记。九月，应清华学校之聘来校任教。初教数学、英文，后专教物理、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因他学识广博，曾被公认为“科学各教授的首领”。除上述正课外，还主讲过测量、工程事业（土木、机械，开矿、电机）、运输等副课，还讲演过《洋灰制造法》、《矿地设备》、《电子学原理及X光射线》、《爱因斯坦学说》等专题。在此期间，他还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热情和志趣。到校后四个月（一九一六年春）他即与其他教师一起主持高二级关于教育问题的辩论会，辩题是《对于现在之中国，雅典（普通）教育方针较斯巴达（人材）教育方针为合宜》。他还当选为成府贫民小学董事。此后直到一九二六年他任清华教务长止，先后担任过“唯真学会”顾问、清华童子军团长、军长、总司令以及全国童子军理事长、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高等科英文、文学辩论会委员、西文编订课程委员会委员、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大一课程工业部主席、改革校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基金调查委员会委员、学程委员会委员、建校十二周年纪念委员会委员长、华员大学会书记及交际组主任、《周刊》特载栏编辑、德育委员会委员、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新校委会议教员代表、大学教育方针

委员会委员、学校改组委员会委员等。在校外，他曾与陶行知、曹云祥（清华学校校长）等一起组织“中国科学教育促进研究会”，任管理部书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利用休息时间再次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物理，并曾一度任纽约大学讲师。一九二二年“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学校任教。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一九二六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学校由“挽张”而掀起一场“改进校务”的浪潮，成果之一是从这时起，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直接指派，而由教授会公举。四月，梅贻琦作为物理系的首席教授而被公举为改制后的首任教务长。在两年的教务长任内，他初步显示出其办学才略。他着手把新建的大学部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真正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形。清华之设大学部，早在一九一六年周诒春校长任内即有拟议，到一九二五年（曹云祥校长任内）始行实现。但初设之大学部各方面都显得不完备和不正规，学制上只笼统地划分普通科和专门科两科，学习年限各定为二年或三年，学生们认为培养目标不明确，不文不理，与国内一般大学亦不相衔接。梅贻琦任教务长后，首先把两科制改成学系制，即结合社会需要和学校特点，设立国文、西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农业、工程、数学、哲学、社会、体育、东方语言、音乐等十七个学系，并把全校教师按学历与专长分为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分别部署各系，制定了新的组织大纲和学程大纲。这期间，他还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他在大学教育方面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针。

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入控北京，清华学校亦被

接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随同奉系军阀的倒台而辞职，南京政府电委教务长梅贻琦暂代校长职务。八月，罗家伦受命接任清华大学校长。十一月，因清华的驻美机构——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财务上发生混乱，梅贻琦因素称公正廉洁，被派赴美接任留美监督一职。罗家伦就职不久，即以种种表现失去师生的信任。一九三〇年五月，学校掀起一场声势颇大的“驱罗”风潮，罗家伦被迫于五月二十二日辞职离校。这时，在“中原大战”中暂时得势的阎锡山，乘机想安插乔万选（一九一九级清华校友，晋籍）充清华校长，上任时被师生拒于校门之外，清华再一次出现长期无校长的局面（这一次是连续十一个月）。一九三一年四月，当时兼部长的蒋介石亲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吴南轩为清华校长。吴南轩四月到校，五月即爆发“驱吴”运动。五月廿八日，清华教授会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唯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员为雇员，”要求教育部“另简贤能”，并发表声明说：“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期与清华脱离关系”。学生自治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由全体同学整队至校长室，请其即时离校。”吴南轩携带清华印鉴逃往城内使馆区“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吴南轩终于被迫于七月辞职离校。学生会随即发表清华校长人选的五条标准：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吴南轩走后，当时教育部委托清华地理系教授翁文灏代理校务，翁又常“因事赴京”，便转请当时任物理系教授的叶企孙代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时局动荡，学校事务更趋复杂，翁、叶迭呈教育部请辞，叶企孙在一份电文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职务。”就这样，经过一再周折和淘选，一位合格的，能为各方面乐于接受的清华校长终于“应运而生”，这就是梅贻琦。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当时教育部令梅贻琦接任清华校长，他交代完留美监督处事务后，十一月末返国，十二月三日到校视事。当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从此，他信守“上承政府当局之指导，内有全校同仁之辅助，外获校友诸君之策励”的治校方针，终于彻底结束了旧清华迭次发生的校长地位不稳的局面，一直任职至一九四八年为止。一九四八年，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清华年刊”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民国二十年，当国难临头的时候，十一月国府任命梅贻琦先生为清华校长，‘奉命于危难之间’辛苦经营，使清华能在国家民族大动荡的十七年中保存元气，有所贡献，皆先生之功。”

梅贻琦接任校长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个多月，当时校内校外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作为大学校长，首先必须在这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十二月三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说：“中国现在的确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要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即当“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之际，他在学校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说：“……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

对敌，何等令人失望。但东北虽亡，东北人心未死，东北义勇军随地进展活动，不时抵抗奋斗，使敌人时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在，则东北或将不致终亡。”这期间，每有机会，他必告诫学生“不忘国难”，当时全校性集会的内容，几乎全谈的是抗日问题、东北问题以及日本问题等等。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二日，他亲自介绍中文系教授郑振铎先生讲《一·二八抗战》，郑先生在演说中激昂地说：“我们要努力准备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最艰苦的最光荣的最有希望的一次大战，我们要迎上去战！战！战！胜利一定在我们的一边！”这次演说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抗战救国的激情。一九三六年四月，梅贻琦针对当时某些学校领导人的逃跑主义思想坚定地说：“本校对于应付时局之态度，可以一言明之，即尽力维持，决不南迁是也。夫国难已至此，然吾人决不可自坏其心理上之长城。大局虽不可知，然而吾人自己之职责，决不可放弃，万一不幸，本校亦当在此‘水木清华’园中，上其‘最后一课’，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但梅贻琦对在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却有自己的主张。他一开始就说：“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又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他的这种救国观必然导致他同当时革命的爱国激流发生冲突。“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就曾以“触犯校规”而开除过学运领袖如黄诚等几名同学，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则在民族民主革命战场上为国捐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清华大学，一向被校友们公认为

旧清华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清华大学在大动荡的局面下，反而能在教学、科研、学风、人才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成果，这是与梅贻琦的努力分不开的。略举数点如下：

一、师资队伍的发展和巩固

清华大学的师资队伍，远在一九二六年梅贻琦任教务长时，就已经初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国文系的王国维、朱自清、杨树达；西文系的王文星、吴宓；物理系的梅贻琦、叶企孙、赵忠尧；化学系的高崇熙、赵学海；生物系的刘崇乐、钱崇澍、虞振镛；历史系的梁启超、刘崇缙、钱端升；数学系的熊庆来、郑之蕃；哲学系的金岳霖、梁启超、赵元任；社会系的陈达；体育系的马约翰、郝更生；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梅贻琦作校长后，首先是“选贤与能，人尽其用”，把全校教师作了统一部署，然后又尽可能罗致国内外学者名流或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如庄前鼎、刘仙洲、雷海宗、闻一多、章名涛、李仪祉、倪俊、顾毓琇、李郁英、陶葆楷、赵访熊、张荫麟、吴晗、潘光旦、任之恭、段学复、温纳（美籍）、华敦德（美籍）哈达玛（法籍）等，都是他任校长后聘到学校来的。在理论上，梅贻琦高度估计教师的主导地位。长校第一天，他就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他关于教师地位的著名论点：“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反复强调说：“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也图之至极也。”

二、实行“教授治校”（亦称“民主治校”）。他对校事取“无为而治”，或“吾从众”的方针。他的这种谦逊态度得到教

授们一致称颂。名教授张子高曾在一篇文章里，描绘过他的领导方法：“校长分寄其任于诸教授，于各执事；诸教授各执事各尽其责于诸学子，至于因革损益之大端，猝然非常之异变，校长则于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分别与同人共商讨之。每有大计，同人既本其识见之所可及，尽其意量而出之，时或反复辩难，势若不相下，公则从容审夺其间，定其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见张子高一九四八年手稿）。朱自清写道：“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得的。”“他（梅贻琦）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朱自清又说：“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他并不是没有主见的，只看抗战以来，教授会和评议会不得已而暂时停顿的时候，他的种种措施，便可以知道。”（见《清华校友通讯》六卷九期 一九四〇年十月）。

三、在全国工程教育领域里占有相当地位的清华工学院，是梅贻琦一手建立起来的。他一九三一年来校就职，一九三二年二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扩展”（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在纪念周上的讲话）。旋即呈准当时教育部，在原有土木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而组成工学院。并从一九三四年夏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等。这既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前身，又是旧中国航空学科的肇始。他为了

建立工学院的需要，还陆续建成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工程馆、水利实验室、发电厂等校舍并添置了当时先进的设备，先后聘请了庄前鼎、王士绰、刘仙洲、李辑祥、殷祖澜、史久荣、殷文友、华敦德（以上机械、航空），倪俊、顾毓琇、章名涛、任之恭、李郁荣、赵友民、温纳（以上电机），李仪祉、蔡方荫、张泽熙、陶葆楷、张任、张润田（以上土木、水利）等国内外工程界名流，为清华工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创设了可观的规模。

四、开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的先河。一九三三年，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请来冯卡门（Th. von Karman，航空），维纳（Norbert Wiener，电机、数学）、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数学），华敦德（Frank L. Wallendorf，航空），郎之万（Longevin，物理），狄拉克（P.A.M. Dirac，物理）……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五、扩充学术出版物。除加强《清华学报》等原有刊物外，又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等，这些刊物至今仍是学术界重要文献。

六、创办“特种研究事业”。一九三四年十月，梅贻琦函请教育部同意，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国情普查、金属二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研究的项目和成果，在我国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三校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昆明，三校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蒋梦麟

(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等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梅贻琦任主席。联大成立后,蒋、张二人先后去重庆政府任职,梅贻琦则始终坚守在学校主持校务。师生都亲切地称他为梅常委。一九四一年,梅贻琦在一次会上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象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偏安”八年,梅贻琦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办学才能,使联大师生能够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的三校师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民族保存并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梅贻琦开始在《清华校友通讯》上连续(每年一次)发表《抗战期中之清华》一题,为抗战期间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情况,留下了系统的记述。

一九四〇年九月,梅贻琦服务母校满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师生特为他开了“梅校长任教母校二十五周年公祝会”,从政界要人到许多著名学者教授都用题词、贺信、贺电、讲演的方式,对他说了大量赞扬的话。他留学美国时的学校,吴士脱工业大学乘此时机授予他荣誉工科博士的学位。就在这一片褒扬声中,梅贻琦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辞,这篇答辞象一面镜子,映出了他为人的谦逊:

“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都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

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作一种奖励的表示。

“诸位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学校服务二十五年，应予鼓励。其实在清华服务达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十四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马约翰先生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清华近些年之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还有这很多位老同事，同心合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角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一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护后拥，‘象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除了很少数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而已。……”

一九四一年四月，梅贻琦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之机，针对政府当局“目光短浅”的教育方针，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这篇文章是梅贻琦关于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思想的系统表达。这篇文章表明，梅贻琦大学教育观核心是“通才教育”，但他的“通才教育”并不是一般西方“通才教育”的翻版，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综合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儒家《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们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化民成

俗，改造社会)的任务。所以，大学教育不应该着眼于某一门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着眼于便于接受更高深专门学问的“通识”。他写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他在分析了在短短四年大学过程中，并不能收得“通专并重”之效之后说：“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大学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大学教育不把重点放在培养专门人才上，从哪里去找建设事业的人材呢？这是梅贻琦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成“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他列举大学之研究院、各种高级或中等专门学校，特别是各种社会事业本身，……都可以充分担负起训练“专才”的任务。梅贻琦深恐别人片面理解他的“通才论”，因而曾多次进行解释：“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按“通才教育”其文为 Liberal Education）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放荡主义（libertinism）不同，假自由主义之名，而行放荡之实者，斯病矣”（见《大学一解》）

“报告时特将Liberilism之真义及众人对于自由主义之误解加以说明，亦以纠正外间之错误观念也”。（见梅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日记）。他还曾引用宋代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梅贻琦治校，始终注意廉洁职守，精简节约，讲求效率。他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在他做校长任内，从不讲排场，摆阔气，尽量使每一文钱都用在对学校发展有利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清华向来有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象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大多数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时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在梅贻琦长校期间，学校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少到较低限度。一般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总保持在2:1上下，例如一九三五年教学人员（包括极少数技术员、练习生）二九七人，纯行政人员只有一二〇人（不包括工警，但其中有三十四人为图书馆工作人员）。而一九四六年复员的时候，学校有学生二千三百余人，教师三百八十余人，职工约一百六十人，工警约一百八十人，教师学生之比约1:6，教学人员（包括学生）与非教学人员之比则为7:1。抗战期间，绝大多数的系都不设办公室，系务通常采取碰头会的方式来处理。直到一九四八年一个工学院院长室只有一个行政人员和—个校工。学校曾有几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一、包括校长本人在内，一律是“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二、不论教职员工，除学校规定的例假外，一般不得请假；如必须请假，则要自行请人代职，报酬即由本人工资内偿付。办事人员一般都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克尽职守。西南联大期间，经常发生空袭警报。有一次，他到办公室发现一位办事人员在“预行警报”后即离开办公室，便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九点有预行警报，到办

公室后，见办事员有先自离去者（应）严預告诫，”事后他果然同蒋梦麟一起“召集各处、组职员稍加训勉，于工作效率或有增进。”梅贻琦办事向来秉正。在学校，他把自己的儿子与所有同学摆在平等地位，“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儿子。”在西南联大时，他一度兼任教务长，有一次一位四年级的学生选修十二个学分却有六个不及格，照章必须退学。这个同学去找他，他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除看。”又有一次，有一个清华老校友向他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取进清华，他的回答是：“我自己的女儿也没考进清华。”又有一次，一位平时与他关系很好的名教授，因为“部聘赴美”向梅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把家眷安置在校内，一是要求录取自己的女儿进清华。梅也没有答应。梅贻琦为人淡泊宁静，视名利为身外物。他本人布衣简食，除必要的公事外，经常留在学校，厌恶不必要的应酬，他很注意节省公家的每一文钱，现在尚保存着他办的许多公事或讲话提纲，都是用废纸头起草的。抗战期间，他同教授们一样，住在租用的民房里，阶沿上摆几把椅子就是“客厅”。那时校舍分散，交通不便，他常常因公步行一二十里路。他常以孔子在“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事迹自勉，并勉励教师们坚持教育事业。

抗战期间的中国社会，除解放区外，仍存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从梅贻琦的几则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现象的态度。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Whisky；烟有State

Express, 饮食之余, 不禁内愧。”

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七日：“晚赴×××夫妇饭，约主客为美国各部高级武官，男女宾共四五十人，酒肴均感丰盛，或太费矣”。

一九四三年二月廿八日：“晚6时，×××令妹×××与×××结婚，仍由余证婚，喜筵坐客共六七十人，恐须费万元左右，实则可以省也”。

从下列两则日记中，可以看出梅贻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早九点开始，……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对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返蓝田，四点十分船开，船上有船夫八人，皆年青力壮身体矫健可爱，而掌舵则为一老者，年约五十上下，神采奕奕，左瞻右顾，指挥若定，吾辈坐舱中外望，既玩江景，且羨此般人健康之生活，使自家精神亦为之一振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梅贻琦以“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开始组织清华师生北上。十一月廿七日，梅贻琦偕陈岱荪，施嘉炆等飞抵北平视察清华故园。十二月初，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学校以加急电报召他回昆明。十二月廿四日，梅在昆明就学潮事招待记者，阐述事件真像，内有“本校认为，学生在校内集会，过去情形良好，且当日上午已与当局说明，似无劝阻之必要”等语，力斥便衣暴徒行凶杀人等暴行。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大”结束。七月间一多先生遭刺牺牲。梅贻琦亲自主持组织丧葬抚恤委员会，

并多次筹划一多先生家属的抚恤问题。九月六日离昆明北上，十月又指派朱自清组成第一个“闻一多遗稿整理委员会。”

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梅贻琦即拟定《本校复员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十一月，又以《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与留学政策》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一九四六年四月及一九四七年四月，分别发表《复员期中之清华》和《复员后之清华》两文。一九四八年三月，又发表《工业化前途的人才问题》等等。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梅贻琦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战后发展教育事业的观点和设想。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热中于内战，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根本无心亦无力发展教育，因此，在这三年中，除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运动外，其他校事方面可说是一无所获。但为了理想中的发展需要，他在战后三年又聘来一大批优秀教师。总数近三百名，其中包括李广田、钱伟长、梁思成、李丕济、张维、常迺，高名凯、闵嗣鹤、钱三强……等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钱学森、林家翘本也被他物中，聘书已下，薪金亦已定，但因故未到校。

这一时期，梅贻琦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仍本其不得罪当局，但亦力争不使清华师生受到残害的原则尽力斡旋。一九四八年“八一五”大逮捕时，他在八月二十日的紧急教务会议上报告说：“（交涉结果）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应请协力劝告学生者，勿抗拒。不到法庭者只好设法离校”。“八一五”大逮捕期间，进步教授吴晗已被反动派列上黑名单。有一天，梅贻琦同其他校领导成员找吴晗谈话说：“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

（引自吴晗《清华杂忆》载，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三日《光明日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形势急转直下，北平解放已在旦夕，梅贻琦事前似已做好出走的安排。他在城里设了一个保管小组，把学校重要帐目及贵重物资都转移到城里。（这期间，亦曾有学生游行挽留梅校长，吴晗等几位清华校友亦曾从解放区写信给他祝寿，并挽留他不要离校）。十二月十四日，北平围城开始，梅贻琦恰好于这一天下午四时半进城，被阻于城里未归。廿一日，即携带清华基金帐目搭乘国民党派来北平“迎接重要学人”的飞机飞往南京。廿三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又以全体同学名义发表《挽留梅校长》函件，但为时已晚。同日，孙科内阁发表梅贻琦为教育部长的任令，梅“坚辞不就”，但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九年三月离开，六月先后经香港、瑞士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转飞美国。赴美后常驻纽约。一九五〇年起，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在美机构）的常务董事。一九五一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在此期间，他还曾乘原清华大学经济系萧家魁教授回国之机，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的函件，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根据萧先生来信说：“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交给学校，后来遗失”）。而解放初期，北京清华大学确曾收到过由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估计是梅贻琦所为。

一九五五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亲自“跑遍全岛，”觅得新竹校址。一九五六年二月，赴东京参加“联教组织”分区会议。三月，赴美聘教授及筹拨基金利息等事务，七月

返台。一九五七年三月，赴东京及纽约参加原子能展览及讨论会，五月返台。十一月，赴美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一九五八年七月，任台湾“教育部长”（后因病辞掉）兼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五九年起，兼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六〇年，因患癌症入台北大学医院。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原子反应堆由他在病榻上按钮启动运转。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逝世。在他病危期间，有一个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死后由秘书封存。后来由有关人员会同启封，全是有关清华基金会的帐目，一无短缺，与会者议决交孟治接管。

梅贻琦先生生前清朴自奉，死后无任何财产留下，亦未留遗嘱。据他的夫人韩咏华女士说，他死前的住院、医疗费用，死后的安葬费，绝大多数是由清华校友捐助的。梅贻琦先生死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新竹清华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墓的左侧建有一座“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其中包括“杏梅”二八七株，梅花二四一株，如今早以成林，曰“梅林”。

参 考 资 料

一、梅贻宝：《七八自述——大学教育五十年》载台湾版《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一期。关于梅氏家族及梅贻琦本人的情况，梅贻宝还撰有《天津梅氏的来历》（载台湾版《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四期）以及《五月十九日念五哥》（载台湾版《清华校友通讯》一九六五年四月号）等文。

二、清华校史资料。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郑 天 挺

我和梅贻琦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文法学院设在南岳），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一九三八年二月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在蒙自一学期）。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部中不再派代表，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三校和联大师生联合上课。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三位处长和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常委会一次。除训导长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师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学生学号仍旧，但按校名分别加P·T·N字于前，以避重复。联大学生用A字。四种符号对内对外全无差别。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处，各有其校务会议，各有其院长、系主任和教务长（北大仍称课业长）、秘书长。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三校旧生的注册、选课和毕业，由三校决定。三校各

设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不属联大范围。联大因教学需要，除了三校参加的人员外，还聘有联大教授和其他教学人员。联大和三校的教职员工同样待遇。联大有教授会，联大和三校教授全体参加。除重大事件外，大学毕业要经教授会通过。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前后八年。

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还在昆明上课一年，除了个别有任务的几个人复员外，全部留在昆明，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一九四一年四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

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劳。就在一九三七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在故宫。得到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同意，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声。

抗战期间，物价飞腾，供应缺困，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维持到胜利。这又是一樁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联大和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成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个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未疾言厉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一九三九年十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到呈贡作了三天短期休假。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又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耽搁了三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火性发过，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得罗气全消了。这两次旅行，使我加深了对梅先生的认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有风趣。他谈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不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上左厢（大约是北房），和梅祖彦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大和三校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一代画师

——忆吾师徐悲鸿

张安治

一、南京时期

一九二八年春季，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画室里，同学们正在欢迎一位新来的教授——徐悲鸿先生。他中等身材，黑发浓厚，目光炯炯，打着在法国艺术家中流行的大领结。他用略带江南口音的国语，庄重而概括地要求大家重视素描基础的锻炼，强调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他每周来校上课三个上午，在个别指导中，极为敏锐地指出学生作业的缺点，并用果断而简洁的几笔纠正学生的错误，击中要害，使人心悦诚服。不象当时一般教师常用相当长的时间为一个学生改画。那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既占用了学生自己实践的时间，又使多数人在课上得不到指导。徐先生还时常带来他自己的作品或西方绘画的复制品，陈列在画室中供同学观摩。并不时对某一西方重要画派或某几位画家及某些作品作重点的介绍。对讲授的一些主要内容，在一段时期以后，他常向学生提问，以考查其理解的程度。徐先生的要求严格，学生获益非浅，因而对他十分尊敬。

就在这一年暑假中，徐先生又被任命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

院长。他到北平上任不久学校就闹风潮，所以一学期未完，他就毅然辞去院长职务，重回南京中大任教。直到一九三一年夏我毕业离开学校为止的这一段时期，他一直专心于教学工作，并担任了艺术系主任，在学生中威望很高。他十分勤奋，把三个半天以外的时间，几乎都用于创作。他的创作活动当时也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是继续完成两幅大油画《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一方面从事国画创作。关于《田横五百士》，据徐先生谈：他是从蒋剑人所作的一首七律得到启发，原诗是“五百英雄尽国殇，海云岛树郁苍苍。身无尺寸齐难霸，死有头颅汉不王。西楚天亡项羽纪，南蛮春老尉陀乡。韩彭地下羞相见，烹狗功名事可伤！”所以画面描绘的是在浓郁的海岛丛林前，田横以宁死誓不投降的决心和追随他的五百壮士告别。整个情调热烈而悲壮，徐先生在国难日亟的时候用他的画笔来鼓舞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徯我后》的形象表现的是一群农民正在因久旱而龟裂的土地上望雨。全画的格调质朴、深沉而含蓄。画题是来自古诗“徯我后，后来其苏！”所以用“徯我后”作为画的题目，就说明作者的主题不仅在于大旱望雨，更有渴望社会变革的深刻含义。两幅画大致同时动手，但《田横五百士》在一九三〇年完工，《徯我后》要晚两、三年才完成。

创作这两幅具有时代意义的巨幅油画的“画室”也颇不平常。在中大东北角有十几间极简陋的平房，为学生中长期病号休养之所。因为当时中大的教职员宿舍很紧张，不可能有宽敞的画室，所以学校就把这一排平房最东端的两间，拨给徐先生使用。其中的一间开了“天窗”，使来自上方的光线较充足，有利于作画。另一间放了书架、书箱和一张小铁床。每间宽约三米，长约

四、五米。南面一门，北面一窗，东西都是墙壁。在他的画室中，两面墙勉强安放了两张大油画。窗前有一张小桌和两、三张椅凳，画具摆满了大部分地面。我们去看徐先生作画时，必须时时留心脚下的东西。这里不可能有足够的退步，从较远的距离来观察欣赏大画。另一间原是为了存放他从欧洲带回的大量书籍和名画复制品并供他临时休息之用的。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蒋兆和先生就曾借这间书房为宿舍；一九三一年暑假，我在中大毕业后，还留在学校进修一段时期，蒋先生那时已去北平，徐先生即让我住在此室。我离开以后，刘汝醴、杨剑侯诸同学也曾住此，有时甚至同时住两人。住在那儿，我们便有更多的机会看徐先生作画，能够经常接近室内的图书，使我们获益非浅。

徐先生同时也在他狭窄的寓所进行国画的创作。他的小客厅也就是他的画室。那张兼作画案的书桌也不大，画较大幅的作品时，起稿和观察全幅只好临时用图钉把画张钉在壁面，画时常把画铺在地面，弯着腰大笔挥洒，在修改局部时，又常跪在地上细心修饰。他的中国画早有家学渊源，赴法国留学前在上海、北平的时期又扩大了眼界，结交了不少优秀画家，看到了许多公私收藏。在欧洲虽主要钻研西画，但对英、法、德、比各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画也十分注意，收集其复制品不遗余力。致力于中国画的复兴和吸取、介绍西方绘画的精华，他认为这是在一个大目标下的两个方面。同时他又告诉我们国画和油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各有特长，各有其光辉的传统，决不能互相代替。他认为现代中国画的缺陷在于精确的造形能力不如西方，因此难于创造表现现代生活的人物画。有些人丢掉了中国画的笔墨表现能力和重气韵、意境等特色，简单地用中国画工具作水彩画而称之为“中西

合璧”他说：“那只是‘中西合瓦’！”他的国画作品笔法刚健，泼墨淋漓，对画中人物或动物形象特征的要求都一丝不苟。对人物他不仅注意刻划其典型性格和精神状态，也要求各部分比例的正确和动态的自然，特别是手和脚的部分。他指出：古人多写神仙、帝王、官僚或文人，可以把手脚深藏在袍袖之中，在画渔父、樵夫不得不露出手臂腿足时就未免捉襟见肘；现代画家已有条件也必须加以改进。他笔下的骏马、雄狮、水牛和鸡、鸭、鹰、猫等都决不是前人画本的再现，在技法上有所创造。他对这些动物的形态习性，都作过很多速写和长期的观察研究，所以他的中国画使人耳目一新。尽管也还有极少数保守倾向浓厚的老画家说“这不是中国画”，但他的作品已迅速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并得到赞扬。在他的马、狮、雄鸡、懒猫等画幅上，结合题句，明确地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当时腐朽统治的不满。而他的画面生动的形象与豪放而又严谨的风格，能使欣赏者心情振奋，关心国家的命运。这些动物画具有远远超出其题材本身的深刻含义。

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这短暂的六、七年间，他的中国画的技法风格有明显的发展。例如回国初期所画的《牧童与牛》，虽笔法洒脱，颇见功力，受任伯年（一八四〇——一八九六）的影响非常显著。一九二八年所作的《立狮》也还是用笔飞动而锋芒毕露。至一九三〇年所画的《伏狮》和《立马》等，笔法是豪放与朴质相结合，墨色浑澹，形成了一种雄健而又凝重的格调，也可以说在技法上更加成熟，创造了他自己的风格。一九三二年所作的《野渡》也体现了这种新画风。着笔不多，毫无堆砌，意境深沉而含蓄。

一九三一年他在国画方面完成了一件大幅创作《九方皋》。

这幅画的初稿只有九方皋和一个马夫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经过三、四次补充重画，最后完成的横幅（138×351公分）增加了三位马夫和各色马三匹并有坡树背景，使全画气象更为开阔宏伟。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大画也同样创作于丹凤街中大宿舍的那一间小会客室里。

徐先生从来不拒绝学生到他家中访问。他正在作画时你可以站在旁边看，同时作简短的对话。遇到他翻书、看参考品时也是好机会，他常常随手对一些好作品或某古代的大师作扼要而热情的介绍。如果有的复制品不止一张，他当时就慷慨赠送。一九三二年，傅厚冈由朋友们资助建造的小楼完工了。楼下左侧是一个会客室连接着餐室，右侧是一个有屋顶光的宽敞的画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和晚间，他的一些老朋友如宗白华、谢寿康、华林、盛成、郭有守先生等和与他接近较多的学生们，常到他的画室访问座谈，有点象法国流行的文艺沙龙，但更为自然，无虚伪的交际形式，也无需事前的邀请或约定。来得早的人常被留下同进晚餐。在这样的晚会中，话题大多集中于中外的文艺活动，我们年青人虽一般只能旁听，也扩大了视野，补充了一些课堂中所学不到的知识。

自徐先生到中大后，每学期都组织旅行写生或远足。他主张学生不能仅仅在画室画石膏模型，作人体或静物写生，还必须多接触社会和大自然，对社会和自然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培养热爱祖国和热爱生活的情感。他几乎每一个春天都要和我们去游钟山明陵，观赏陵前翁仲，湖畔桃花和连冈新绿。秋季则同登栖霞山，沉醉于遍山红叶和远方如带的长江。游镇江焦山时和我们同住“枕江阁”，晚间灭灯凭窗看月影摇江，纵谈今古。白天登

山作画并访曾落水的名碑“瘞鹤铭”。徐先生对它极为欣赏，向我们热情介绍。他曾在绝壁的险径上作一中幅油画，从清丽的丛林中透视澄静的江流，专心致志地画了几小时，每一挺秀的小枝也不轻易放过。这是他油画风景的代表作之一。一九三一年春，我们这一班就要毕业，大家很想去北平参观，但学校给的经费不够，于是本班同学组织了一次筹集参观经费的画展。徐先生大力支持，亲自陪李济深先生来参观画展并买了画。第二天他又写信告诉我们，李先生对画展颇为称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这一次距现在已近五十年的北平之行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时虽已筹得一点钱，但学生们只能坐三等车，没有卧铺。车开不久，我就晕车呕吐不止，当徐先生知道这情况后，就回卧车和他的妻子蒋碧微及潘玉良先生(女)商量了一下，并掉换出一个下铺(二等卧车是每小间有两个下铺和两个上铺)让我去躺在那儿直到终点。他对北平很熟悉，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时，对我们的指点很多，还介绍我们认识了音乐家兼篆刻家杨仲子，带我们听了二胡专家刘天华的演奏，访问齐白石先生并看他作画。因为徐先生特别提到我也会作诗(实际还非常幼稚)，齐老先生当即写一七绝相赠。归途又同游泰山，对“经石峪”的石刻他流连很久，设法买到拓片。稍后他画室中悬挂的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就是从这些拓片中选字组成的。

一九三四年他又和艺术系同学去浙江天目山旅行写生，我因已离开中大，未能参加。次年我回艺术系作助教后，一九三六年春又得和徐先生及同学们同游黄山(张大千亦作为客人参加)。当时的黄山游人还很少，在烟云掩映、天风呼啸之中，恍非人世。现在排队登记住宿的“玉屏楼”，在那时不过是三间红墙的

小庙“文殊院”。夜间点油灯，有一“知客僧”殷勤招待。那个下午正遇雨过新晴，左揽天都，右耸莲花，矗立于茫茫云海之上。远处群峰，不过是飘浮在烟波上的小岛。当看到松鼠跳天都时，徐先生更神情激动，欢呼造化之神奇。第二天他也和我们一道手携手地走过仿佛要被天风吹去的“鲫鱼背”（当时还没有石栏，甚易“一失足成千古恨”），登上天都峰顶，呼吸最清冽的空气。在“北海”招待游客的寺院房屋较多，附近松林如海，有始信峰、清凉台、散花坞、观海亭诸名胜，亦为奇松荟萃之所。我们在这儿住了一周左右，或醉心于云海，每凝佇于松涛，在烟云变幻中尽力作画，企图把握大自然之奥秘。徐先生除了自己也不断地作速写画稿外，凡遇到有同学在作画处，他无不停下来关照指点。在早晚和进餐的时刻，那座寺院也充满生气，成为我们这一伙人的世界。在将离去时，徐先生对我们说：“黄山不可不来，不来则不知造化有如此神奇，作画的胆子不大。但这儿也不宜长住，因为过于高峻，也难以相处，假如我不是和大家同来，最多只能住三天！”这也反映了他入世的胸襟和热烈不甘于寂寞的性格。

自徐先生来中大艺术系后，这个系的旁听生愈来愈多。较早有来自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的吴作人、刘艺斯、吕霞光等，稍后有北平艺专、苏州艺专、无锡美专和上海某些美术学校已毕业或肄业数年再来此学习的同学。有的在旁听一、二年之后又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正式生。当时中大收旁听生只要任课的教授同意，就准许注册。而徐先生则大开法门，凡他认为有培养前途者，无不同意。所以他负责的画室常有人满之患，学习空气自非常热烈。直到一九三六年徐先生离开南京，这一段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对于我

国美术人才的培养，确实起了显著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非常热心为具备条件的学生或有才能的青年争取留学外国的机会。如一九二八年暑假他应福建教育厅长黄孟圭之邀去福州小住时，说服他在遣送留学生时，选二人学美术，并介绍当时在艺术系高班的同学王临乙和吕斯百去法国学雕塑和油画。因为对滑田友的木雕极为欣赏，也设法赞助他赴欧深造。他对傅抱石的帮助更为人称颂。一九三三年徐先生过南昌时，长期自学，摸索前进的傅抱石携带自己的篆刻、绘画和有关绘画史的文章到旅舍求教，徐先生看后称赏不已。当他碰到江西的当权者熊式辉时，就大力推荐，促使江西省拿出数千元送傅抱石往日本留学，成就了一位杰出的画家。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也是由于徐先生在养病期间亲自出马去交涉，中英庚款董事会才派送陈晓南、费成武、张椿英和我四人赴英国研究访问。

他在这几年中不遗余力地介绍出版中西美术作品并进行理论研究。除了他自己的几本画集（中华书局出版）和散见在各报刊的文章外，一九三二年还出版了《画范》，选印的大部分是西欧的素描和油画作品，并提出“新七法”作为序言。这七法是：一、位置得宜；二、比例准确；三、黑白分明；四、动作或姿态天然；五、轻重和谐；六、性格毕现；七、传神阿堵。有人以为这是南齐谢赫“六法”的新发展，实际性质颇有不同。第五世纪后期的六法论，是作为创作和学习中国画的几个要素与品评的标准。而徐先生的“新七法”则是对绘画基本练习（特别是素描）的要求；并且步骤分明，从起手的轮廓、各方面的要点到最后完成时的表现，正和他编印这本《画范》的主旨相吻合。他还亲自写序介绍出版了《齐白石画集》、宋代大师李唐的杰作《采薇

图》、瑞典近代大画家初伦的画集和孙多慈的素描集（此集的序为宗白华先生所写）等。当然他在介绍中国画方面对西方艺坛影响巨大的活动，还是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

他携带了向国内的好友如齐白石、高剑父、吕凤子、张大千、张书旗等征集的作品和他自己的佳作与收藏品共二百余幅，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夏，先后在法国巴黎、比京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共七地举行“中国画展”（主要是现代作品，也有少数如任伯年、吴昌硕等作品属近代）。其中尤以巴黎、米兰及莫斯科之展最为成功，也可以说震撼了西方艺坛。法国政府选购了其中的十二幅作品，并在国家画廊内成立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在苏联，据说是用交换的办法，换得苏联近代杰出雕塑家的名作复制品数件。此行并游历了荷兰（为观摩十七世纪的大师伦勃朗的更多原作）、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有丰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雕刻遗迹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参观了被火山爆发埋没了一千几百年的古城庞贝和雅典古希腊帕尔戴农神殿的遗址阿克博尔高冈，后者是徐先生经常谈及并神往已久的西方美术圣地。

在这一段时期内，徐先生除了参与和部分北平的老画家有关“保存国粹”的争论外，又曾与在上海的刘海粟先生在报纸登广告互相齟齬，为全国美术界所注意。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历来“文人相轻”、贬人扬己的一种表现，也有人认为徐先生未免计较小事，缺少涵养。但历年来他对国内许多名家如齐白石、陈师曾、高剑父、奇峰兄弟、吕凤子、张大千、赵少昂等人的态度看，都极为友好，时加揄扬。在桂林时期曾邀请油画家李铁夫、余本、王少陵来游，热情招待，毫无狭隘妒嫉之心。我体会所谓“徐刘

之争”，一方面可能因为有一些刊物的记载不实，产生误会，引起争辩。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对当时美术运动的发展趋向看法有分歧。刘海粟先生在游历日本和欧洲归来以后，在油画方面，较多提倡较新的后期印象派泼辣奔放、要求突出个性的画风，而徐先生虽也重视个性的表现，但反对轻视形象或歪曲物象；对于当时中国画坛的混乱空气，他认为必须首先精研物象，继承“以形写神”的传统，并重视反映现实，反对盲从西方。由于这些看法的不同，再加上徐先生刚直不阿的性格，引起公开的争论，非但不足为奇，并且因此得到艺坛的普遍重视和进一步的探讨，反成为好事。至于双方有些偏激攻讦的语言和琐细事实的纠缠，在流逝的长长岁月中，已更加无足轻重。

另一件恋爱故事，在徐先生一生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使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生活和心理两方面，都经受了許多痛苦。我毕业离开中大，但还在南京工作时，经常去徐先生家中访问，已发现他的家庭不和，有时气氛相当紧张。作为一个学生虽感困惑，也无能为力。同时从一些在校的同学处听到了许多传闻。大致是说有一位叫孙多慈的女学生很受徐先生钟爱。上课时常带给她一些图片参考品，外出旅行时接触更多。徐先生无论在家中或学生中都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加之有个别也追求孙女士却处于劣势的同学随时到蒋碧微处进行挑拨，徐先生在学校的一举一动，蒋无不知晓，且有时收到匿名告密信。而蒋碧微由于在年青时曾背叛家庭，随徐先生逃往日本，以后又曾在法国伴同苦学数年，所以她认为徐先生再爱别人绝不能容忍。由于这些历史情况也博得不少好友对她的同情。徐先生既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谅解，在朋友中也颇为孤立，因此促使他

把感情上的慰藉完全寄托到那一位女学生身上。徐先生的性格热情奔放又很倔强自负，蒋碧微更斤斤计较，毫不留情，家庭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从一九三一年暑期孙多慈由旁听生考取为正式生，徐家就风波叠起。徐先生曾负气不辞而别，独往庐山，经友人转圜，蒋碧微偕母去庐山会面，才一同回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秋，徐、蒋同赴欧展览，但感情并未真正恢复，只是貌合神离。到一九三五年暑假，孙虽已毕业离开南京，但和徐先生的通信并未断绝。就在这一年，由徐先生介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孙多慈素描集》，并联系让孙到比利时留学，这事后为蒋碧微所破坏。至一九三六年春，徐先生首次在南京开个人画展并售画得数千元，据传闻这是为孙筹赴欧旅费及学费，但孙又提出必须与其好友某女士同行，致成泡影。当时国难日亟，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使徐先生在美术事业上的雄心无法实现，颇多失望。更由于他重感情，易轻信，一作决定，势在必行。当时可能又受到某些兴风作浪者的刺激和影响，故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临时约了在上海的同学刘汝醴奔赴广西。

二、桂林时期

当徐先生到南宁时，桂系和蒋介石又不和。桂方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人为领袖，标榜艰苦奋斗，复兴中国；并在本省发行“桂币”（币值约为“法币”的一半），积极备战。对徐先生这样一位名流，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广西，不是玩玩就走，而愿长期共同奋斗，岂不喜出望外！所以在半年以后，当我应徐先生之命到桂林后，他还热情地对我叙述此间如何待他亲如兄弟，食共桌，寒送衣，提倡美术。还说“桂林美术学院”的楼房即将建

造，并在“山水甲桂林”的阳朔，赠送了他一所住宅，可供休养作画之用等等。所以当蒋碧微更早地了解到徐先生有在广西“入伙”久居之意，以及桂方与南京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自然十分紧张，在八月间她就只身由海路经香港、广州至南宁，桂方要员也殷勤招待，并派小汽车专送徐先生和她同游柳州、桂林和阳朔。可是徐先生留广西的决心并未动摇，两人的感情也没有好转，回南宁后她只好失望地乘便机独回南京。政治上的风云比个人间的感情更加变幻莫测。这时蒋、桂又已和好，但徐先生还把发展美术事业的希望寄托在这儿。这时刘汝醴已不愿留桂，辞回上海。不久，广西的省会已迁至桂林。徐先生要我前往助他筹建“桂林美术学院”，我于十一月中，乘江轮至汉口，又乘火车至衡阳，再乘汽车，四渡湘江，来到桂林。

广西的省政府就设在城中心矗立有独秀峰的公园内。即将建造的美术学院楼在园内的西南角。徐先生和我暂住在公园对门省立图书馆内。馆长唐现之是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的前身）毕业的校友，学教育，也爱好文艺，所以对我们极为亲热。徐先生所住的是一间近方形的大厅，里面隔了一小间作为卧室。外间既是书房、画室，又是会客室兼招待所（有的老朋友常在此留住）。面积虽不小，也摆满了作画案的大书桌、小书桌、可作临时床的木榻和许多书架、画架、椅、凳等，未免杂乱无章。在这间大厅的侧后方，有一间小房，被清理出来作为我的住所，也勉可作画。这两间房虽异门出入，但徐先生在“家”时，我大多在大画室陪伴他，各自作画或看书、接待宾客。因为徐先生被聘为广西省政府的“顾问”，所以省府派来一名男工做一些杂事。徐先生每天中午到省府内和几位厅长同桌进餐。当我初到桂林时，徐先生也

带我前往，因此我认识了教育厅长苏希洵、财政厅长黄钟岳、秘书长邱昌渭（后改任教育厅长）和总务处长孙仁林等。省主席黄旭初也有时来参加，但很少说话。其他人和徐先生的确混得很熟，随意谈天论地。其中尤以孙仁林和徐先生接触最多，经常邀请看戏、吃饭，向徐要画。几天之后，我因感到过于拘束，才向徐先生说明，自己去一小饭店包饭。

这时的桂林还是一座不足十万人的小城，可以在马路中央散步，根本看不到汽车，十分安静。散步碰到的也总是那些熟面孔，所以不到一个月，几乎认识了文化教育方面所有的比较活跃的人物。我也有了不少朋友，并经常在假日结伴同游桂林山水。徐先生这时着力最多的创作是大幅油画李、白、黄的骑马像，也画了几幅油画漓江风景，国画则大多是动物和应酬之作。因等待造房子，所谓筹备美术学院实际无事可做。我除了作国画在自己的小室外，作油画与阅读即在徐先生室内，亦可以作伴。徐先生在作画以外最主要的消遣是翻阅他所收藏的图书或清理自己旧日的作品、画稿，这也正是我从旁学习的最好机会。他常常是一边翻阅一边介绍，许多西方绘画的精美印刷品他都买有双份或三、五份，有时就随手分给我一张说：“给你！”对于他在欧洲时的大量素描、速写及小幅油画人体习作，当我欣喜赞美或请求取出再多看看时，他也常慷慨赠与。但凡是自认为是精品与有意义的作品，必十分注意保存，既不送人，画展中亦列为“非卖品”。所以在他去世后成立纪念馆时，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早已集中，规模具备。这种情况并不能看作他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留名不朽；从我和他长期的接触中，可以体会到他是在为建立像样的中国现代美术馆而作持久不懈的努力；不仅尽力收购、交换以求

得大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和当代诸家的优秀作品，对于他的学生们所作，凡认为佳作，就随时索取。学生们也知道他的目的，无不乐于从命。

徐先生的晚间生活很繁忙，经常有人邀请晚餐或看桂戏（当时在桂林唯一的剧种）。请吃饭的人不仅是为了慕名，更多的是要画，最为典型的是孙仁林。我曾见到，餐后纸墨笔砚早已备好，等着徐画。大约他们已要了不少，不好意思再要，于是就让他们老母、已出嫁的长女、次女，才十几岁的三女、四女，孙妾和一个才四、五岁的小男孩，逐一向徐先生要画。徐先生只好勉为应付，回来时未免显得精疲力尽。我向徐先生提出劝告，他说：

“真是没有办法，人家待你不错，交一个朋友不易……。”我也就不便再劝。使我感到新鲜而又似乎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是一些所谓要人的宴会就在剧场内楼上的正厅举行。不但在开演之前痛饮猜拳，一无禁忌，即在楼下人满，台上已开始演出，仍可边吃边看。一些名角的演出排在较后，在她们（当时桂戏的主角均为女演员）演完之后，不是看戏的“大人物”去台上慰问，却是主要演员来和这些特殊观众见面，似乎是表示感谢光临。这种习俗可能由来已久，我有幸随着徐先生恭逢其盛。如果不是第二年就爆发七七事变，桂林的人口和剧场迅速增加，很多文化人和剧团也来到这西南重镇，这一带有封建色彩的风俗或许还要延续一段时期。

在我到桂林后约一、二个月，有一天，徐先生从省府吃午饭回来时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前几天在省府门外看到有一家四、五口自外省逃荒来的难民坐地求援。其中有一约十七、八岁的女孩似尚聪慧可怜。我在吃饭时谈及此事，不料他们竟派人找到

这一家难民，并谈好条件，助他二、三百元回家的旅费，将此女孩留下帮我洗衣、磨墨。已安排好住处，明天即来上工。”事已决定，我也不便再发表什么意见。这女孩是江西人，现已忘却其姓名。人很朴实，并不美，不多说话。除管点家务外，徐先生曾命她临贴学写字，但进步不快。不久她和孙仁林的两个小女儿交上了朋友，常一同出去逛街或游泳。以后因徐先生常离开桂林，她就更无事可做。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即通知其家长把她带回原籍。这件事在重庆被说成徐先生收留了一位女难民做模特儿，实际并不是如此。徐先生在桂林时期从来没有画过女裸体，但把在南京画的一幅裸体习作加上了桂林山水作背景。

一九三七年春季，徐先生完成了李、白、黄的骑马像，我也画了一张较大幅的油画《后羿射日》，并由我一同携往南京参加“全国美展”。因为徐先生这幅油画是全场罕见的大画，起初被悬挂在大厅中央最主要的壁面。画展开幕前夕，张道藩到场大发雷霆（因为还没有人为蒋介石画这样大的油画像），布置人员不得不把这幅画改悬在另一次要的壁面。也是在这上半年，我还陪同徐先生到广州和长沙举行他的个人画展。在广州时，有中华书局华南地区总经理郑健庐和广州的经理郑子展殷勤招待。展品包括他历年的重要作品（目的不在卖画），极受欢迎。并曾同游距广州不远的罗浮山。长沙之展的会场已记不清是借用民众教育馆还是一所中学的有了相当年代的楼房。因为观众过于拥挤，楼梯和楼上的地板都摇摇欲折，只好提前几天闭幕。

七七事变爆发，蒋家政权决定迁都重庆。八月十三日敌军进犯上海，南京也不断有空袭警报。徐先生这时又赶回南京一次，对蒋碧微和孩子们去重庆作了一些安排，但感情并未好转。他九

月间重返桂林。南京的中央大学也正迁往重庆。新形势使蒋、桂双方都被迫在表面上一致抗日。徐先生则决定一面仍返中大美术系任教，一面也不放弃在桂林发展美术事业的愿望。所以他的书物仍放在桂林，让我在此安心等待“桂林美术学院”新楼的落成。他在十一月去了重庆那陡然热闹而又混乱的山城。

约两个月左右，徐先生又回到桂林，并在这儿度过春节。在独秀峰侧的楼房完工以后，我们就离开图书馆搬入新屋。徐先生在楼上西侧有一间寝室和一大画室，我住楼上东端的一间兼作画室。但使徐先生丧气的是：广西省政府已明确表示因抗战爆发，一切非急需的事业均停止，美术学校不能兴办。故寒假后他仍回重庆中大。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江防不守，孙多慈全家已避至长沙。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徐先生亲赴长沙将孙一家接至桂林。当孙家住定之后，邀请徐先生和我及其他一两位同乡在她家聚餐。席上徐先生兴高采烈，热情洋溢，连连为孙多慈挟菜，使她父女均感到很不自然，但徐先生旁若无人，毫无顾虑。以后孙父在谈话中就累次提到他的女儿和徐先生只是师生关系，没有其他可能，但孙多慈自己的态度却颇多暧昧。五月徐先生回重庆，七月又来。这时由广西教育厅的音乐督学满谦子建议，利用为美术学院建的新楼举办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我和孙多慈都担任了美术方面的辅导工作，徐先生也开了临时的讲座。这个夏天，徐先生曾和我们一同到漓江去游泳，并为孙多慈画了一幅全身的油画像。由于孙父的阻挠，他只好悻悻又回重庆。八、九月间我去武汉，参加文艺界前线慰问团去潯水、宋埠一带作速写。不久敌军进攻，“保卫大武汉”又成空话。当我返抵桂林，孙多慈已被其同学密友李女士接往浙江丽水。李的丈夫是浙

江省政府的秘书长，由李的撮合，促使孙多慈嫁给任国民党浙省府教育厅长的许某，孙一家都迅速迁去丽水。这对徐先生当然是沉重的感情上的打击。不久他又来到桂林，即着手筹备去南洋为抗战救灾举行画展。当我无意谈到孙家离去的事，他低沉而又痛苦地说：“她死了！”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携带了他的全部创作和珍贵的收藏经香港去新加坡。把大量图片、书籍和沉重的西方铜雕留存桂林。

三、一九三九年以后

徐先生出国后经常和我们通信，告诉我们他在国外的活动和取得的荣誉及募捐成绩。从信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对国内学生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也十分关切，特别是寄去一些作品照片时，他在鼓励之外，还经常作出很具体的有关技法的指示。新加坡是他的旧游之地，华侨中友好不少，画展取得成功是在意料中的。当时王莹正在新加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抗战。徐先生画了她带有表演动作的油画像。新加坡的总督曾到徐先生的住所请他画像。这一年冬季他应邀赴印度举行画展，展品有二百余件，包括国画、油画、粉画、素描各方面的代表作。伟大诗人泰戈尔亲为画展写了“前言”。在印度时，他不仅画了泰戈尔像和喜马拉雅山的雪峰，还从印度民间搜集素材，进行大幅国画《愚公移山》的创作，表现抗战决心和不得胜利决不罢休的气概。我们曾陆续收到他寄回来的画展目录、国画及素描的泰戈尔像还有他和这位大诗人的合影等。对他的活动成就，我们十分敬佩，受到了鼓舞。

至一九四二年新加坡已受威胁，徐先生又携带大量行李回到

昆明，并在昆明举行救灾募捐画展，以所得二十余万元全部捐献。他又到贵阳、成都举行画展，然后回重庆中大。虽远别归来，又有一些老友从中调解，他和蒋碧微终难破镜重圆。在重庆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创办一所“中国美术学院”，由徐先生任院长。他积极筹划，借此稍得安慰。这一年的暑期和寒假徐先生都来到桂林，因他在重庆已无家可归，当时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友好甚多，如李济深先生（任桂林行营主任）、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熊佛西等大多是他的老友，同时他也很关心留存在这儿的书物。他到桂林后情绪较好，既得和一些久别的老友与学生欢聚，又看到桂林文艺界的空气较为自由、团结。“桂林美术学院”的房屋虽已被其他机构占用，但创办了较正式的“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省艺专的前身）。以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中也设有“美术部”，他的学生集中在桂林的人数已不少，都各有工作岗位。他的存物也已妥善装箱，存放在能避免空袭的七星岩内。

某些老友颇为关心他的生活，特别是家庭问题。有一次徐先生对我说：有人想介绍一位桂剧的名演员和他结婚，他似乎想同意又有点犹豫。当时我未免感到突然又未便阻止，只提出几个问题请他考虑。如思想、生活习惯及文化修养距离较远，是否能够长期愉快生活在一起？对方是否能抛弃自己的演出生涯随徐先生去重庆或徐先生能长住桂林同意她继续登台献艺？徐先生当时沉默不语，终于作罢。又一次有一位广东籍的女士来桂林（姓名已忘却），已有三十几岁，颇有风度及才华，仍未结婚，是香港某刊物的编辑。有人设宴招待并请徐先生参加，有为之介绍的意思。见面后，这位女士对大名鼎鼎的徐悲鸿热情颂扬并索画，

徐先生不仅在宴会时热情蓬勃，更连夜画了一幅白梅花，又特意作七律一首题在画上，使我也为之兴奋并抄录下这首诗。可是对方画虽收下，却无意于进一步的接触，更向介绍人谢绝了提婚的建议，使徐先生又一次大失所望。在事后我作了一首“和诗”，可惜那首徐先生的原作没有记在一起，也不再记得了。和诗是“菊荒兰远岁将残，仆仆风尘梦亦难。乍睹清辉临浅水，更寻芳躅入深山。云迷雾掩姐娥狡，雪乱风尖处士寒！纵到罗浮春讯渺，孤飞鸿雁又思还。”附记于此，说明我写这首诗时也同其怅惘。

“中国美术学院”的筹备渐具雏形，在战时只能作为一创作研究的机构。专任的副研究员有李瑞年（初期兼秘书）、陈晓南、艾中信、孙宗慰，张蓓英等，人在外地及已有他职的兼任副研究员有冯法骥、黄养辉、沈福文、费成武和我，宗其香毕业较晚，为助理研究员。徐先生很想请高剑父和张大千为研究员，曾几度通信，但未得满意答复。借得的临时院址为一地方的头面人物新建而未用的“生祠”，有两座三开间的小楼房。徐先生和在渝的研究人员即可迁入。所以在徐先生末次来桂林时，向我们介绍了这新创办的美术学院的现状和将来的理想，并通过征求考试，选取了廖静文女士为这个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同往重庆。

徐先生并约定在这一年（一九四三）暑期，全体专任和兼任的研究人员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聚会。我在五月间离开桂林，一路在贵阳、重庆、成都三地举行个人画展，约七月底经灌县，登青城山。徐先生他们已先到十数日，共约十人左右（有二、三人因事未来），较长的时间住在一座宏大的道观内，每天各人外出作画。到处泉流淙淙，绿荫蔽天，确是避暑胜地。观中有一棵传

已寿约二千年的老银杏树，虽垂痠盘曲如石钟乳，而高枝茂密青翠，显得古老而又年青。徐先生除了随时指点各人的作业外，并用油画为这一大树写照。黄昏的散步，晚间的乘凉，大多听徐先生发言。谈其在国外奋斗的经历或对美术事业前途的展望，也有时询问在外地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或大家纵谈国事。夜晚山中月光细碎，萤火到处飘浮，远远多于天上的繁星。直到“知更鸟”连啼，才兴尽安寝。因桂林的催促，我在八月底较早地走上归途。

一九四四年秋，长沙、衡阳相继沦陷，敌军自衡阳西进，桂林紧急疏散。艺术馆与艺师班均决定迁往昭平（在桂林与梧州之间，仅有水浅的桂江可通）。徐先生虽早有来信，请桂省政府协助转移他的书物。但当局者已自顾不暇，虽屡经交涉，只给了很少一点钱，而船价飞涨，只好和艺师班合雇一船。这样浅水木船载重有限，只能将徐先生的二十余只沉重木箱先运走一半，寄存在昭平乡间一位友人的亲戚家中，以免在人口陡然大增的昭平城区受到轰炸。等局势稍稍稳定，我又赶回桂林，准备设法再运余物。这时才知道徐先生因悉我处有困难，又急电已在黔桂铁路工作的黄养辉，要他来桂协助。但因事前无联系，黄来时只好将留下的十几箱子由铁路运往贵阳（当时铁路已通车至贵阳附近的都匀）。我在昭平留住月余，因艺师班既无校舍，又无学生；艺术馆又拟迁往山区八步，徐先生亦曾有信促我去渝，遂在桂林、柳州陷落之前西向贵阳，至十二月重到重庆山城。幸而留存昭平之物在几年战乱中安全无恙。在徐先生任北平艺专校长之后，由在广西工作的老友陈学人大力协助运回北平。当时我已在国外，闻讯亦为之欣慰。

我到重庆后，才知道徐先生因轻微脑出血入医院治疗。由于

廖静文女士的精心看护，已逐步康复回磐溪休养。我一家三口即被安排住在楼上徐先生宿舍对面的一间。当中的一间客堂就让它空着，以免有响动对徐先生的养病不利。我们也不让小孩在这空房游戏或在楼梯上乱跑，一般的宾客在楼下由别人接待，较亲密的友好才能登楼入室。这儿的环境既幽静又宽敞，房屋建造在嘉陵江东岸的半山上，两楼之间稍后建一矮塔，塔前为一大天井。山坡上有密竹疏林，山茶花娇红吐艳。下坡就是沿江道路，北行二、三里就是由昆明迁来的国立艺专。路旁有溪水池塘，稻田成片，再下坡就是水急滩多的嘉陵江。江边有渡船，对岸是中央大学的所在地沙坪坝。所以在中大兼课的人往来甚近，又是艺专的友好去市区时的必经之路。由于这一地理条件，虽是多雾的重庆，我们还是能经常在附近写生，欣赏朝阳透射过薄雾掩映的山林，也常陶醉于江干的月色。徐先生身体大愈后，常喜送客下坡，漫步磐溪小道，听泉声与江上滩声的合奏。因此在艺专的潘天寿和李可染、王临乙、蒋仁、吕霞光等先生与在中大的宗白华、陈之佛先生及傅抱石、常任侠、秦宣夫、谢稚柳、吕斯百等，常是磐溪的座上客。在节日或周末，更有中大美术系的毕业校友及高班同学来此相聚，偶亦翩翩起舞，颇不寂寞。

徐先生虽在养病期间，一能够起床，就重新握笔或翻阅书画。所以大家都不愿再让他为行政事务所打扰。我既到重庆，也就自然变为专任人员。当时的秘书张茜英坚决辞此兼职，徐先生要我继任，只有从命。这一所只有十几人的清水衙门的秘书，本无多事，也不致影响研究工作。可是在蒋政权的腐败统治下，通货膨胀犹如无缰之马，而学院的经费来自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银行利息，不能增长。研究人员不得不谋求兼职或个人开画展卖画，以贴

补生活费用。同时学院的那一点办公费也无法维持。商得徐先生同意，以他所收藏的一百余幅近代、现代国画精品在市区公开展览。将售门票所得补助办公费的不足。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九日，是徐先生五十生辰。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的形势大有好转，人心振奋。徐先生的友好和学生们很多人来磐溪祝寿，并举行了相当规模的聚餐。我因为和徐先生朝夕相见，对他五十年来的流动、战斗的生涯和“悲鸿”这个名字感受甚深。在杜甫诗中找出两句可切此二字，但一为五言，一为七言，就加上“四海”两字，写成一副对联：“四海风尘三尺剑，万古云霄一羽毛。”作为献给他生辰的贺礼。他看了也表示欣赏，在他的房中悬挂了一段时期。

阳历八月十五这一天下午，费成武偕一女友渡江来磐溪，大家留他们晚餐，殷勤招待，有促成其婚姻之意，所以他们离去时已近晚九时。不久，成武敲门又至，报告大喜讯，谓沙坪坝已盛传日本投降。果然这时隔江的爆竹声渐密。推窗远望，市区已红光烛天，想必灯火通明，人群载歌载舞。这时徐先生披衣重起，命人煮咖啡，电灯光弱，加点红烛。大家欢聚在徐先生室内，畅谈这八年的苦难并展望未来，兴奋欢快无比！直到夜深一时许，恐影响徐先生身体，大家才辞出归寝。几天以后，徐先生就和我谈了他对中国美术学院今后发展的一些设想，大致分几个阶段：从补充人员、购置设备、建造房屋至附设美术馆、成立大学部、选派人员出国研究、临画及与外国美术馆交换藏品等等。由我写成书面的文件，他亲自去市区中英庚款董事会找负责人提交这一发展规划。他回来后告诉我们：据答现百废待举，经济困难。因通货膨胀，庚款已损失殆尽，还谈不到发展美术。经徐先生力争，答应可派副研究员四人赴英国研究二至三年，并告我他所决

定的人选，即备文报庚款董事会，由他们办理申请用庚款购官价外汇、和英国文化委员联系及请领护照等事。徐先生又提出凡出国人员需每人交经他同意之佳作十幅给中国美术学院。这些作品闻现仍存“悲鸿纪念馆”中。

这一年冬季，我辞去美术学院秘书职务，因需送妻女回长沙，办理出国事务等，即离开碧溪住在市区。但知道徐先生已和蒋碧微正式离婚，条件是给蒋一百张画。徐先生自己的作品和收藏品各半，这样也就为徐先生和廖静文女士的婚姻扫除了障碍。可惜我也没有能参加他们的婚礼。

一九四六年春季，大家多已回到江南。我在扬州故乡探母，得知徐先生已受命为北平艺专校长并来至上海，即前往会晤，悉他将以前为大中美术系教授，近在川康一带写生归来的老同学吴作人为艺专教务长，一同赴平。中国美术学院的其余研究人员，则皆往艺专任教，成为徐先生的班底。中国美术学院则在北平艺专的门口多挂上一块招牌。当时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赴英国的客船仍未复航，我们四人候至十月份，才乘飞机赴英。抵英后徐先生在通信中，对我们在国内的活动仍热情的指点和鼓励，并为我们第二年的费用热心交涉。信中也谈到艺专的内部和北平的美术界左倾与右倾的斗争，革新与保守的壁垒都使他烦于应付。但从其他同学的来信中，又了解到徐先生在进步势力的影响下，已有了坚定的立场，在美术运动上，也声势宏壮，再不像二十年前长北平大学艺术院时那样孤掌难鸣。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我在一九五〇年二月离英回国，四月到达北京。在教育部的招待所住定，就去看望一别数年的老师。他家中的画室客厅虽不甚宽敞，却布

安治君鑒
 喜欣知你在英倫展出僅
 進展順利之是三名之機惟即
 北是成功仍決不懈治藝之勇乃
 藝者真寶得財
 術弟等弟子甚願賞進行以時
 專幫日為外匯益為我輩竭力
 校設修但未能減之夏夏慮因一
 事能買別外匯一日不放也此向
 近好
 徐悲鴻
 元月十五日

一九四八年初徐悲鴻給在英國倫敦舉辦畫展的張安治的信

置得豐富而整潔。懸挂的一副對聯已經不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而是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看到他精神依然健旺，深以為慰。以後因為工作單位不同，工作又繁忙，見面機會就較少。但知道他雖在身體不佳的情況下，仍畫了不少英雄、勞模的素描像。誰能想到，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屆文代會開會期間，在度過五十八歲的生日才兩個月多一點的時候，他就因嚴重的腦溢血溘然長逝！他正在着手的魯迅和瞿秋白的油畫像，只能留下未完成的畫稿！

徐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迹、藝術成就及其政治思想、藝術思想，近年已有廖靜文夫人和徐先生的友好、學生們寫了不少文章，本文不過對多年來和徐先生親身接觸的感受作一些片斷的記

录。因我早年的笔记多已毁失，记忆力亦颇为衰退，只能记而不详，还难免有差误。徐先生一生中最突出的是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和美术教育事业。他正直热情，勤奋终身，四海奔波，为宣扬祖国文化，培养美术人才而竭尽心力。他生活在一个困苦多难、复杂多变、矛盾重重的世界，得到不少胜利成功的欢悦，但生活、感情上的烦恼、痛苦与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形成他独特个性和艺术上奔放、激越风格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如果在这一方面能使读者多一些了解，对于研究、认识徐先生的为人及其艺术成就或许不无裨益。

田 汉 的 童 年

田 海 男

母 亲

田汉能够在中国的戏剧事业上有所贡献和成就是和他的母亲茹苦含辛历尽艰难的抚育和帮助分不开的。母子们在旧社会漫长苦难的年代里饱经忧患，在冲破重重黑暗后，也曾无限欢欣地迎来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但生活的道路毕竟不是那么风平浪静的，在动乱的“十年浩劫”中，他们还是生离死别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当田汉被“四人帮”一伙残酷折磨死去后，缠绵病榻的老母还在望眼欲穿地盼望儿子的归来。这一天仿佛是盼到了，夜深人静，庭院传来她



田汉兄弟与母亲摄于一九六二年
(中坐者为母亲易克勤，左为田议，右为田洪)

所熟悉的儿子的脚步声，还是那样快速而坚实有力。

“妈妈，我给您带桔子来了。您看，还是广东的招柑呢，清甜的，桔皮还能泡水喝呢！”母亲枯干的眼眶里迸发出喜悦的泪花，她挣扎着爬起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寿昌，你到底回来了，我不要吃桔子，来，让我好生看看你，摸摸你。”她的手在暗夜中颤抖地摸索着，“咣啷”一声，床头的杯子掉在地上打得粉碎，眼前的幻影一下子消失了。“寿昌，寿昌，你在那里？我怎么看不见你呀？”但儿子的幻影消失了，永久地消失了。母亲擦干了眼睛，仍在焦急地寻觅。窗外是北风呼啸，透过窗户的寒风把窗帘刮得飘飘荡荡，室内是孤灯摇曳，老人失望地倒了下去。数十年血肉相连，形影不离的生活，千百个思念不眠的长夜，果真能使魂魄来入梦吗？冬去春来，儿子在院子里手植的枣树又转绿了，母亲仍时刻盼望儿子的归来，准备了他喜欢吃的冬苋菜、马齿苋，但灯油终究耗尽，一个冬夜、母亲孤零零地倒在病榻上长眠了，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她在无尽期的梦中与儿子永久地团聚了。

田汉的母亲——易克勤——一八七三年农历十月十二日生于长沙东乡花果园三字墙屋一户农民的家里。这里离长沙城约六十里。田汉的外祖父叫易道生，是弟兄中最小的，行四，在地主家当长工。田汉的外祖母在地主家当奶妈，娘家姓蒋，因家境贫寒，嫁女时也没什么陪送的，所以在十六岁圆房之后，床上依然挂的是一顶有许多小洞洞的破蚊帐，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在大女儿克勤出生后，外祖母带她睡觉，见这一头蚊子咬得太厉害了，就抱到那一头去睡。有一天外祖母的父亲蒋秉正老先生来探望，看见帐子上那么许多窟窿，很难过地说：“可怜的孩子，你挂的真是一铺

八百个眼的帐子啊！”

她们睡的床也是一张摇摇晃晃的旧床，床脚早已被白蚁蛀空了。一天晚上忽然整个塌下来，把外祖母吓了一跳，赶忙抱着克勤起来，但外祖父却毫不在意，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到了克勤八、九岁的时候，外祖母便立志要腾出工夫来绩一铺帐子。那时候麻价便宜，一百几十个制钱可买一斤。一铺帐子要六斤麻纱，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最苦的是没有功夫。外祖母在家除每天要弄三顿饭以外，每天至少还得选八两丝供三伯的一张绢机织绢，如给公公看见她在绩麻，那还了得！连麻篮都会给扔掉的。因此外祖母只能带着克勤利用选丝后的空隙偷偷地绩麻。有时每天能绩四两，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绩了两年才算织成了一铺帐子。

有了帐子，外祖母又想做一张床。那时长岭大伯时常上榔梨市贩鱼，外祖母摘下一对银耳环托他当了三个吊钱，买了十二三斤棉花，带着克勤纺纱。每纺六、七斤纱，可织三匹布。每匹重的一斤十四两，染成细青布可卖三、四串钱一匹。托人带一匹白布到榔梨市去，可换三四斤棉花。就这样转几次手，除把银耳环赎回来，还可以赚几元钱。积了几年，也有好几十元了。外祖母请邻近的周四木匠来家，费了几天功夫，新的木床就做成了。当时富家小姐出嫁时不用操心就可以睡上好床，但通过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换来的快乐的心情，也不是那些小姐们所能想象得到的。

克勤十六岁出嫁到田家，丈夫叫田禹卿，当时十五岁。田家有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那时还在读书。田家住在田家墩毛坪，离三字墙易家只有四里。克勤出阁那天，送亲的除外祖母和三伯父外，还有克勤的三弟易梅臣。那时梅臣只有七、八岁，他送了姐

姐回家后，跳起脚对妈妈哭着说：“不该把姐姐嫁出去了。”因为自从他出生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姐姐。他四岁上学时，就一直是姐姐带他去。他在屋里念书，姐姐在窗子外面撕麻。他的书念熟了，姐姐也听熟了。有时他不记得背书，姐姐怕他挨先生的打骂，常常从外面提醒他。梅臣自小读书的成绩很好。他性情倔强，不能受一点委屈。但对姐姐的感情最好，最肯听姐姐的话。现在姐姐出嫁要离开他了，他实在是难割难舍。

田禹卿的父亲桂泉公行四，为人忠厚，待人和蔼，从不与人吵架。田家当时没有分家，子女众多，家里有出无进，恰像一个烂灯笼壳子，快要破了。好在家里人心还齐，劳力还多，大家种田喂猪，辛勤劳动。桂泉公在乡里信用好，人缘不错，所以表面上还没有露出什么败相。克勤嫁到田家后，因其他弟兄有的未娶，有的尚未圆房，她就得挑起长媳的担子。除烧茶煮饭，浆洗衣裳、纺纱绩麻，鞋头针线等主妇必做的家务以外，她还同四嫂子养蚕，每天烧过插田饭之后，还要到附近亲友家里去摘桑叶。晚上得换叶子，剔蚕屎，常常整夜不睡。她的手很巧，每年收的茧子既多且好，缫出丝来能卖得几十元，贴补家用，公公非常欢喜。那几年虽然辛苦，但一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还很愉快。

克勤在二十岁时生了头一个儿子。因为是田家第一个孙子，公公婆婆都喜欢得很。不幸的是因为家境困难，带得不好，又加上乡下医疗条件差，不到三个月就发脐带风死了。那时禹卿因家贫辍学，经人介绍到岳州去跟厨师学徒，没有在家。克勤为着这孩子的死，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从此她就病了，饮食不思，骨瘦如柴。外祖母知道她心里难过，接回娘家去住了一两个月，尽力安慰她，并给她吃些滋补东西，慢慢调理，身体才渐渐好起

来。到二十六岁那年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是寿昌（即田汉）。那是在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农历二月二十日一个寒冷的春夜。这时禹卿又到邵阳去了，婆婆请隔壁的王大嫫过来接生。

“恭喜又生了一个男孩子。”王大嫫抱着小宝宝说。因为第一个孩子死了，过了六年才生这孩子，一家人都把他当成了宝贝。祖父怕这孩子难带得活，就把他寄在观音菩萨名下做个小徒弟。因此寿昌的乳名叫做“和儿”，就是和尚的意思。而且从小就剃个光头，似乎这样可以防灾去病，确保平安。

母亲的决心

寿昌性情温顺。在四、五岁时，他三弟寿康（田洪）晚上生病发烧，母亲叫他起来打着灯笼到鸡窝里拣鸡蛋，用蛋白给他弟弟烫头、烫胸，他总是很听话的。冬闲时，祖父在舂米的房里打草鞋的时候，他也搬一个小条凳学着打草鞋，静静地一声不吭。那时他还不曾上学，可是已经认识几个字，常常用红泥在尿桶边的墙壁上学着写斗大的“福”字。他从小就很喜欢看戏。当时长沙农村流行一种影子戏。田家有个亲戚叫向滔生，就是唱影子戏的。附近农村遇着年节、喜庆、或是给菩萨还愿，总是他领班子来唱戏。寿昌常去看，看完戏回家，嘴里总是学着哼唱。身子也学着“影戏菩萨”的走路姿势。有时偷偷地拿母亲打鞋底用的布壳子学着剪影子戏中的人物，又用竹纸敷起架子在青油灯下一边摇弄着，一边唱着玩。每逢庙会唱戏时，叔叔们总爱带寿昌去看戏。母亲也给他一点钱买东西吃。他一到庙里因人小怕挤，老是靠着柱头站着专心看戏，回家来他依然把钱交还母亲。凡是看过的戏，他往往能说出具体情节来，有时还会把衣

角展动着，学舞台上演员的动作。母亲见他聪明沉静，想让他读书的心思就更加坚定了。她在娘家当大姑娘时，每天曾领着弟弟梅臣去读书，这引起她对知识的兴趣。后来梅臣进学、中举，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光彩。她有时心里也曾暗暗地这样想过：“我以后若有了孩子，也一定要像他舅舅一样，让他读书。”寿昌出世以后，梅臣每次从省城回来总带来许多新的消息和新的见解，使她心里也模糊地感到这世界总在变，促使她更加想让孩子读书求知，将来好追随他舅舅离开这闭塞的山沟到外面去看看新的世界。寿昌是田家第一个孙子，长得又聪明逗人喜欢，家里也没有人一定要他去看牛拾粪。恰好那时王家姑爷茂发二哥的染坊开得很兴旺，从莽麦湾那边搬到“枞榕树脚下”（小地名）。他家人口多，小孩子也多，就在他家新屋里办起了一个学塾。请来一位先生也姓王，叫王益谦，是一个不第的秀才。他脾气古怪，浑名叫“王五憨子”，但教书却异常认真。母亲决心把寿昌寄在王先生那里读书。因他那时已七岁了，应该让他“发蒙”了。

“寿昌，今天公公送你到五姑爷家里念书去，好吗？”母亲问寿昌。

“我去，妈妈。”寿昌显然非常高兴。母亲也放心了，给他穿上新衣。祖父在祖宗神龛前点起香烛，要寿昌拜过祖宗，就领着他上学去了。母亲送出门口，远远望着老祖父领着穿新衣背书包的孙子过三培桥的背影，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忧虑。“这以后对于我恐怕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吧？”

寿昌自上学以后，读书非常用功。不管晴雨他都坚持上学，没有告过一天假。有一次他肚子痛，母亲要他不去上学，但他还是去了。从毛坪到枞榕树要经过三培桥，到了春天小河水涨，石

桥常被淹没。王家和田家是两代亲戚，他们也爱这孩子，担心他会掉在水里，常常留他吃午饭，寿昌不愿意，茂兴二伯就对他说：“你公公把了钱给我，要你在我家搭伙食哩。”寿昌还是不肯。有一次春水涨得很大，放学后，王先生也劝他留下一同吃饭，寿昌执意不肯。先生生气了，随手用对联上的木档子打他，但他还是跑回家了。先生原是非常严厉的，王家的那些同学常常被他打的鬼哭神嚎，可从未打过寿昌。因为他功课做得好，这次却为着他不肯吃饭打他，可知王先生真不愧是位“慈子先生”了。

寿昌读完了第一年，成绩优秀，后因母亲随叔叔们临时搬到陈家冲去种田，寿昌又转到王绍羲先生那里就读。王先生是上杉市人，是一位饱学先生。他教的都是年纪较大的学生。在王先生的熏陶下，不过数月，寿昌的进步很快。不仅在文字书法方面打下一点底子，精神教育方面也得到不少启示。有一天先生讲到我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事迹。先生问寿昌道：“假如日后你也遇到他们那样的境遇该怎么办？”

“我也要象他们那样有气节。”寿昌回答。先生对此颇为满意，拉着孩子的手反复嘉勉他。有时先生对大学生讲课后，问旁听的寿昌懂不懂，寿昌也能答出一个大概。同学们有时还不免埋怨先生忘偏向这个小学生。

那时马德福四爹在杨泗庙开了一个杂货铺兼屠行，生意非常好。某次他找寿昌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对人家说是八岁孩子写的，大家都不大相信。农历七月十五陈大公家里烧包，自己来不及写对子，也要寿昌代写，传出去以后，来找他写字的人就更多了。寿昌本喜欢写字，但凡有人找他，他都高高兴兴地去写。

因为他觉得这是练习写字的好机会。而且不必自己去买笔墨纸张。

父 亲 之 死

寿昌九岁那年，在衡阳当厨子的父亲（禹卿），因得了肺病被辞退了。他困居旅店，病得很厉害。母亲听到这消息，非常忧虑，赶快托人写信，催他回来。没有多久，父亲果然回来了。他形容憔悴，才三十多岁的人，连耳朵都枯干了。据他说在衡阳时，曾吐过一脸盆血，回家后仍不时吐血。母亲为他到处请医延治，但病势依旧一天天严重。寿昌从学堂回来服侍父亲，为了不荒废学业，每晚就坐在他父亲床边的平头椅子上，借着菜油灯光读书。父亲常年在乡飘泊，见儿子已长得这么高大，读书又知道发奋，而自己却病成这个样子回家，不能照顾妻子，心里感到又是高兴又是凄楚。一天夜里，他在昏迷状态中陡然从床上爬起来说：“克勤，他们说我在外面赚钱，以后你和孩子的生活不用发愁了。”

“爹爹，谁说的？”寿昌问他父亲。

母亲忧伤地拉了一下寿昌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再问了。显然父亲这时已到了神智不清的状态。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看看生命垂危的丈夫，又看看环绕在床前的三个幼小的孩子，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苦楚。大的九岁，正在读书；二的寿康（田洪）才六岁，淘气得很，没法读书；最小的寿麟（田源）三岁，还在吃奶，万一禹卿撒手而去，自己单身一人，拖着这三个孩子怎么得活！以后的日子是万万想不得的，一想就令人肝肠寸断。

“禹卿！”母亲含着眼泪大声呼唤在昏迷中丈夫的名字，

“你要是万一出什么事，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到杨泗庙去买点生鸦片烟吞了。”

父亲好像听清了她的话，显得很生气的样子，他费劲地摇摇头，想挣扎着坐起来，说：“不，不，克勤，你不要死，千万不要走这条路，你得好好抚养这三个孩子成人。你的命比我好，你以后还会有福享的。”说着，他把寿昌拉到床头，伸出枯干的手，轻轻抚摸着寿昌的头，对克勤说：“像这样的孩子，能有几个？”他一下子好像突然清醒过来，本来黯淡无光的眼神一下子闪出亮光来。

父亲临终前，短短几句伤心话，永远铭刻在母亲的心中。为了抚育这三个苦命的孩子成人，她毅然单独挑起重担，跋涉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直到她生命的终结。但她后来却万万没有想到当她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刻，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只有寒风和孤灯伴随她离开了人间。

父亲死时只有三十五岁，亲友们都来帮忙料理后事。墓地是外祖父把自己的坟山让给他的，在铜钱潭边藤子冲的山上。那山势远远望去好像一条牛，禹卿葬的那地方像牛鼻子，外祖父说：“牛鼻子的气是很大的，孩子们以后必有发达。”这虽是他老人家安慰女儿的话，但在当时悲痛欲绝的母亲的心中，却是很大的安慰。

送丧的行列由陈家冲出发，转殷家坳由杨泗庙过河，经三字墙屋左侧，再过铜钱潭的野渡，船还没有靠岸已经听见对岸的哭声了。

“禹卿啊！你来了么？我怎么会想到你会比我先死，今天葬在我的山里呢！真是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外祖母拄着拐杖，坐在岸边的一条小凳子上，早在那儿等着了。这使早已哭得泪人似的母亲更加心碎，上了岸她抱着白发的娘哭作一团，身子都哭软了。

父亲安葬完毕之后，叔叔们送寿昌回到黄狮渡的学塾。他那时已转到雨生满叔家就读了。满叔夫妇和李家的长辈都多方抚慰寿昌，让他独自一人睡在一间靠书房的厢房里。那房子有双合门，对着禾场，右边一扇门上有个木节脱落而形成的小圆洞。那天晚上有朦胧的月色，他回想父亲临死前后的情景，心里非常凄楚，辗转难眠，眼睛总是注视着门上的小圆洞洞。一阵冷风吹来，他忽然觉得身上发冷，回头一看，父亲正和他睡在一起，寿昌一下子就惊醒过来了。虽说灵魂并不存在，但也可见家中所处的逆境和骨肉离散的变故给幼小的孩子的心灵带来多大的刺激！

自父亲死后，家里因织绢赔本，家境一天不如一天。祖父母感到家里人多，难以支持，便让儿子们分家自过。毛坪里剩下的一点点田和一所房子由祖父母自己管理，儿孙们所分得的不过是一些什物器皿。农家有什么好东西？分给母亲名下的这一份只是一张破烂的柜子和六块楼板，连桌子也没有分到一张。母亲得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挑起重担，养活一家，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在这样的境况下，就连供寿昌一个人读书也无法保证了。

母亲无可奈何，只好亲自去找雨生满叔，要把寿昌领回来。她对满叔说：“您知道我实在没有法子，自从他父亲死后，家里又分了家……”满叔表示十分惋惜。他认为寿昌的资质好，继续学下去，定会有出息。如不读书，太可惜了。他答应免收学费，但因他的境况也不好，还得收点学米和油盐钱。说起来很有限，但在当时对寿昌的母亲来说，却是一个无法承担的重担。满叔也

终于很怅然地让寿昌拿起书包随母亲回家了。寿昌向大家告别的时候，他的同学们拉着他的手伤心落泪，依依难舍。

栖凤庐和老虎

分家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过着清贫的日子。寿昌失学在家，自己温习旧书，并教教两个弟弟识字。那时他还不满十岁，住在仙姑殿山下栖凤庐的梁三媪^①到垵里来看亲戚，因见寿昌母子孤单无靠，就热情地邀她们搬到她家同住。她丈夫梁三公原是一位秀才，早年去世。这梁三媪也知书识字，那时不过四十几岁的年纪。因她的名字中有个“凤”字，梁三公在世时特为她在仙姑殿下起了一所房子，名叫“栖凤庐”。她家人少，房子还空着半边没人住。寿昌家搬去后，她介绍他看《西厢记》、《红楼梦》等才子书。寿昌以前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直到见了这位风雅的老太太后才接触了另一类书，开始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栖凤庐在仙姑殿下面的一个山坡里，山峦环抱，环境非常幽邃。梁三媪性喜洁静，屋子里收拾得十分雅洁。进门去有一个两三丈见方的院子，栽着好几株茶花和天竺，下雨的时候，听着瓦上淅沥的雨声和着山上仙姑殿里传来的悠扬钟声，望着那飘堕的茶花瓣和给新雨润泽得更加红艳的天竺子，烧着从林间拣来的松球，喝着山里人家自制的清茶，讲经说史，谈论文学名作，真可使人超尘脱俗，浮想连翩，忘记人世间的忧患。

但现实生活却并不如此高雅悠闲。一家生计全靠母亲的十指

^① 媪（ǒu）湖南等地的地方方言，是对年老妇女的尊称。

来维持。那时米只卖六十个制钱一升。母亲是选丝的好手，选一两丝可以卖十二个制钱，每天只要选十两丝就能顾得一天的生活。为使寿昌的学业不致荒废，他的两个小弟弟每日到山里去打柴。当时也有些好管闲事的“好心人”来劝母亲嫁人，但母亲决心饿死也不改嫁，不去讨饭，不去给人家做佣工。母亲有时也到梁三煨毡房里坐坐，陪她谈谈话，每说到伤心处就痛哭一阵，再回到自己房里来选丝。那些日子梁三煨毡是寿昌母亲最深切的同情者。因为她也是经过许多痛苦生活的女人，她知道一个女人在旧社会要挣扎着过独立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仙姑殿后山中，林深草密，过去常有虎豹出没，但寿昌弟兄仍然大胆地去打柴。他们光着脚丫子上山，常常被茅柴杂刺将脚板刺得血淋淋地回来，弟兄们也不在乎，打了柴，高高兴兴地用小扁担轮流挑着，一路唱着山歌回家。

寿昌也常到仙姑殿里去玩。那是一座不大的庙观，平时香火不算旺盛。庙里的主持王道人，是一个身躯伟岸，须髯漆黑的老人，和寿昌很谈得来。他有不少旧小说之类的书，如《绿野仙踪》等。寿昌常跟他借书看，今天借来明天便去送还。起先王道人看他年纪小，不信他看完了，试试考问他，寿昌都答得出，并且还能讲出书中的情节和自己的体会。因此王道人非常赏识，并愿把自己的藏书主动拿出来给寿昌读。

仙姑殿附近的深山里，原先就有许多关于老虎的传说。栖凤庐前面的坡上，据说就是猎户与猛虎作过血腥的战斗的地方。平日晚间，当母亲和孩子们围坐在火房里的柴火边选丝，或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也常听得山上传来野兽的吼声。那像锯陶盆底似的声音便是虎啸，可知附近山上就有虎豹的巢穴。有一天晚上，

全家正坐在火房里，附近一个熟识的樵夫兴高采烈地抱着一对小虎崽子跑进来，说是他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发现一个老虎窝。母老虎出去了，窝里剩下一对小虎，全被他抱来了。他很想把它们喂大，将来送到省城里可以赚一笔大钱。这对小虎有一尺来长，浑身是黄色的绒毛，非常可爱。附近的人家听说寿昌家里来了小虎，都争着来看。火房里一下子挤满了人。下房王永清的妻子王大娘自告奋勇，要给小虎喂奶，不知怎么触怒了这小野兽，猛地吼了一声，依然不同凡响，把王大娘吓得连忙丢手。后来听说小虎也没有养活。喂虎要用牛肉，乡里人生活苦，吃猪油都要看日子，怎么舍得买牛肉供养它？结果不久就死了。

因为山里多虎，黄栗坡后面的猎户魏四爷便有过一次大收获。他在山脊的虎行道上，（因为老虎下山喝水都有一定的道路）挖了一个陷阱，上面吊着一只小猪。夜里小猪嚎叫，老虎来吃小猪，就掉进陷阱里去了。虎被关在铁笼子里，休想挣得脱。第二天清早老虎被抬到魏家。轰动了四乡。人们都来看活老虎。桐家冲的李三嫂子原是孙大老爷家的丫头，她的衣饰在乡下算是富丽的，刚从城里走亲戚回来，也来看热闹。那只虎在铁笼子里急躁地来回走动，不时伸出长满倒刺的长舌，流着腥液。因为围着看的人太多，更惹怒了这只大虫，忽然它像暴雷似的吼了一声扑向笼边的铁栏，把大家吓得直往后倒退。李三嫂子吓得两手一拍把手上戴的一对玉钏子全打碎了。

这老虎后来高价卖掉了。魏四爷尝了这一次甜头，又在岭上装了几架抬枪。一天晚上听得枪响，魏家欢喜得很，以为又打着老虎了，谁知打的是当地的一个李三疯子。他晚上回家时，疯疯颠颠地在山上游荡，踩着了药线，两腿被打得稀烂，幸好没有

被打死。魏家急忙把他抬回家去，请医调治，足足治了两三个月。寿昌那时亲眼看见了这些事，又在仙姑殿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印象很深。后来他根据这些素材，写了一个剧本叫《获虎之夜》，把李三疯子写成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演出时，那浓郁的乡土气息，逼真的农村人物形象和他们生动的对话，感动了不少的观众。这是和他幼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手足情深

寿昌在栖凤庐的时候，仍无法上学，心里很着急。梁三嫫娣曾劝他开馆教学，教教附近的孩子们，寿昌不肯，母亲也不同意，因为寿昌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啊！当初如果仅仅为了混口饭吃，就会让他去种田或是学生意，也不必费尽千辛万苦让他读书了。他那时虽还不满十岁，但个子长得高大，不像个小孩。因为过去拜寄在观音菩萨名下，没有“赎名”，剃个光头，所以别的孩子经常笑他是个“小和尚”。这时他坚决要求母亲让他留头发，母亲被他缠得没法，只好带他到金龙寺和真人庙去烧香“赎名”，才算结束了“小和尚”的生活。

那时省城开始兴办新学，影响到乡下，有些地方也改庙宇为学校。枫林港的清源庵办起了一堂所谓“洋学”——初等小学。寿昌听说，向母亲闹着要去上学，母亲求人借了点钱，托外祖父带他去见校长陈勤初太公，总算办了入学手续。寿昌住校，每周回家一次。陈勤初太公亲自教国文，他的学识渊博，教法也好，给寿昌的影响很大。除文言文以外，还有地理、历史、算术课。陈希贤先生教算术，对地理也极热心，寿昌开始片断地接受一些现代知识，他仿佛又闯入了一个新天地，对这些新鲜事物感到极大

的兴趣。常带些铅笔粉条回家，埋头写字、画画，还教两个弟弟读书识字。寿康（田洪）比较淘气贪玩，寿昌难过地对他说：

“三弟，娘千辛万苦把我们拉扯大，我今天能够读书，是娘，也是你和五弟牺牲了读书的权利，才能供我上学。现在我教你读书，你要用心呀！我们都是没爹的孩子，都是从苦水里挣扎出来的，我们不要再让娘操心了。”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寿康听了哥哥的一番话，想起死去的父亲，想起母亲的辛劳，一把抱住哥哥说：“哥哥，你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母亲见他们兄弟这样友爱，心里也感到非常高兴。寿康和寿麟见哥哥上新学很有意思，也吵着要上学。恰好附近的李家公屋办起了“洋学”，可以免收学费，母亲很想把两个孩子都送去，但她赤手空拳，连一家人勉强糊口都困难，实在没有这个力量。心想先让三儿（按堂兄弟排行）寿康去读书，把五儿寿麟暂寄到他外婆家去，但外婆家不肯，说要送就送三伢子寿康去，因他的年纪大些，可以做些砍柴、挑水、喂猪的事，而五伢子寿麟年纪太小，只会吃闲饭。但母亲因决心要供寿昌读书，最后狠了狠心，还是把寿麟（田沅）寄到外婆家去，把寿康留在身边。

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叮嘱寿昌带寿康一同到歌棣塘给外公外婆拜年。

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山上盖着很深的雪。他们刚走到塘边的时候，寿麟远远地就看见他的两个哥哥了。一边大声喊着“哥哥，哥哥！”一边高兴地朝他们跑来。当两个哥哥仔细地看看这个小弟弟时，眼泪就不禁簌簌地落下来。时值严冬，寿麟这时还穿着一件薄薄的夹衣，正在雪地里剥白菜，光着的脚丫子在寒风里冻得快裂了。寿昌的心里格外难过，他想到母亲拼死拼活地劳

动挣点钱只够供他一人读书，而两个弟弟不但不能上学，还要寄人篱下，受气挨骂。越想越觉得自己今后责任的沉重。他们赶忙拿起菜篮替他剥白菜，并要寿麟先进屋里去烤烤火，暖和暖和。

那天，寿昌和寿康给外公外婆拜过年，在外公家里吃了一顿中饭就回毛坪祖母家了。虽然乡下过年家家户户都很热闹，但他们一家四口却分在几处，连在一起吃顿团年饭都不可能。他们俩回来时，走后山经铜钱潭回去，想起该到他们父亲的坟上去看看。虽然没有钱买香烛，但兄弟俩很诚心地爬到半山上父亲的坟前，把坟头和周围的积雪清扫干净，磕了几个头。寿昌心想倘使爹爹在世，母亲和他们又何至困苦到这个地步，两兄弟冒着风雪在坟前抱头痛哭起来。

“小乡巴佬”进城

寿昌在清源庵小学读了一年，湘澄先生看他的成绩突出，是个可造之才，愿推荐他进省城升学。湘澄先生在当时算是一个新党，省城教育界里熟人很多，他给寿昌写了两封介绍信给省城的王惺和、张道南先生，拜托他们带寿昌去考有名的选升学校。寿昌从没有进过城，心里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动身那天，寿昌向母亲要衣服换，恰好母亲把衣服浸到水里去，准备洗。寿昌问母亲：“妈妈，我的衣服呢？”

“没了。”

“对的，妈妈。您放心，我这次考学校一定‘进了’。”

寿昌感到母亲的回答是个很好的兆头，兴高采烈地告别母亲进城去了。

寿昌是同九叔和“裁缝八叔”一道进城的。走的是崩壩那条

路，到望仙桥打中伙，当时米价便宜，在饭铺吃饭可以尽饱。当他们快走近小吴门的时候，“裁缝八叔”骗寿昌说：“寿昌，第一次进城的人都得拜城，你该磕头了。”寿昌没有上当，但当他走近那扇据说连“长毛”都没能攻破的一尺多厚的小铁门，进入那黑咕咙咚的古老的城门洞的时候，的确使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奇特的心情。城里的事物引起他很高的兴趣，两眼应接不暇，“裁缝八叔”笑他“乡里人进了城，两眼望不停。”其实寿昌这时的想法并不和乡下孩子的想法完全一样。

第二天一早，九叔首先带寿昌去见王惺和先生。王先生看过湘澄先生的信后，就带寿昌到选升学校去。那是一个大学堂，在贡院坪附近，大门上挂有慈禧太后的上谕。从大门到学校办事处要经过很长的过道，寿昌恭谨地跟着王先生走。惺和先生一直把他带到学校负责人——那时称作“学监”的张道南先生房里，拿出湘澄先生的信，作了介绍。张先生问了几句，立即带寿昌到另一间办公室，把他交给一位先生去考试。这位先生出了一个题目叫寿昌写一篇文章，他看了以后又送给张道南先生过目，张先生看了说：“很好”。就立即叫人给寿昌发了书籍文具，带他去上课。

一切都进行得这样顺利，并且当天就上课，这都是大大出人意外的，九叔和寿昌都愣住了。九叔再三感谢王、张两位先生的帮助，临行又再三嘱咐寿昌要发愤读书，便回去了。

当寿昌在屋子里考试的时候，看见窗子外面走过的都是些衣冠楚楚时派十足的学生。虽说是高小，但同学们的年纪有的比他大一倍。及至他走进教室的门，只见黑压压地挤满一堂，高踞讲台上讲课的是一位胖得像弥勒佛似的老师，后来才知道是曹石

渠先生。因为正在上课，同学们都回过头来望着这新来的土里土气的乡下学生。曹石渠先生的课毕竟讲得生动有趣，同学们很快又被他绘形绘色的讲课艺术所吸引住了。

省城里的学校比起清源庵来，到底气派大不相同。教室是那样多、那样高大，讲台上有了椅子，黑板可以上下推动，先生用颜色粉条在上面写的字、画的地图，是那样美丽夺目，差不多不忍让他随手擦去。下班的时候，同学们都一群群出去谈话玩耍去了，寿昌仍站在黑板跟前描摹老师画的地图，这都是他在乡村小学里没有见过的呀！怎能不感到新鲜和兴奋呢。

那时的学制，高小相当于今日的初中。所以选升学校的老师们教学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如教历史的是曹秋庸先生（曹伯韩的父亲），教经学、国文和数学的是黄湘泉先生，教音乐、图画的是黄晓东先生，教格致（物理）的是李曙之先生，教兵式操的是曹先生，教英文的是一位在抚署做译官的，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寿昌从乡下来到这新的天地，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但不懂得城里洋学堂的规矩。有一次在黄湘泉先生上国文课时，寿昌听老师讲得精彩，竟忘乎所以地顺口在教室里唱了起来。黄先生忙止住他，说：“喂，怎么啦？上课的时候可不能随便唱歌啊。”

同学们都笑了，寿昌窘得涨红了脸。有些顽皮的同学乘势想欺负他。但在下一周黄先生发作文本子的的时候，他的名字却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那时国文先生发卷子的次序是按照分数的多少而定的。当黄先生抱着一大摞作文本子上堂时，大家都紧张地望着先生的脸，及至他第一个叫到田寿昌的名字，同学们都不免

惊异起来。从此大家也不敢太轻视这个“小乡巴佬”了。

辛亥前夕的长沙学风

那时长沙的学堂都各有一些不同的风气，比如说“明德少爷”、“善化国民”、“修业叫化”、“选升吆喝”，这些浑名，寿昌常常听同学们说起，原因是明德学堂的学生多富家子弟，穿着相当漂亮；善化小学和中学是徐特立先生办的，学风刻苦进步，学生有喜谈国事的风气；修业学校是彭国钧先生办的，彭先生和狄昂人先生也是提倡简朴刻苦的，学生们布衣草鞋，不修边幅，恰与明德相反，所以叫“修业叫化”；选升学校学生多市井子弟，喜欢起哄，常常一站队就来一个吆喝，所以也有叫他们做“选升痞子”的。寿昌是个贫苦的农家孩子，在他们中间自然显得非常别扭。

尽管有这么许多不同之处，当时湖南的学生却朝着一个方向走，他们对清朝政府都很不满，想要把中国改革一下。一九一〇年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当三四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米卖到百文钱一升。省城里饥民闹事把岑抚台都赶跑了，将巡警道赖子佩吊在柳树上打。这些消息寿昌在乡里时也听说过，他很想进城去看看热闹。但当他到城里时，乱子已经平息好久了，抚台已换了余诚格。

火种还是在继续燃烧，当时选升学校的老师们差不多都是有新思想的，如教音乐的黄晓东先生就把《民报》上的许多文章剪集起来，私下里传给学生看。学校里除《长沙日报》等本地报纸外，还订了《上海时报》。时报的附刊是《滑稽时报》，常登载一些讽刺时政的文字和图画，如像讽刺庆亲王奕劻的昏庸误国和

废科举兴学校以后仍旧保留王室贵胄的特权等等。那时比寿昌高一班的同学彭梦南、曹典琦、黄芝刚、黄世琨等，仿效《时报》体裁用作算术本子的四开洋纸编辑《学生报》，照样有时论，有新闻、有文艺，有插画，在同学中传阅。虽是半游戏的东西，但在学生中也起了一些作用。那时长沙闹得最厉害的是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政府要人受攻击最多的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当时各学校学生代表曾在长邑中学集会反对铁路国有，选升学校的代表用纸扎了一个盛宣怀的头，挂在墙壁上，同学们拿起石子朝他头上打。开会时寿昌的同学吕恢猷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长沙日报》曾有一段报导说“长沙吕恢猷君年十六岁，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实在的，吕君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会后，同学们草鞋赤脚自愿到小吴门外帮助铁路局修完一段未完成的路。

寿昌当时也参加了会，心情是激烈兴奋的。他也上台讲演，但毕竟是个“乡巴佬”，过去没有经历这样的场面，讲完了话不懂得怎样下台，窘在台上好一些时候才被同学们“救”下来。

那时候高小毕业算是进学，中学毕业算是中举。乡下人真有送报条和做酒庆贺的，但到了辛亥前夕大家的兴趣就不在这里了。寿昌只穿过一次清朝的袍套，那是在全体同学到优级师范举行一个什么仪式的时候。站队回来大家都鄙夷地把那些清朝的袍套脱下来，乱扔在操场的地上了。

当时反清的潮流很盛，学生们只朝那些革命空气更浓厚的地方去，许多同学对选升也不满意了。有的劝寿昌去考修业中学，说那个学校办得怎样有精神。但入学考试已经过了，幸亏还补招新生，寿昌便和柳之俊、陈剑五、张伯陵三位改了名字去报考。

张伯陵改名怀，（即后来在辅仁大学任教的张怀博士）陈剑五改名雄，柳之俊改名英，寿昌改名汉，这就是他以后改用田汉的名字的开始。事有凑巧，他们四人都被录取。寿昌第一，伯陵第二，剑五第三、之俊第四，倒过来念，恰巧是“英雄怀汉”。同学们多有疑心他们是故意这样改名的，其实并非如此。但却与当时青年人的心理不谋而合，也是巧事。选升学校当局知道他们考了别的学校很不高兴，说他们“见异思迁”，把他们除了名。他们就正式搬到修业学校去了。

修业中学的学风在当时确实比较有新的精神，教历史的先生特别注重讲近代史。某次讲到甲午战争，先生指出清政府丧权辱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教训，用沉痛感人的话鼓励大家雪耻报国。教兵式操的是蒋葆山先生，他的教授法非常巧妙，能使每个学生像触了电似的服从他。他对于学生们的民族意识的培养灌输是有功的。他除了教大家唱“请看那印度、波兰……亡国惨痛”一类的激昂慷慨的军歌外，还时常带学生去“打野外”。到了小吴门城外的旷野荒山中，他就对学生们慷慨陈词，说起中国国耻的由来，改革时政的必要，常使这些青年感动得热血沸腾。回来的时候跑步特别起劲，因为都想借以锻炼好体格，将来为国效劳。正因为蒋先生深得同学们的心，后来学生军成立，大家都一致拥戴他当管带。

参加学生军

辛亥年二月，省城里来的人很多，形势已显得有点紧张。到了三月底革命党人攻广东的督署，牺牲了好些人。报纸上刊载的那些革命党人的“供词”，在学生中都争相传诵，少年的热血都

给鼓动起来了。绞辫子的，穿草鞋的人一天天多了。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湖北起义，十月二十二日——阴历九月初一湖南四十九标、五十标的新军手臂上缠着白布开进了小吴门和北门，杀了巡防统领黄忠浩、长沙县知县沈瀛门。

那天上午寿昌去铜铺巷找他的同学杨萃，杨君邀他到附近去看刚落成的湖南谘议局。在那所新建筑里，杨君谈起欧美的议会政治与中国的将来。当然也谈到最近报上所载湖北起义的情况和那几天大家所听到的消息。

“你看这次革命怎么样？”

“这次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只希望干得彻底些。”

“不过中国太古老了，旧的东西太多了。革命决不是在短暂的日月里所能彻底成功的。”

两人谈得非常兴奋，从谘议局楼上下来的时候，街上的人群已经闹嚷嚷地到处传开了：

“革命党进城了！”

“余抚台挖墙洞逃走了！”

“湖南反正了！”

他们朝议会东街走，迎面碰到一伙人蜂拥而来，为首的肩着一块木牌，上面贴着革命军安民的告示，年号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他们欢喜得跳起来。疑心是在做梦，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怎么这样快成功，而且这样容易！他们又有些担心。

但无论怎样，这是再好没有的事！街上的人碰见了，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彼此望着欢笑。群众见到手臂上缠着白布的革命军人，都高兴得想把他们抱起来。人们兴奋得无法尽情表达各人内心的快乐。那天革命军就在谘议局开会，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

作新为副都督。

这时听说北洋兵已经逼近汉口了，湖南派王隆中带四十九标援鄂，在荆州附近打了一个胜仗。军政府得到消息，发起祝捷大会，在教育会坪里搭了三个戏台唱戏，湘剧名伶陈绍益主演“血战荆州”，扮演一个革命军官。看戏的真是人山人海。那晚各学校的学生参加军民提灯游行大会，千千万万的男女青年高唱着：

“五千年来
专制恶毒
一旦扫而空……”

群众游行队伍打着灯笼火炬就像无数条火龙一般一直开进过去老百姓们轻易不敢走进去的抚台衙门。这里现在成了湖南军政府，焦都督身穿黄色军服，脚登长统马靴，站在桌子上对大众讲话。在灯笼火把的光焰里，人们看到了他那英武而忠恳的神态。那天晚上群众热烈的情绪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大家当时觉得真是革命成功了，中国从此有救了。

据说焦都督是革命党派来发动湖南起义的，他很想做一番革命事业。一来就废除了一些苛政，出榜文请老百姓都来议政。因为武汉军事紧急，他想动员更多的民众武装去增援湖北起义军，曾发起组织学生军，准备训练好了就开到湖北去增援，但没想到湖南的封建势力还顽固得很，不久焦、陈两都督都被封建军阀施展阴谋手段杀害了。后来虽然给他二人铸了铜像，但因基石没弄好，铜像一直躺在烈士祠前面的泥地里没有竖起来。

湖南军政府成立的学生军共招了一营人。连长都是选的读过书的军人，也有在学校教过兵式操的教员。营的管带，根据大家的意见推举了蒋葆山先生担任。营部设在法政学校的旧址。

学生军的士兵大部都是志愿报名参加的中学或高等学校的学生，因为招募学生军的宗旨是号召学生参军到前方去作战，寿昌和他的几个同学也都是抱着不怕牺牲的决心去参加这个队伍的。那年寿昌虽然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但个子长得高大，凭着一股革命的热情，坚决报名当兵。当时学生军的训练内容，除操场野外练兵之外，还在教室里上些军事课，有时还请些从前方打仗下来的军官讲讲实际作战的经验。大家听了都恨不得立刻开到汉阳前线，把敌人赶出武胜关去！

但令人泄气的是上级迟迟不给学生军发枪支武器，大家一再请求，仍没有发下来。据说是新换的都督“爱惜”这些青年学生，不想让他们真正拿起枪上前线去打镇压起义的北洋军，其实这是新督军阀想保存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

省城发生革命之后，乡下流传的谣言很多，有的说焦都督把余抚台赶走，他自己却又被别人当土匪杀了。又说选升学堂也被人捣毁了。寿昌很久没有写信回家，母亲在乡下非常着急，怕他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遇到什么危险，就买了香烛上山到仙姑殿找王道人，请他求菩萨保佑寿昌平安无事，早日回来。

“大姑奶奶，不用您拜托，我早已天天替寿昌在敬菩萨啦！他不会有危险的，‘吉人自有天相’，您尽管放心吧。”王道人很恳切地安慰她。其实他自己也是很耽心寿昌的，碰到有从城里来的人就打听寿昌的情况。

十一月，寿昌的表姐莲姑娘要出嫁，新郎是省城落盘桥开发行的潘海涛君。寿昌的母亲代表娘家进城去送亲，母亲很高兴，就先托人带信给寿昌。她进城以后，寿昌连忙请假赶来看望母亲。他那时穿着学生军的制服，皮鞋、绑腿，精神抖擞的，俨然

是个小军人了。

“你当了兵，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母亲见儿子这身打扮，既是惊讶，又带着责备的神情说。

“因为怕您老人家知道了不让我去呀。”

“你真要去打仗吗？”

“当了兵当然是要去打仗的，妈妈。”寿昌坚决地回答。

接着他详细地告诉母亲他参加学生军前后的情形。又说在军营里除伙食之外还发几块钱零用，他很高兴地拿出他最初发给的薪饷，献给了母亲，说是给她老人家买东西吃。母亲见儿子身体很好，心情也就宽慰得多了。她让寿昌自己拿钱买书看。寿昌问母亲关于两个弟弟的近况，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起来以后好同他一道工作，好像他已是个成熟的革命军人准备离开母亲、离开家乡，去干他所理想的事业了。那时当兵的看戏不要钱，寿昌当了两个月学生军，经常去看戏，成了戏迷。他对戏剧又特别爱好，革命的热情很高。为了宣传革命，在短促的时间里还编了《汉阳泪》、《新桃花扇》等独幕剧和《新教子》，都曾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新教子》是写一位早岁寡居的贤母鼓励她的独子参军到前敌去参加推翻清朝的战争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母亲决心送子参军为主题的。这可算是田汉最早的戏剧创作，可惜这些原作都无法找到了。不久南北议和，宣统退位。时局在暂时妥协的空气中平静下来。这支以知识青年为骨干的学生军成立不久便被解散了。

终身难忘的校长

寿昌离开了学生军，从军报国的理想幻灭了。由于祖父病

重，他随母亲在年底回到乡下毛坪老家。但他心中仍然时刻关心当时动荡的时局。焦、陈两都督的被害，谭延闿的上台，革命如昙花一现，又复归原样，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变化。他很思念长沙的一些师长和学友，时刻想继续他的学业。恰好此时听说徐特立先生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可以免收学费，很想去那里学习。他在家过了年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间又去长沙考进了长沙师范。徐老那时已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位名人，他在修业学校教书时为了宣传反清反帝，号召学生奋起救国，在登台讲演时当场用菜刀剃去了自己的一节小指，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这件壮举震动全场，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全湖南，使很多人觉醒起来。徐老从事教育工作多年，长沙的许多小学教员几乎都出自他的门下，辛亥革命时又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但他生活朴素，自奉甚俭，对学生热情培养，无比慈爱，所以许多学生都暗地称他为“徐妈妈”。长沙师范的校址最初在化龙池善化学宫，那是徐老辛苦经营创建的，后来又搬到荷花池漱潭寺的旧址，寿昌在这所学校里才算真正走上了求学、做人的大道。

徐校长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丰富学生各方面的新知识，在校内开辟出一大间整洁明亮的图书室，里面备有各种图书、报刊、杂志。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在课后都争着到这儿来阅读。有一天，一个同学用一张大纸抄写自己的文章，贴在图书室的玻璃窗上，吸引了不少同学。以后玻璃窗上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同学们戏称之为“窗户报”。徐校长对“窗户报”也很感兴趣，时常和大家挤在一起看。遇到好的文章还转载到他主编的《教育周报》上。因此同学们办“窗户报”的劲头更大了。后来还题了各

种刊名，如《晨钟报》、《醒狮报》等等。寿昌也编了一个《祖鞭报》，在上面写些时事评论、诗歌等。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徐校长发现他很有文学才能，就很注意培养他的专长。寿昌酷爱文学，欢喜读书，但家境贫困买不起书，每逢假日，他就到长沙图书馆去。进馆时交一个铜板作为门票钱，没有钱在外面吃中饭，就买一个烧饼带进去充饥，一看就是一整天。徐校长知道了，把自己买书用的一个折子交给他，要寿昌自己到书店去选购，年底结帐时，由徐老亲自到书店里去付钱。

长沙夏天蚊子多而且厉害，寿昌那时连顶帐子也没有。到了晚上，蚊子叮得实在熬不住，只得用被子蒙着头睡觉，可是顾得头来顾不着脚，寿昌气起来把床打得一片响。一个同乡的工友听见了，爬起来叫他：“这么多蚊子没帐子怎么睡呢？快到我房里去睡吧，我那里还有一个空铺。”

这样总算救了他，他困极了，呼呼地直睡到天亮。寿昌对此很为感动，一直记在心里，他以后总是很尊重工人的。他说：“世上只有穷人才懂得穷人的苦楚。”

徐校长听说此事，又立即送给他一顶蚊帐，并对寿昌说：“你有困难，要对我说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能好好读书呢！”

由于徐校长对寿昌无微不至的关怀，寿昌更加刻苦学习，成绩非常突出，一直到在长沙师范毕业。

寿昌对老校长对他培养关怀的恩情毕生不忘。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时刻没有忘记老校长对他的教诲。每当对朋友们提到徐老时他总是满怀敬意地说：“徐老永远是我的好老师，是我一生做人的榜样。”他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直到全国解放，

又在北京重聚时，师生相顾，都已是两鬓皤然了。此后寿昌还常到西城老校长家里去问候。在苦难岁月中，徐老对寿昌的教育和爱护之情，是他永生也难以忘怀的！

再见吧，故乡

寿昌在长沙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秋天，祖父病危，极盼寿昌回来，因为祖父平日最疼爱这三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寿昌又是长孙。但那时学校正举行秋季期考，他想祖父的病或者不至于那样严重。及至寿昌考完请假回家，祖父已经盖棺好几天了。长沙乡下有一种风俗，在死了人的时候，常约人家来“唱夜歌子”，就是在棺边挂一面锣，几位歌者一面打锣，一面唱，通宵不断。内容或是赞颂亡者的品德，或是批评亡者的家人亲戚。寿昌回来那天，虽然抚棺痛哭，到了晚上唱夜歌子的人还是在歌唱中骂他，大意是说他祖父那样钟爱他，而他却闻信不回来给老人送终尽孝。寿昌听了感到委曲，接过锣锤想辩解几句，但想起祖父过去对他的爱抚，悲从中来，哽咽不能成语，也就算了。

家里自分家后，这几年本已日渐衰落，祖父一死，更失了主心骨，大家心里都有凄凉无主之感。丧事结束的那天晚上，莲表姐和寿昌兄弟坐在塘边的草地上，谈起家里的事，十分感慨。她对寿昌说：“我是一个女子，又没读过书，没有多少办法，只希望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家里比现在要好一些。老一辈的人都不大行了，只有靠你发愤读书，给祖父争气，给妈妈争气了！你是老大，弟弟们都望着你，你得领着他们走，你走得对，他们都跟着对；你走错了，他们也就走不上正道了。”莲表姐说的这番话，使寿昌深为感动，姐弟们直谈到深夜。秋虫嘤嘤地叫着，夜风把

树叶吹得飒飒地响。夜深风冷，大家才回去睡了。

祖父的丧事过后，寿昌仍回长沙师范读书。母亲为了节省学费，照顾他读书，就带着寿康在长沙城北郊枫树坪临街大路旁租了一间房子，把一床印花床单从棉絮上拆下来，连同一件毛蓝布衫交给寿康去北门当铺当了三块钱，又向杜十公借了十块钱买了点家具、纸烟糖果在路旁摆了个茶摊。那时，粤汉铁路局正修新河铁桥，大路上行人不断，生意还好，每天至少可以收入几角钱，家里只要二百几十文就可以够一天的生活。寿昌改为走读，每晚回家。他的表舅蒋寿世以及同学皮国珍兄弟时常来家看他，他们那时都非常用功，常在一起读书、写文章，直到天明，每晚要照二百文钱的清油，寿昌在学校还负责编辑《青年报》月刊。蒋寿世也是在那时学会写文章的，后来到抗战初期他们在长沙还合作出版过《抗战日报》。那时他们都正当青少年，感情十分融洽，晚上天气寒冷就把脚伸到家里唯一的那床破棉絮底下去取暖，促膝谈心，直至夜深还不肯散去。

有一次寿昌的大腿上靠右膝盖处长了一个疔子，起初他还是一颠一颠地每天进城走读，因为没有钱请医诊治，疔子发展得厉害了，终至一步也走不动，只好请假在家。寿昌悲观得很，怕这条腿会废掉。他的同学吕恢猷、黄芝岗等来探望他的时候，寿昌因上不了学难过得对着他们直流泪。学校里的先生们对寿昌也很有感情，都很关心他，为他惋惜，甚至平时被学生称为“怪物”的教地理的黄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在上课的时候也止不住感情激动地说：“田生真是一可惜一得很。”后来母亲到处求人，找到了一个偏方，用苦瓜、丝瓜的叶子捣碎敷在患处，再服些中药，慢慢地总算好了，但走路还是不方便。因寿昌只差一学期就要毕业

了，那时继徐特立先生任校长的姜咏洪先生慷慨地替寿昌出了一学期伙食费，使寿昌可以住校读书不必来回奔走了。

一九一五年的年底，寿昌父亲的好友钟一伯从外县回来。他比寿昌父亲禹卿大一岁，也在外地当厨师。打听到寿昌母子住在枫树坪，特意来探望，他为人很热情仗义。禹卿死了，他看到孤儿寡母的光景如此清寒，非常难过。那天他喝了几杯酒之后，无限感慨地对寿昌说：“寿昌啊！这以后的日子就要靠你们兄弟了！你爹爹长年和我在一起作事，亲密如同手足，他为人清白，是很有心胸的人，不幸命运不好，一生从不曾得意过，那么早就去世了。我在外面听说了非常难过。你们的妈妈很有志气，全靠她一个人苦爬力挣把你们抚养大，真不容易啊！你们要发愤读书做事，替你们的爹妈争口气。”他说话时声音颤抖，眼眶里含着泪，寿昌弟兄很受感动。钟一伯临走时送给母亲三块钱。那天正是旧历除夕，这三块钱真是雪里送炭。母亲叫寿康到北门当铺去赎回那条印花被单和毛蓝布衫。母子们整整一年没有盖过被单，那棉絮都扯得快要碎了，感谢钟一伯的好意，使母子们在大年三十晚上重新盖上自己的棉被。母亲兴奋地缝好被子之后不觉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除夕晚上外面下着大雪，枫树的枯枝都被雪压得弯下来，但母子们的心里却感到异乎寻常的温暖。

当时梅臣三舅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成功后，常在外地活动。他对寿昌很关心，也很器重。寿昌常和他通信，三舅总是把他的信仔细加以批改，复信时一并寄还给他。这对寿昌的思想和文字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三舅有一个女儿叫漱瑜，是寿昌的表妹，从小和寿昌非常亲密，以后她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表兄妹同在城里读书，经常接迎，感情也就更深了。三舅喜欢寿昌

读书勤奋，有志气，是赞成他和漱瑜结合的。寿昌在长沙师范毕业的前一年，三舅因事回到长沙，住在旅馆里，特意把外祖母，及寿昌和漱瑜的母亲都接到他住的旅馆里，当着她们的面提出要把漱瑜许给寿昌。寿昌的母亲向来喜欢漱瑜，当然没有意见，但她想听听漱瑜母亲的意思如何。然而三舅妈始终鼓着嘴没有吭声。她过去就嫌寿昌家里穷，说田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她想把女儿嫁给门第高的人家。母亲虽然喜爱漱瑜，但她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对儿子的亲事，决不强求。她想只要儿子今后发愤成才，不怕没有媳妇进门。三舅对三舅妈这种嫌贫爱富的思想很不满意，最后他仍坚持作主把漱瑜的亲事说定了。

一九一六年夏季，寿昌在长沙师范毕业了，成绩优秀。许多同学都准备去当教员，寿昌却非常幸运地有出国继续深造的机会。因为恰好这时三舅被任为湖南留日学生的经理员，可以带寿昌同去东京报考高等学校。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简直使寿昌高兴得要跳起来，使他这个从未出过家门，更没有见过大海的乡村孩子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母亲此时的心情，像五味瓶子一样，甜酸苦辣都有。对自己辛苦培养寄予极大希望的孩子，现在居然能有“出洋留学”的好机会，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但一想到儿子就要离开娘的身边，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国家去，以后想见见面都不容易，实在是又舍不得又不放心。行期已很迫近了，母亲在城里帮助寿昌准备行装，寿昌也忙着到那些平日相契的师友处一一告别。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他随三舅在湘江码头登上“沙市”轮，动身先到上海再转赴日本。母亲和三舅母及两个弟弟、还有表妹漱瑜都到码头送行。三舅是在天涯飘泊惯了的人，倒没有更多惜别之情，而寿昌却是头一次离别亲

人和故土，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母亲临别千叮咛万嘱咐，依依难舍。漱瑜因父亲已为自己和寿昌订了婚约，心情当然比以前更为不同。她与寿昌相约等她在中学毕业后，也将去日本求学。呜呜的汽笛，催促亲人登岸。轮船缓缓启航了，三舅和寿昌在船头挥手向亲人们告别，母亲闪着银丝的头发在微风中飘拂，渐渐地在薄雾中消失了。船在碧绿的湘江中破浪前进，桔子洲头逐渐隐没在苍茫的烟树丛中，三舅即兴吟咏了一首诗：

西风无恙送征帆，
一幅潇湘晓色寒。
差幸同行今有汝，
不缘落笔兴初酣。
眼前人物皆如此，
乱后江山忍细看。
好向蓬莱深处住，
采将灵药驻童颜。

寿昌伴随三舅久久停立在甲板上，凝望着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的山水，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真有说不出的滋味。这个使自己抱着希望决心远渡重洋去学习的国家，果真是蓬莱仙境吗？将来能不能采回灵药来医治这百孔千疮的故乡呢？他凭着船栏、远眺麓山的烟树，俯视滔滔的江水，坚定地自语道：

“再见吧，故乡！再见吧，母亲！不管今后你的灾难如何深重，我终将回到你的身旁！”

邵 飘 萍 传 略

杜 钟 彬



邵飘萍画像

邵飘萍出生于公元一八八六年，即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原籍浙江东阳县南马区五十六都紫溪村。兄弟五人：长新苏、次新华、三新富、四新城（即飘萍）、五新昌。姊妹四人。其父邵桂林字坦茂，单名就叫茂。因儿女众多，在东阳无法谋生，迁到金华去开设歇家，（是当时打官司人的寓所）为人撰状，当土律师；也当过私塾的塾师，到后来搞饲鹿事业，家道渐裕。邵飘萍

生于金华，幼时天资聪敏，但甚淘气。在私塾读过四书五经，不肯用功，常受父亲之严厉教训。学习八股文章，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八九八年进了学，为秀才，时年仅十三岁。十五岁时曾到我村来拜过客，因此有人误认他是十五岁进学。这是邵飘萍在幼

年读书的情况。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邵入浙江高等学堂。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以优等毕业。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任金华府中学堂历史、国文教员。一九一一年邵在杭州与杭辛斋一起办《汉民日报》。一九一二年邵被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汉民日报》被当时袁世凯政府封闭。一九一三年邵为避袁世凯通缉，流亡日本，即在日本读书。所入学校众说不一。

《紫溪草谱》说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另据周天鹏听邵钦榭、吴义陶等说是振武学堂，又据潘公弼说是法政学校。但有可能是他所进学校，先后不同。他住过的地方，据了解有如下两处：一、日本福田公寓，此处离早稻田大学甚近。二、日本大阪海泉寺。

二

邵在日读书时，组织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汉沪著名报纸司东京通讯。一九一四年冬（民国三年甲寅），邵受沪友电召回国，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执笔。一九一六年六月（民国五年丙辰）袁世凯败死，邵飘萍继黄远庸北上，为《申报》驻京特派员。稍后，创新闻编译社（为国人首创之通讯社）。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十月五日创设《京报》。此时并在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平民大学任教，讲授新闻学。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夏，因抨击安福系内阁，《京报》被封，邵乔装逃沪。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二月受《朝日新闻》之聘，为《朝日新闻》顾问，此时邵再度前往日本。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直皖战后，安福系瓦解，《京报》复刊，邵辞去《朝日新闻》职务归国。

邵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九二二年九月）、《新闻学总论》（一九二三年六月）、《新俄国之研究》（在《朝日新闻》时代）、《各国社会主义思潮》等书。此外，他还写了很多通讯、社论，他的著作是十分丰富的。

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内提倡新闻记者广交朋友。上至官僚政客，下至舆夫走卒以及听差老妈子等，都要交际，谓对探索新闻有很大帮助。

他探听新闻，具有机警灵敏的特性。记得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有一次，他乘脚踏车潜入国务院会议室隔壁，窃听国务会议的秘密消息，当夜暗中乘脚踏车出来。第二天，别的报纸都没有这项新闻，只有《京报》上对这项消息全部刊登出来。当时这些军阀政府的官僚，都感到异常惊奇。他反对当时军阀政府的首要人物，如讽刺浙江省都督朱瑞谄奉袁世凯等为猪（朱猪谐音）、猿（指袁世凯）；讽刺浙江省巡按使屈映光文字不通，说他只认识象方箩大的几个字，没有几个稻闸（即稻桶）可装。并说他写一个“打扫天井”的条子，竟误写为“打扫天下”。讽刺袁世凯是猴子，段祺瑞狗屁不通。段祺瑞曾以执政府执政名义，召开善后会议，他称之为“恶后会议”。“三·一八”惨案时，反段更为激烈。又骂张作霖为众叛亲离的奉民公敌，骂吴佩孚除通电以外一无所成。据说：当时吴佩孚案头上写有“邵飘萍”三字，目之为眼中钉。

三

邵飘萍反对军阀和官僚政客，不怕冒风险，有强烈的正义感。记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我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

校图画手工师范系读书时，看到《京报》元旦特刊上刊登各军阀照片，并揭露他们的劣迹，十分尖锐。照片上标题是：“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冯玉祥将军”、“王承斌将军”、“张福来将军”等。他自己的照片也刊出报上，题“本社社长邵振青”等字样。又记得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李大钊等领导群众到石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并示威游行，执政府卫队枪杀和伤害学生群众多人，飘萍都把这些死伤学生群众拍成照片刊登在《京报》上，称之为某某烈士。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四月间，段祺瑞（自称执政府执政）及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实权，与曾被他们打倒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取得谅解，恢复合作。同时直鲁联军从河北、山东进驻北京。这时北京政局异常混乱。北京城内军阀机关林立，有各个军阀成立的卫戍司令部、警卫司令部、还有首都警察厅。北京城内各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常是肩背皮带、腰挂木壳手枪的军人，他们不买车票，随意上下车。车上经常军人满座，拥挤不堪。百姓买票上车的，反而得不到座位。这时冯玉祥军队已退出北京、天津一带，开到西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当权得势的多是从前被邵飘萍反对或攻击过的人。以前每次北京政局发生变化时，他往往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灵活机警地获得了安全。可是这一次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因为他倾向革命的色彩较为浓厚，与冯玉祥的关系又较为密切。因此飘萍只得暂时避居北京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内“养病”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军阀走狗，有在汽车上散发传单，讽刺攻击邵飘萍为“卢布党”记者的（指当时冯玉祥军队亲苏）。当时飘萍的堂弟（泛萍）捡到一张传单，拿给飘萍看，他说：没有关系，不要理它。他后来在《京报》上登载一则声明，略谓：

本人到现在为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我平日有何事得罪于你们，你一党，我一派，究竟为何乘机诬蔑而攻击云云。被讽刺打击者见报，恼羞成怒，在报上登出启事反骂说：“我们不指名、不道姓，你何必在自己脸上贴金？……”当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北京退出时，飘萍曾经撰写一篇文章在报上刊登，颂扬西北军纪律森严，步伐整齐，对人民财物秋毫无犯等。查当时西北军纪律很好，确是事实，但他表扬西北军，无异是批评了其他军阀军纪的败坏，自然要引起反对派散发传单来讽刺打击、阴谋陷害了。

飘萍因风声紧张，避居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为日稍久，感到忧闷不舒，又听说外面风声已变得缓和了，很想回到《京报》馆里来看看。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在《京报》上发现某一个标题排版有了错误，据说已经有电话打到报馆里叫他们今后要留心，并设法更正。于是他就乘自己的一辆汽车，回到北京魏染胡同《京报》馆里，和他的爱人汤修慧等谈话一个多小时，他还说将来回到家里后，要多请几席客，大家聚会聚会。

他从《京报》馆里出来，准备乘坐自己的汽车回德国医院，詎料此时已有密探等在车中。密探问飘萍道：“你是邵老爷吗？”他应声说：“是。”这样，密探认清这人确是邵飘萍。后来这辆汽车开到了北京首都警察厅。警察包围《京报》馆，门口设岗，不准出入，并在报馆内搜查。据说搜出了冯玉祥聘请他为军事顾问聘书一纸，军事电报密码一本，和冯玉祥合摄的照片等物，作为他犯罪的物证。但军阀阴谋，无所不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以上物证，是否实在，值得怀疑。当时我在北京丰盛胡同务本女子大学任教。飘萍是女大的校长，我听东阳同乡和飘萍

的亲属邵逸轩、邵泛萍等说，飘萍已失踪了，究竟被何机关抓去也不了解。过一会儿，才知道是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暗探把汽车直接开到警察厅里去了。大家就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记得当时有人建议说，奉系军阀张作霖是赵尔巽提拔的，托赵去讨情，可能有效，但亦不知有否去同赵说过。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城约有十三家新闻记者激于义愤，集合在一起，前往请愿，略谓我们是为保障人权而来，请求释放邵飘萍的。对方回答说：你们跟邵飘萍都是知己朋友，今天为他请愿，人事已经尽过了。邵飘萍也已有名誉了。现在我们虽然在此地谈说，可是飘萍是否在人世，已不可得知。态度非常坚决，不答应释放。各新闻记者扫兴而回。四月二十四日上午黎明时分，有好几辆汽车开来（其中一辆坐监刑官，一辆坐邵飘萍），多名警察分列两旁，把他押赴天桥刑场执行枪决。当时北京各报刊都有详细报道。枪决以后，就把尸体拍成照片出示布告，张贴各处示众。被杀的罪状是：“《京报》社长邵振青（飘萍）宣传赤化，贻误青年，毒流全国，罪大恶极”等语。邵死后其尸体装在薄板钉的棺材里，埋在崇文门外义塚墓地上，前面插一根木牌标志，写着“邵飘萍墓”字样。一面通知家属前往收殓，并在《京报》馆门口解除警察武装。到了第二天（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因为既是同乡，又系务本女大同事关系，所以偕同他的亲属一道到崇文门外二郎庙地方，把埋在泥土里的棺材挖掘出来。开棺后看到飘萍尸体，子弹从后脑进入，向前面左颊部位穿出，成一个小三角形似的。头发蓬乱，血迹斑斑。他身穿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丝光袜，红皮底黑色缎面鞋。当见到他那种被残酷杀害的惨状时，邵泛萍、邵逸轩等，莫不悲恸万状，卧地打滚，痛不欲生。女的眷属，有以手帕掩面，呜咽哭

泣，并焚烧香纸、冥钞、冥洋等物以表哀悼。还有亲属用清水和药水棉花把他的面部血迹仔细地洗刷干净，把衣服重新整理，换放在楠木棺材里，并用丝棉铺上盖好，送置北京殡仪馆。其家属邀请西藏喇嘛十余名，诵念藏经。因那时社会习俗，崇尚迷信，认为如此可以超生云。

飘萍原任务本女子大学校长，此校每月开支约计七百多元，教师是每月只发几元或十几元车马费，尽义务性质来任教的。飘萍被害以后，女子大学无法维持，只得停办了。所有校具仪器等物，都送给北京东方大学校长余天休了。我同郭维城等人，从此也失业了。

邵飘萍被害后不久，又有北京《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被奉系军阀杀害。当时《社会日报》规模不如《京报》大，经济亦不如飘萍宽裕。但是他的社论主笔，立言正直，立场坚定，思想进步，说话尖锐，与飘萍同样站在人民这一边打击着军阀，致遭杀身之祸。当时有人这样说：前有邵飘萍，后有林白水，他们性情相似，遭遇相同，遥想他们两人，会晤九泉之下，还当含笑。飘萍被难后，冯玉祥对他的评价，有如下两语：“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采访新闻轶事

宋 北 风

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当时有位新闻记者，名字叫邵飘萍，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不但自己办了一份《京报》，而且还兼任上海几家大报的驻京特派员。以采访新闻有独特的手段闻名。无论什么机密的消息，他都有办法打听出来。可是为了采访这条新闻，他却碰了不知多少次壁。他坐着自用汽车连国务院的大门都进不去。后来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

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

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

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竟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

虽然老段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帐立下了。这时，老段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

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老段，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

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

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

从此，那记者的大名，更为喧吓了。

苏曼殊的生平

黄忏华

苏曼殊是一个有多方面的才能的作家，能诗、能画、能写小说及小品文，又精于英文、法文，兼通梵文。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好奇尚美。他原名戡，字子毅，学名玄瑛，曼殊是他后来出家做和尚的别号，此外他的别号还很多。他的父亲名叫苏杰生，是广东省香山（现在改名中山）县沥溪乡人，在日本横滨经营商业，娶日本女子河合仙为妾，又和使女若子私通，于公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生曼殊于横滨的山下町。不到三个月，若子去，杰生把他交给河合氏抚养，曼殊始终以她为生母。六岁时（一八八九年），跟随嫡母黄氏回到沥溪。从七岁到十二岁，在乡塾就学。其间杰生于一八九二年因营业失败回到沥溪，河合氏独自留在日本。曼殊十二岁时（一八九五年）就喜欢作画。十三岁时，跟随他的姑母到上海，从西班牙马德里人庄湘博士习西文，并习中文，两年后，学业大进。到了十五岁（一八九八年），他跟随表兄林紫垣到横滨，考入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就学三年，进步甚速，间或作画，亦有佳作。十九岁时（一九〇二年），往东京，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第二年，改入日本陆军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既而因加入留学界所组织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为林紫垣所反对，断其接济，辍学回国，往苏州吴中公

学任教，旋又到上海《国民日报》任翻译。此时他将雨果《哀史节略》改译称为《惨社会》（又作《惨世界》、《悲惨世界》），又撰有《女杰郭耳纒》（旧俄无政府主义者）等文。不久往香港，住在《中国日报》馆，感怀身世，决意摆脱尘网，于是到惠州慧龙寺披剃出家，接着到广州长寿寺从赞初大师受戒，继承佛家曹洞宗的衣钵。其时二十岁。第二年，受不了做和尚的苦恼，于是携取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金往香港，从此自称博经，而以曼殊为法号。其时保皇党猖獗，曼殊倾心革命，决志以手枪刺杀康有为，后为友人陈少白所阻而止。

曼殊本来有南游的志愿，就在那一年得到旧师庄湘的资助（有说是黄氏的兄弟所供给），于春末从上海起程周历暹罗（即今泰国）、锡兰、印度。其间到暹罗的时候，在曼谷从龙莲寺长老乔悉磨深究梵文，精研佛典，并应聘在青年学会主讲。到印度的时候，往佛诞生处瞻礼。不久经过安南（即今越南）回到广州，转到长沙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就在那里住到第二年（一九〇五年）。暑假期中，有一天忽然着僧装、手筵杖，说是往游衡山，飘然逸去。旋到上海，次到杭州漫游西湖，继应江南陆军小学之聘，到南京教授英文。一九〇六年，先到长沙在明德学堂，继到芜湖在皖江中学任教。既而到日本省视他的母亲河合氏，没有遇到，就回国而辗转于芜湖、上海、杭州、温州各地。到第二年的农历元旦又到日本，在那里写成《梵文典》八卷。又在《民报》的副刊《天讨》刊布《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及《猎狐图》等；在《天义报》刊布《女娲像》等。并作有《秋瑾诗序》等文。女弟子仪徵何震（志剑）还把他所作画辑成《曼

珠画谱》。八月间他一度回到上海，十一月又到日本，第二年，译出《阿输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又编辑了一本英汉对照的诗歌集子，题作《文学因缘》出版。还在《民报》刊布所编的《岭海幽光录》、所译的《娑罗海滨遗迹记》。既而回国历上海、杭州而到南京。其时近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杨仁山（文会）在南京创设叫作祇洹精舍的佛教学校，延聘他教授英文。他素来对杨仁山的粹于佛学是极景仰的，就欣然应聘前往任教，并听杨仁山讲经。住在金陵刻经处（笔者就在这时候去访问过他）。由于授课过于劳瘁，得了咯血病，于是于一九〇九年初去日本。五月间将《拜伦诗选》全篇翻译完成，自己作了一篇序，又扩充为《潮音》一书，并每日到梵学会为印度婆罗门僧传译。婆罗门等捐献他们所有的旧藏梵本，他和桂伯华（念祖）居士等商议建立梵文书藏，没有成功。既而跟随河合氏旅行，在逗子海滨的樱山村小住。旋回国来往上海、杭州之间。其间《拜伦诗选》出版，并以英文撰《潮音》自序。既而又南游到新加坡，途中和旧师庄湘及其女雪鸿女诗人相遇，雪鸿赠以西诗数册。转到爪哇，应噶班《中华会报》所办中华学校之聘，教授英文。第二年（一九一一年）乘暑假之便，回广州，往日本，后仍然回到噶班任教。并将明末阮大铖所著《燕子笺》传奇译为英文，由雪鸿带到马德里，打算在欧洲刊行。武昌起义，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农历八月十九日），消息传到爪哇，曼殊喜不自胜，写信给柳亚子、马君武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振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不久又写信给柳亚子说：“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从爪哇回国。于农历元旦到杭

州，漫游西湖四日。旋回上海，应《太平洋报》之聘，任编辑，撰有《南洋话》、《冯春航谈》等文，后来又把旧著《断鸿零雁记》刊布。这一年的四月、六月他两次到日本，并在日本写成《梵书摩多体文》一书（已佚）。过后到安庆，在高等学堂任教。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的行踪，是杭州、上海、安庆、盛泽、苏州、日本、青岛，或一次，或二、三次。其间先后撰述及刊布有《燕子龕随笔》、《燕影剧谈》及《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人鬼记》、《非梦记》等小说。又出版有《汉英三昧集》。据说他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时，晋谒过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服务于机关刊物《民国杂志》。

他于一九一七年中，从日本回到上海，那时候他的肠胃病已经很重，以后更逐渐加剧，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死在医院里。其时他才三十五岁。南社同人把他葬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阴，题作“曼殊大师之塔”，并由社友诸宗元（贞壮）撰塔铭，略述他的生平。后来柳亚子又和他的儿子柳无忌，搜集曼殊一生的述作，编成《曼殊全集》并撰有《曼殊年谱》出版。一般说曼殊是华父日母所生，然而亚子有一个时期，根据所谓飞锡《潮音跋》及《断鸿零雁记》，认定曼殊完全是日本血统，并以金日磾相拟，后来根据曼殊堂弟维驥从苏杰生第二妾陈氏处听来的说法，改订了自己先前的看法。先前亚子还说“起初曼殊在广东的时候，他的父亲替他聘定了一个女子，名叫雪梅，后来他的父亲死了，女家取消了这个婚约，雪梅失望抑郁而死。既而曼殊东渡，河合氏有一个阿姊，想把她的女儿静子嫁给他，也没有实行。”这也是根

据《断鸿零雁记》所说的，并非事实。总之，曼殊自以为身世有难言之恫，故意把它说得情恍迷离，无怪乎别人更不容易弄清楚了。

曼殊虽然早年就出家做了和尚，然而他的民族观念，革命精神是非常强烈的。他所作诗，有“蹈海鲁连不帝秦”、“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等句；所作画，有《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等。《断鸿零雁记》，以宋末陆秀夫抱幼帝殉国崖山发端。《岭海幽光录》，记载明末广东忠臣烈女苦节艰贞的佚事。过平户延平郡王（郑成功）诞生处，有“袈裟和泪伏碑前”之句。他还在序秋瑾遗诗中说“秋瑾以女子身能为四生请命”等等。

曼殊的癖好很多，他好吃糖、吃肉、吃八宝饭，乃至鸦片、雪茄等类，好和女人打交道，常厕身于灯红酒绿之间，加上他的忧郁、疏懒、佯狂，十足表现出他的浪漫主义风格。

曼殊虽然不遵守佛家的所谓戒律，却也不放弃信仰，对于佛教还是很留恋，很关怀的。他研究过般若、楞伽、瑜伽及禅宗、三论宗，评论过佛教“应赴之法”的起源和流弊以及“崇拜偶像的不合。”

曼殊毕生于行脚中，日本是他的生地，河合氏又是日本人，所以他先后去过十几次。西湖是他所爱恋的地方，所以也到过杭州十几次。后来诸贞壮所作塔铭，就说他“终隐浮屠，夙恋此湖。”南游则远到印度，其时把他和唐玄奘的西游相拟，他最好的朋友诗人刘三作了一首《送曼殊之印度》，其中写道：“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枪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

曼殊的作品，以诗为最著，其次是画。他所作诗，现存的共九十首，大都是词句清丽、情绪缠绵而声调凄婉之作，是融化晚

唐绝句和定庵杂诗而成的。据他说还有无题诗三百首不传。所译诗，现存的有拜伦的《哀希腊》等及彭斯、豪易特、师梨、瞿德、陀露哆诸人的作品，大都用“选体”的词藻及句法译成。

他所作画，现存的有四五十幅，大都是天真幽淡之作，像他在《画谱》自序中说到山水画家的宗派，以王维一派为虚和萧敬，犹之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又说从郑度到倪瓒诸人，如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这都是他说明自己作品的师法的。

他所作小说，现存的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六种。大都脱胎于唐人小说，融合了近代小说成分。人们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在《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中，他把自己的身世穿插其间，令人误认为是他的自传。

此外他的写作，现存的有序跋十篇（画跋二十七则合算一篇）、杂文十篇、书札一百七十篇。他的编译，现存的有《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汉英三昧集》及《惨社会》五种。

刘大白事迹述要

陈 于 德

刘大白（一八八〇—一九三二）原名金庆棫，字伯贞，改姓为刘后，名靖裔，号大白，浙江绍兴平水人。平水是世界闻名的绿茶产地，金氏为当地大族。他家境较富，年少时就喜读书而不愿经商，与家长志趣各异，后来又为了反对封建婚姻，脱离家庭，改姓为刘，以示决绝。二十年代上半期，笔者曾在浙沪两地受过他的教诲。后又与他的侄子金小白在文教界做过三年同事，因此略知刘大白的一些事迹。

辛亥革命时期，刘大白与王世裕（子余）合编《绍兴公报》（系民办报刊、不是政府的公报）。王世裕是清末进步人士，曾办《绍兴白话报》。后与刘大白合作，先后创办《绍兴公报》和《禹域新闻》。他们办的报刊，除了诗词之外，评论和新闻等尽量采用白话文。这在清代光绪末年中小城市的书报上，是很难得的。

刘大白年青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因此，平水金氏的族人深恐被牵累，认为幸而他已与家庭决裂，而且已不姓金了。

癸丑二次革命时，刘大白在报上发表诗文，反对袁世凯，讽刺袁世凯。有人向袁报告后，刘大白被迫离浙，于一九一四年间

出国，先到日本参观考察，后到苏门答腊游历，这时他仍在华文报刊上撰文抨击袁世凯，宣传再革命。直到袁病死之后，他才回国。

一九一八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提倡新文化，在充实师资时，邀请刘大白为国文教员。刘反对崇古，任教后，废除读经，常以白话文和古人近于白话的旧体诗及当代的新诗为教材，并教学生多看新书报，多写语体文。他与同事陈望道协助经校长大力革新教学，这是当时浙江教育事业的一大改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经亨颐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就请刘大白兼任该会总干事。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后，经校长就召集全校师生开紧急大会。刘大白、陈望道、夏巧尊等爱国进步教师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动员学生立即响应北京，联合杭州各校同学，投入战斗。经、刘、陈、夏与学生一道上街宣传，并肩示威游行，振臂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激励了全市各界民众，推动了全省的运动。当时杭州报刊称他们（经、刘、陈、夏）为“五四浙江四杰”。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愤而辞职南下，寄寓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与总干事刘大白热诚接待，亲切慰问。北京“学联会”为挽留蔡校长，推派段锡朋等为代表南下，邀同上海学联的代表朱承洵等到杭州请求蔡元培回京时，以经亨颐、刘大白不但与蔡熟识，且系绍兴旧府属同乡，要求他们两位浙江教育界巨子支援挽留蔡氏的使命。他们就予以帮助，力劝蔡校长回京复职，领导爱国新文化运动。京

沪两地‘学联’的代表，对经和刘深为感谢。

“五四”期间，刘大白兼《杭州报》编辑年余，后为上海《民国日报》撰文，更积极地提倡新诗。上海《民国日报》增辟副刊《觉悟》，由该报创办人邵力子——刘的同乡友人——兼任主编。他要刘大白供稿，刘大白就经常以提倡新文化和解放妇女为内容写文章和新体诗寄给《觉悟》。直到一九二五年初邵力子离沪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工作为止。这期间他的新诗发表得很多。

刘大白于一九二二年曾把他以前在杭沪报刊上发表过的许多新诗经过整理修饰，汇编成册，题书名为《旧梦》，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新诗集还很少，他这本《旧梦》，只印了二千册，不久就售完了。由于他不曾把“版权”卖绝，商务印书馆征询他是否再版时，他谢绝了。过了数年，他把《旧梦》集分散，加上二十年代中期的许多新作，卖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四本新诗集，书名分别为《卖布谣》、《叮咛》、《邮吻》、《秋之泪》。一九二六年前，他把写过的诗话，汇编为《旧诗新话》，也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销路更好。

刘大白的旧诗，从民国初年起到二十年代末，也陆续在绍兴、杭州、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发表过几百首，其中也有不少动人的佳句，但他却只出版过上文所述的几本新诗集，不愿让编旧诗集。上海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和总编辑夏巧尊曾经问他：“既然出版了新诗集和《旧诗新话》等，为什么不愿出旧诗集？”他说：“我们提倡白话文、白话诗，何必再出旧诗集！”直到一九三二年他病故后，才由老友王世裕搜集他的旧诗遗稿，编为《白屋遗诗》，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一册旧式的线装本诗集。

刘大白本来很喜欢词。他在沪杭旧书店或书摊上看到古代小名家或无名词人的诗词集、诗话词话等，总喜购阅。他所写的新诗，也富有词的情调和意味，例如他在杭州时所作的《卖花女》：

春风料峭，女郎窈窕，
一声叫破春城晓。
花儿真好，价儿真巧！
春光贱卖凭人要！
东家嫌少，西家嫌小，
接头娇骂嫌迟了！
买花人笑，卖花人恼，
红颜一例和春老。

诸如此类的新诗他写得较多。至于他的旧体诗，常喜白描。他反对雕琢，反对用典，常说：“写诗作文为表情达意，否则，等于‘卖关子’、‘卖秘诀’了，那何必多费笔墨呢！‘夜梦不祥’明白易懂，假使写作‘宵寐匪楨’，显示古雅，那实在有如金漆马桶，并不高明！”他的旧体诗也似白话的一样。如他二十年代初自杭州回乡时，在钱塘江上所写的“口占两绝”，就是一例。

又向山阴道上行， 千岩万壑竞相迎，
故乡多少佳山水， 不似西湖浪得名。

若耶溪水迎归客， 秦皇山云认旧邻，
云水山光重洗眼， 似曾相识倍相亲。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邵力子准备离沪南下时，向复旦大学李校长推荐刘大白继任他的教职。当时陈望道已在复旦执教，于是，“五四”时期浙江省第一师范的两位老同事又在一起了。

一九二五年秋季，复旦中文系主任叶楚傖，因邵力子南下，既忙于上海《民国日报》的社务和笔政，又急于准备赴广东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事业。就把系主任行政事务委托刘大白代理。次年，叶楚傖离沪南下，就由刘大白接任系主任。以后刘与陈望道又介绍浙江省老同事夏丏尊（当时为上海开明书店总编辑）继任叶楚傖的教职。这样，当年“五四浙江四杰”就有三位都在复旦中文系执教了。

刘大白为主任教席，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等。他编撰的讲义稿，凡是指男性的“他”字，都写“牠”字，指女性的就写“她”字，而指其它事物的都写“牠”字。当时笔者兼“复旦通讯社”编辑，复旦中文系文书孟慎欲对笔者说：“我在浙江和上海的大中学里，当过许多年文书，从来没有抄写过这个‘牠’字，刘先生大概早在清末民初就主张男女平等了吧！”后来，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刘大白的一本《白屋文话》中，也有许多“牠”字。他常在教课中、或报刊上，说古文是“鬼话文”，是古人的话语，说今人的白话文是现代人的语言，是“人话文”。又说，我们为了研究祖国的学术和文艺，要认真阅读古人“鬼话文”，但不必也写“鬼话文”，应该写今人的语言，写“人话文”。他讲课时一再说过：“北伐革命后，两个姓章的，还常写深奥的鬼话文，卖秘诀似的令人讨厌”。当时他指谁？听的人都心中有数。

刘大白在复旦任教时，主编《黎明》半月刊。由开明在书局经售。撰稿的有陈望道、徐蔚南、谢六逸、王世颖等教师和职员，以及学生马彦祥等。王世颖原系早年复旦经济系毕业生，常在报刊上提倡‘合作主义’。刘为系主任时，王为助教兼《时事

新报》副刊《青光》编辑，笔名夫凡，著有《合作概论》等书，（后为国民党社会部合作司司长）。他这位合作学者在复旦任职时与一个同姓的女子王绮馨结婚。旧社会同姓不结婚的习俗由来已久。刘大白对他们‘两王’结合专题白话联一副祝贺：

打倒同姓不婚 拥护本家合作

平日不少慕名而来请刘大白代撰‘贺联’、‘挽联’、‘寿屏’、‘墓志’的，多愿致重酬。他统统谢绝，不肯应付。他说：“别人家喜乐或悲哀，与我毫无关系，怎么可以代为歌颂或代为哀悼呢？尤其是写什么‘挽联’，怎可‘无病呻吟’呢？至于做什么‘寿屏’、‘寿序’，无中生有，好话连篇，实在可笑！有些人对大官僚大财主歌功颂德，那是‘庙堂文学’，不屑一顾！”他一贯不愿意代人动无聊的笔墨。

北伐战争攻克南京后，叶楚伦和邵力子推荐刘大白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他仍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不久，蒋梦麟（浙江余姚人）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邀刘去任秘书长（当时尚未设副厅长）也就是幕僚长。蒋梦麟经常采纳他的意见，甚至有时刘自作主张，处理事件，事后蒋也同意，因而有职有权。

刘本有一枚石刻的图章，镌着“寻常百姓”四个字。他所有的藏书上面，大都盖上这枚印章。他一年四季，向不穿绸，就连长衫马褂，也是布质的。原来他讲平民化，作风如是。他当了官（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以后，那枚图章仍不放弃，照常盖用。但在代表厅长蒋梦麟出席浙江省的政府会议时，见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等幕僚长没有穿黑布马褂和灰布长衫的，虽然他自己仍不穿绸，但终于改著玄色哗叽马褂和灰哗叽长衫了。因此亲友们说

他已不是‘寻常百姓’、‘学而优则仕’，出入坐轿车了。

不到半年，有一天教育厅门房进告刘大白说：“有一位带着绍兴口音的中年妇女，自称姓何，来过两次，一定要请见秘书长……”刘说：“叫她在会客室里稍等……”接见时，她愁眉苦脸地对刘说：“你做官了！我生活困难……”要求帮助。刘说：

“十多年前，我再三劝导你不要离异，你始终不听，还说我这样那样……，你咎由自取！”她哀求似地说：“过去的，象你的诗集《旧梦》一般的随它过去算了！我，我后悔也迟了。现在，你如能经常接济我一些，就感激不尽了！”刘说：“如果你以后不来啰嗦，我每月汇给你二、三十块钱，视情况而定；可是，你倘再来，那就停寄！我忙，你去吧！”那人就含泪留下地址而去了。

她是谁？她就是北洋军阀时期绍兴有名的越东才女何爱贞。当年她与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刘大白自由结合。诗人才女，红袖添香夜读书，曾为当地文艺界谈助。他俩当时同居在浙江萧山诗人沈玄庐住宅附近的自称“白屋”之中。但是过了几年，刘大白因工作关系，经常外出。她竟被当地一个‘巡官’引诱，受骗上当……再三要求刘同她离婚，刘大白多次劝导，叫她慎重考虑……，她对他说：“你在报刊上倡导妇女解放，婚姻自由，难道能说不能行吗？”……后来他还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不咎既往，苦劝她不要离异！他在这信内又加了一个信封，上面题着两句词：“此信不寻常，中有泪千行。”她拆读之后，无动于衷，竟自单方面离开了。从此，刘大白不再娶妇。

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时，蒋梦麟指派刘大白与杨廉（时为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校长）两人代表浙江去出席会议。刘在会议上提议全国大中小各校都必须男女兼收，

说虽然小学已不成问题，有几所大学也已开放女禁，但中学还男女分校，也须兼收。当时代表广西出席的黄华表（二十年代初‘复旦’毕业生、广西省教育厅长）却当场反对中学校男女兼收，力图否决刘的提案。刘和杨廉一再强调中学也必须开放女禁，与黄等争论不已，闹得议而不决。刘、杨两人曾一度退席，搞得全国教育会议几乎散场。

刘夫白早在当上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后不久，就曾命令他故乡（绍兴）的‘县立女子师范’并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施行后，并没有什么问题出现。一九二八年刘大白陪同何应钦等到绍兴视察并游览名胜古迹时，何看到‘浙五中’有许多女生，就对刘说：

“怎么绍兴的中学，倒先实行男女同学了？”刘说：“有许多教育工作者还怕男女同校要发生恋爱事故，但绍兴这里实行以来，没发生什么问题。假使要谈恋爱，那即使男女分校，或把女校迁到乡区去，也难免要发生男女事件。主要的问题，在于对青年的教育……。”何应钦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一九二六年刘大白还在复旦任教时，就竭力附和陈望道反对校长李登辉不开放女禁。他曾对李说，索性把校牌改名为‘复旦男子大学’就算了。几经坚决要求后，李校长才不得不允许兼收女生。

一九二九年夏，蒋梦麟由蔡元培先生等推举，升充为南京政府教育部长，刘大白随同为常务次长。马叙伦为政务次长。不久，马因事辞职，就由刘升任政务次长。刘在教育部的时间不长，因为陈立夫和朱家骅都争夺“教育部长”这一席，蒋梦麟虽然内行，但在国民党里的势力远远不及他们，未及一年半载，就被挤出“府院”。刘大白也只得悄然离宁。他抵杭后，因情绪不佳，所患的肺病，日渐严重了。

一九三一年夏，他在杭州西湖附近的钱塘路九号小洋房寓所养病，忧愤失意，病情日重。笔者去探望时，他说沪杭医药界友人，多诊治过，但无特效药，他说他恐在世不久了。笔者安慰了几句，知道他胸膜疼痛，未敢多谈，就请他保重而告辞了。到了冬天，笔者自沪回绍时，路过杭州，再次到钱塘路去看望他，他的家人说：“他已卧床难起了。”只好留下名片而去。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寇侵沪，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这期间，笔者在宁波闻知他在杭州逝世，即向他的侄子金小白致书慰问。……事后据小白面告刘的遗嘱，内容大致如下：（一）叫家属治丧要简单；（二）请医院解剖，把他的心肺取出，以供今后医疗上研究；（三）要水葬。说最好在下午两三点钟左右钱塘江涨潮时，把他的遗体投入江中……（四）藏书代他送给国家图书馆。以上这四点，亲戚等会商之后，只依照了第一点，既不为之解剖，又不投江水葬，而将他埋葬在西湖灵隐附近了。关于他的藏书和遗稿，因南京政府没有给什么抚恤金，还是卖给上海各书局，得了两三笔钱留给家属应用。诗人、文学史家刘大白的一生，就此终了。

早在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前十年，刘大白就在绍兴《禹域新闻》上发表白话文。他的著作除了上文记述的几本新诗集及《旧诗新话》和《白屋文话》外，尚有《白屋说诗》、《文字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由上海各书局出版之外，他的老友王世裕还收集了他的旧体诗遗稿，交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了《白屋遗诗》，还有徐蔚南搜集的他的部分遗书，由上海青光书店出版了《白屋书信》。

五四时期的青年女作家石评梅

王 庆 华

石评梅，原名汝璧，山西省平定县人。在“五四”前后那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精神的石评梅，因受新思潮的冲激而逐步成为一位“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尽管她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她也因之一度陷入了徬徨、苦闷之中，但是在当时那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推动下，特别是在我党早期革命家、高君宇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引导下，她不仅“从悲惨黑暗的地狱里挣扎出来”，而且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为武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提倡并致力于新教育，向顽固的封建堡垒展开了韧性的斗争。

从“才女”到“忧国志士”

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石评梅诞生在山西省平定县城姑姑寺街的一个书香之家，世祖中有不少人为官。其父石铭，字鼎臣，系清末举人，民国初年曾在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后以教书为业，思想开朗，性格刚强，治学严谨，是一位为当时社会所尊重的儒者。

石评梅“幼即颖慧，酷嗜读书”。因之，她的父母对她十分喜爱，在她身上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她尚未入学的时候，父亲在

公余便教她识字读书，要求甚严。

石评梅在山西省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就直接升入这一师范学校。她学习十分刻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她尤喜作文，下笔千言，才华横溢。她还喜欢音乐，擅歌舞，长于体育，师友亲朋均以“奇才”视之。由于她声誉很高，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敢作敢为的气魄。因此，学校里开会，她常常是组织者和主持者。

升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后，石评梅思想变得愈来愈活跃，对新思潮，新事物愈来愈感兴趣。她是平定县第一个剪发的女子。当“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的时候，山西爱国学生闻风奋起，立即成立山西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爱国学生，进行罢课、集会、游行示威等斗争。但是，石评梅所在的山西女子师范学校当局，却下令严禁女学生跨出校门。在这种情况下，石评梅仍然通过组织同学撰写文章、编印刊物，参与这一爱国斗争。她们油印的刊物虽然只出了几期，却在女师校内引起较大的震动。因为她是风潮中的骨干分子，学校当局决定照章开除她的学籍，以达到“砍一斧以震百岭”的惩戒目的。但又惜其才，不久便复令恢复了她的学籍。在“五四”浪潮的冲激下，石评梅冲破封建礼教的种种羁绊，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一位思想新颖的女性。

“五四”运动后不久，石评梅即以优异成绩毕业了，当时她年仅十七岁。她“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寻求真理和光明，于同年毅然辞别父母，只身负笈抵京，考入了当时全国女界教育之最高学府——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本欲报考文科，但因这一年女高师不招文科，便考入了体育科。

当时，担任北京女高师校长的是许寿裳先生。这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学者和教育家，他在任校长期间，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聘请李大钊以及一些进步教授来校讲学。这就使女师大的校园里的科学与民主的气氛愈来愈浓厚，新思潮的浪涛愈来愈激烈。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使石评梅大为振奋，她立志“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之事业”。她在认真完成课业之余，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中汲取着丰富的精神营养；一方面留心时事，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当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同志在女高师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利用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石评梅有幸聆听李大钊同志的讲课，并深受其影响。她和朋友们创办的《妇女》、《蔷薇》等刊物中之所以大力宣传妇女解放运动，是与这种影响分不开的。同时，她还喜欢广交朋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刘和珍烈士，在当时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黄卢隐、陆晶清等人，均与她为“莫逆之交”。在和这些良师益友的交往中，“温婉聪明，秀气孤寡”的石评梅的思想境界愈来愈高，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和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本质看得愈来愈清楚，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她“每与校中同学言及邦国颠危，则慷慨泪下”。其爱国热情，深受同学钦佩。

怀着这种对祖国最深沉的感情，石评梅以白话文为武器，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她不愿做“花瓶中的芍药受人供养”，立志做“翱翔万里”、搏击风云的“飞鹏”，决心用“血泪去改造粉饰那荒芜的花园”。在向顽固的封建堡垒发起的斗争中，石评梅

逐步成为一名新文化战士。

在绝望中遇到高君宇

当年，石评梅只身抵达北京的时候，仅十七岁。她的父亲不放心，辗转托请一个在京的同乡照顾女儿。谁知这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轻浮子弟。他虽然已有妻室，却疯狂地追求石评梅。而对世事的狰狞认识极为肤浅的石评梅，在这种“热情”的追求下，终于献出了一颗纯洁真诚的心。虽然她很快就认识了这个视爱情为游戏的轻浮子弟的丑恶灵魂，并毅然与之绝交，但是，她的心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同时，她在这京城繁华之地目睹了黑暗社会的种种冷酷现象，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和世态的炎凉，以及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这一切，都灼伤着她那颗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心。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她“象只小白羊离群倒卧在黄沙凄迷的荒场。”而郁积在她内心深处的悲痛，就象滔滔潮水一样从笔端倾注而下，于是一篇篇感伤之作便问世了。她吟唱着生命的悲歌，不知该走向哪里。

就在这彷徨悲悒之际，高君宇同志向她伸出了友谊之手。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他“五四”后用的号。他于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期，他奋勇当先，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烈行动。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帮助下，走上了一条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先后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我党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

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曾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共北方区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编辑。一九二三年，参加党的“三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二七”大罢工时，为罢工领导者之一。他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军阀进行斗争的同时，还致力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被人称为“青年革命之健将”、“革命的实干家和革命的理论家”。这位革命家恰是石评梅的父亲在“山西省立一中”的学生。当年石评梅对他虽有所闻，但一直无从相识。一九二二年春在“山西同乡会”里同高君宇结识之后，因会务来往和社会活动的接触，两人感情逐渐深厚起来。他们频频约会，互吐衷肠，从胸中的苦闷到对未来的憧憬，无所不谈。石评梅被高君宇那伟大的革命志向、宽阔的革命胸襟和卓越的才干所吸引，并从高君宇身上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力量和勇气。而高君宇则越来越深刻感到石评梅胸中那“说不出的悲哀”。为了挽救这一精神上沉溺于苦海中的女子，他对她讲述人生的真谛、讲社会制度、讲革命斗争，循循善诱地引导她奋力前进。他还给她寄赠革命刊物，其中就有高君宇亲自编辑的《向导》、《政治生活》等，用以启发她的觉悟。当然，在他们之间由于政治见解不同，也有争论，譬如他们看了苏联电影《复活》后，就各持己见，展开辩论。石评梅认为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行动未免过激，她所以上当受骗是因没文化所致，妇女只要有了知识就可获得解放；高君宇则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有妇女的解放。不久，他还在《向导》上发表了《女权运动者应当知道的》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正确观点。

在高君宇这位“人生的向导”的引导下，石评梅终于恢复了

昔日的青春活力和斗争勇气。关于这段生动，石评梅后来在悼念高君宇同志的文章中追述道：“往日，我怕恶魔的眼睛凶，白牙如利刃，我总藏伏在你的腋下越起不敢进，你一手执宝剑，一手扶着我，践踏荆棘的途径，投奔那如花的前程！”

这时，石评梅对人生、对社会、对革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她同情革命，靠近革命。在高君宇的陪同下，她曾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室’的译音）作过文学专题讲话，还同这个研究会的同志去革命者秘密聚会的陶然亭谈过关于诗的问题。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中回忆道：“……评梅极爱其香塚诗，”并云：“近人陶然亭诗中‘万丝垂柳划斜阳’句，最为警策。”“二七”惨案后，身为这次罢工领导人之一的高君宇被北京军阀“通缉”，“屡遭煎迫，往往辗转东西”。在那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石评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掩护高君宇脱离险境。她的住处几乎成了高君宇的避难所。有一次高君宇因军警追捕甚急，不得不离京远走时，鼓励石评梅：“不要怕，莫要紧，我就是被捕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怕，就不做这项事业了！”高君宇离京后，她通过书信和高君宇一直保持着联系，还鼓励高君宇努力从事自己的事业。

在共同的斗争中，石评梅和高君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萌发了爱情之芽。当高君宇把象征着他们纯洁爱情的象牙戒指从广州寄赠给她时，她激情难禁，表示：“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世。”

然而，正当他们的爱情宣告成熟的时候，高君宇同志为革命事业，“劳苦过甚”，积劳成疾，住院治疗。在病榻前，石评梅含泪守候，精心看护，并表达了一片深蕴的衷情。高君宇说：这

些日子他是“痛苦中浸淹了的幸福者。”但天不假年，高君宇终因病体羸弱不堪，治疗无效，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与世长辞。石评梅悲痛欲绝。当高君宇遗体在陶然亭安葬时，石评梅含泪在其墓碑上刊了高君宇生前最喜爱的“言志之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在诗后写下了几句哀怨痛楚的话：“……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在追悼会上，石评梅哭吟了她写的挽词：

“……红花枯萎，
宝剑深埋，
你的宇宙被马蹄儿踏碎，
只剩了这颗血淹浸的心，
交付给谁？……”

其后，她写了许多悼念高君宇的诗文，以寄托哀思。其情之悲，断人肝肠。她在悲痛之余问道：“我用什么才能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呢？”

《爱的教育》的忠实实践者

高君宇逝世后，石评梅在哀痛沉思之后，擦干泪渍，勇敢地抬起了头。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已不是先前那样呜咽哀号，颓丧沉沦，我如今是沉默深刻，容忍含蓄人间一切哀痛，努力去寻找真实生命的战士。”

石评梅终于找到了她所说的“真实生命”即为挽救中华民族而奋斗的事业。她奋斗的武器就是文艺创作和教育事业。

早在进入北京女高师之前，石评梅就对中国“女子大多纤弱

娇柔，不足以救两万万同胞于水火”之现状深感不满，并立定了献身教育事业，振兴女学的宏伟志向。女高师毕业后，林砺儒先生见她品学兼优，就聘请她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主任兼体育教员（一九二七年后兼国文教员）。以后她又先后在春明女校、若瑟中学、女一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任过教员和讲师。

这时，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已由我国著名作家夏丏尊先生翻译介绍到我国。对当时学校所缺乏的“感情”和“爱”这一现象深感不满的石评梅，立即被这本书所阐述的思想所吸引。她曾说：“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才晓得我太自私了。我最近读一本小说《爱的教育》，读完之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我爱她们，我明白了我以前的错误。”为什么一本没有庞大结构和曲折情节的书，却能震动石评梅的心灵呢？这是因为作者不仅赋予这本书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爱”，而且挖掘了人民中间蕴藏着的精神道德的美的矿藏。这些，石评梅认为是具有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的潜在力量的，她对此书推崇备至。她发表在女一中校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还说：“我从今以后，处处多用真情感化她们。”

的确，石评梅在实践中是始终如一地实施这一思想的。她在运用一种理智的指导法的同时，象一位温和的大姐姐似的以一种坦白热烈的真情来感化学生。为此，学生们无一不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指导，受到她的感化。她经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爱的教育》中那一个个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的故事，向学生们灌输着尊师爱友，爱国爱民、诚实等思想。她不仅对教学兢兢业业，从不敷衍；而且不断探求新的教授方法。她常常要工作至深夜。

北师大附中一位有教育心理修养的国文教师汪震先生，曾根据她对北师大四年级女生的一次讲话和平常的教育实践，对石评梅的教育思想作了如下概括：一、男女平等；二、学男子的优点（爽直、果断、勇敢）；三、保持女子固有的优点（留心、精细、温柔、典雅）；四、平民化，朴实，注重体育。有人在她逝世后沉痛地说：“新教育倾向上少了一人，少了一个极大的实行者。同时学生们失去了一个处处以真情待人的母亲式的教员。”

她的学生在悼诗悼文中，尊称她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星！”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忘也。”可见学生对她的敬爱之情是何等之深！

“写哀时之痛”的女作家

石评梅“夙喜文学”。她考入北京女高师后不久，就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白话文写诗。她的作品大多发表在《京报》、《社会日报》等报刊上。她刚跨入文坛，就显示了她的创作才华。她的作品文风清雅、辞藻华丽，且富有诗情画意。她这一时期所写的大多是《梅窠漫歌》一类的作品，今天看来尽管有些浅薄、幼稚，然而，在“五四”后不久的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写诗而采用白话文，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她不仅写诗，也写散文、小说，偶尔还写剧本，如一九二二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是谁的罪？》。

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石评梅的作品逐渐成熟起来。但是，由于她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遭遇不幸，她的作品大多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如《残夜的雨声》、《模糊的心影》、《疲倦的青春》、《一瞥中的流水与落

花》就是这样的感伤之作。

但是她在抒发愁苦之情的同时，仍怀着“欲唤醒沉沉数千年的同胞和恶魔奋斗”的强烈愿望，喊出了激励人心的呼声。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她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微细的回音》一诗中写道：“在波涛汹涌的生命流中：燃两支爱真理爱自由的明灯——照着——前途的成功建设！”她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我想让马蹄踏遍了地球，燃起我光明的火把！”

石评梅还和黄庐隐、陆晶清等同学、好友在《世界日报》上创办了《蔷薇》周刊，用以登载文学作品，繁荣我国创始时期的文艺创作。她们还一起创办了《妇女周刊》，提倡妇女解放，促进妇女运动。石评梅从大学三年级起，到在北师大任教期间，一直苦心经营这两个周刊。她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常常彻夜不眠。《蔷薇》、《妇女》两个周刊连续办了好几年，它们犹如两颗小星，以自己淡淡的光晕，闪烁在旧中国那沉沉的暗夜里。

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石评梅的好友、北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四十六名爱国志士惨遭毒手。石评梅悲愤异常，翌日一早，就冒着漫天风雪和危险，奔往医院去慰问那些惨案中负伤的战友。不久，女师大全体学生和北京各界代表数千人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二位烈士。看着“杨德群和刘和珍陈列在大礼堂的尸体，枪弹洞穿的尸体和那安放在玻璃厨中的斑斑血衣”，石评梅悲痛难禁。

她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和珍！……你是在我们这些朋友中永远存在的灵魂，许多人都在仿效你生前的美德嘉行，用一种温柔坚韧耐劳吃苦的精神去做他们的事业去了。你应该欢喜吧！你的不灭的精神是存在一切人们的心上。”在另一篇文章

中，她对于那些“坐监狱”的仁人志士进行了高度赞扬：“历史上值得同情敬慕的几乎都是这类人，而他们的足迹是庸众们践踏不着的，这光荣是在血泊坟基上建筑着！”面对黑暗的社会，反动的势力，她愤怒地高呼：“愿燃我愤怒的心火，烧毁这黑暗丑恶的地狱之网！”

石评梅在用笔反抗强暴的斗争中，对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她在一九二八年初的日记中，毅然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有点作为，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社会革命家呢。”可惜的是没等她实现这一愿意，就因患脑病而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病故了。当时她年仅二十六岁。

石评梅逝世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日报》社、《无须》社、北京女子第一中学、春明女校、《绿波》社等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印刷了《石评梅纪念册》。根据她的遗嘱，人们将她的遗体，安葬于北京陶然亭湖畔高君宇墓旁，后人亲切地称之为“高石之墓”。

石评梅流传在世的著作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另有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写的，有文学价值的四册日记和散见于各报刊上的诗文若干篇，因未整理出版，终致散失。

管翼贤与《实报》

奚以锐

管翼贤湖北蕲水县人。青年时期，通过他的同乡北京神州通讯社社长陈定远（班侯）的关系担任该社外勤记者，负责采访有关政治新闻。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一些握有实权的军政人员，互相攘夺权力，此起彼伏，岁无宁日。管翼贤即以他自己的投机取巧的手法，相与周旋，从他们的辗转传述中，不断获得政府尚未公布的中央政潮起伏与地方重要人事更迭的实况，写成资料，由神州通讯社向京内外报馆供稿。当时各报馆都争相发表。由这时起，管翼贤在新闻界逐渐崭露头角。

在曹锟举行贿选和修改宪法的一段很长时间，国会每天都有公开的或秘密的集会，各派系议员各自代表着本派系的政见的和利益，时时展开激烈的争论。议员中焦易堂、谢持、邹鲁、徐清和等人曾参加过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国会，都坚持着中山先生提出的维护宪法的倡议，在发言中时时与议长吴景濂及其一派的议员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吴景濂于每次集会时都通知市警察厅派出员警到场，戒备森严，并封锁消息，禁止新闻记者到场采访新闻。

我当时在北京警察厅工作，国会每次集会都奉派前往会场，

与吴景濂的侍卫长汤步瀛共同担负警卫责任。管翼贤与汤有同乡的关系，和我也有些私交，就通过我们二人到会采访。因之神州通讯社向各报馆发出的稿件能够透露一些国会议事实况。各报馆都作头条新闻向社会发表。不久管翼贤便在北京筹设了一家报纸——《实报》。

管翼贤办《实报》的初期，无力筹集大量资金，报馆设备，极为简陋。报纸由一家铅印馆代为印刷，每天只出版一张四开纸的小型报纸。在创刊之初以王柱宇为主编，管自任采访。随着业务的发展，又以李诚毅为外勤记者，担任采访政治新闻。

当时，《实报》是委托一家由常振春主办的派报社代为推销的，这家派报社的前身是永兴寺京报房，由清末即担任承销清廷发布的《上谕》，有着丰富的销报经验。常振春与管翼贤私交很厚，常为《实报》大力扩展销路，因之《实报》的出报数量日益增加，设备也逐渐充实，该报社并从德国购到一台卷筒机器。到“七七”事变前夕的发行量达到六万份，超过北京其他各家报纸。管翼贤为了对常酬答，给他筹办了一家《时言报》，常获得巨额利润，逐渐走入上层人物的行列。

《实报》创刊初期，以登载社会新闻为主。同时大搞慈善事业，利用它具有的优越的宣传条件，向社会上广泛募集捐款，购置棉衣、棺材，向贫苦市民施送，博得社会上对他的好评。在喜峰口抗战期间，管翼贤购买了大批钢盔，赠给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战士。

《实报》主编王柱宇，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在基层社会中交际面极广，一些帮派分子、江湖术士大都与他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为了迎合这些人的阅读兴趣，不断以夸张的笔调，编

写桃色新闻，如当时发生的透明、滕爽因恋爱关系发生的凶杀案，燕子李三案，就不惜连篇累牍，尽情给予披露，顿使报纸销路激增。王柱宇还在实报第二版上端，辟出《谈话》专栏。内容主要写帮派活动和社会琐闻。不久王柱宇的名字就传遍九城。王柱宇接着又利用《实报》作为他个人的宣传工具，在家中开设了王柱宇广告社，并以他后妻下海票友福瞻云早年曾随她父亲学过中医的关系，在家开设了中医诊疗所，一时门庭若市，获得很大利益。

王柱宇把《实报》作为自己招摇撞骗的工具，引起管翼贤对他的疑忌，辞去了他的编辑职务。王柱宇遂在暗中鼓动在天桥一带吃江湖饭的帮派分子，拿着订阅《实报》的收据，到报馆退款。两天来退款人数，数不胜数。他们都说，看不到王发表的谈话，所以前来退报。管翼贤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给他恢复了职务。

管翼贤为了向上层人士中扩展销路，把第四版正版地位辟作《畅观》专栏，由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中照印出“畅欢”二字作为报头，刊出后予人以面目一新之感。聘请徐凌霄、宣永光、张醉丐和张铁笙等人按天供稿。

徐凌霄笔名凌霄汗阁主，每天用杂文形式，评论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刻画当时达官显贵的脸谱，借谈论历代掌故，揭露社会上黑暗面，寥寥数语，就能够收到借古喻今的效果。

宣永光笔名老宣，每天发表一篇《老宣疯话》，张醉丐每天发表一篇《打油诗》，抨击时弊。

张铁笙笔名某夫人，他在《畅观》版内辟出《某夫人信箱》专栏，每天解答读者来信，如关于社会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等等，受到读者欢迎。

过去各个机关团体，为了避免新闻记者对他们制造流言蜚语，往往给他们以谘议或职员名义，按月支给车马费若干元，据传说管翼贤在各机关团体的这类名义，不下二十余个。

日本侵入北京，管翼贤到济南继续经营他的报纸，济南沦陷前夕，他又把报社迁往汉口，这时他的外勤记者李诚毅因某种原因和他决裂，对他进行攻击，向各方散布管的不法行动，指责他是北京的报奸。管翼贤感到自己不能在国内立足，就偕同他的妻子管邵挹芬避居香港，生活一度很穷困。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叫黑田的日本人，由他通过日本驻北京的同盟通讯社记者佐佐木，征得日本军报导部和华北敌伪政权的同意，管翼贤由港返回北京。回到北京时，他的《实报》已被一个叫胡通海的占据。管在日本军报导部支持下，将全部资产追回，日本军报导部山义少佐还在物质上（如纸张、油墨等）给以支持，使之能继续出版。

一九四〇年管翼贤被伪政权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派原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职员（曾在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搜捕李大钊同志的凶手）吉世安和《实报》记者张铁笙为科长，并委任华北各省市道尹、局长为情报局参议，委任各县县长为情报局谘议。为日伪当局搜集大量情报，印行大量宣传品。这时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的具体活动，我知道的不够详尽。

《实报》于一九四四年六月随着日寇的即将崩溃而停刊。

日本投降后，管翼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河北省高等法院检查处侦查审理，以“通谋敌国，危害本国”的罪行，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通过审理，初拟判他死刑，后来又改判他无期徒刑。

全国解放后，人民法院对管翼贤的罪行，重新审理，判处他死刑，予以枪决。

早期的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王道元

清季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北京曾出现了大学堂。清政府以寿州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其学制科目不得而知，大约是以培养通译人才为要。至庚子拳变（一九〇〇年），这个大学随之夭折了。庚子第二年，光绪帝载湉，那拉太后由西安回京，为装饰门面起见，同年十二月，任命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筹备招生开学。当然，它与前一大学性质不同，与其说是旧大学的继续，毋宁视为创办。京师大学堂校舍，在景山迤东马神庙（旧称四公主府）。首先招考师范馆优级师范生。其学生来源，是由各行省选送和自愿投考的。资格是附生、廪生、荫生、监生、八旗官学学员，并无举人，更没有白丁，均不限年龄。入学考试题目，有中外史地、浅近理化、数学等。我是自愿投考第一次录取的。这次录取总共不到百人。第二年开学时，外省选送的学生陆续报到，已达一百三十余人了。对学生待遇、奖励、义务分述如下。

待 遇

满清政治，腐败已达极点，但对于初期的大学生，待遇却十

分优异。一概公费，供给宿舍，每个一间楼房，自修室每二人共一间。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如提调舍监、事务科长，诸高级职员和学生一道吃饭，需坐在主座。这颇合古语所说的国以“大烹养士”了。又如每月有月考，考列在前的若干名，给以数元或十数元的奖金。常用服装，基本自备。但每人冬夏二季，各有官发的一套操衣，随便穿着。

奖 励

在初入学堂时期，据传毕业后分别等级，给以进士和举人出身，并予以六、七品的官阶。在政府方面，自来以顽固派占优势，对学生毕业奖励规程大有争执。张百熙是爱护新进的，主张从优。但此项章程迟未公布。比及张之洞继任管学大臣，乃确定毕业生一律奖给举人，其考列最优等，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优等以降，不叙官阶，仍给以举人出身而已。但毕业各生必须在教育界服五年义务（当然受酬），方能回原衙门候缺。自宣布上项奖励规程后，谁都知道内阁是冷衙门，即使义务期满，回到原衙门（内阁），既无事可做，而补缺则更是俟河之清。由是大为失望。原规程一项规定：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而又有志深造的，可以选派分遣东西洋留学，自然是官费。那时在毕业前二年，部分同学要求提前施行的运动生效了。如俞同奎、华南圭、朱深、王桐龄、张耀曾就是第一次派遣的。在接近毕业时，有少数同学看穿了奖励是一场空幻，预谋出路，报捐主事。我原系癸卯末科中过举人的，遂签分到吏部，孙昌烜分入外交部，实际等于放弃了奖励。

义 务

按照学部定章，毕业生必须回本省或自择他省进行办学、教学、或到教育行政机关服务，期限五年，虽然酬以相当薪给，但不以俸论。优级师范第一期，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毕业生一百人。第二期，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毕业生二〇三人。第一期义务期满，应计至一九一二年终，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若第二期毕业的，需计至民国二年才义务期满。对那些什么奖励花样，尚复从何说起呢？总之是一场空幻而已。

关于当初行政上的负责人，及重要的教习和重要科目，分述如下：

张百熙（治秋），第一任管学大臣，后加荣庆为会办，其职责在总揽大纲。

张之洞（香涛），为管学大臣兼学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附简单的说明：张百熙后转为邮传部尚书，歿后谥文达。张之洞歿后谥文襄。前者思想新，极爱护学生，因而甚受学生爱戴。其会葬日有很多学生参加典礼。他们逝世皆在辛亥以前。在大学前期，屡次改制，事不终始，是常见的过程。继管学大臣之后，乃降级改为京师大学监督制了。

张亨嘉，为第一任监督。他在就职典礼时，命诸生各着官服，首向先师孔子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训话：“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就此完了。同学们在散归各斋后，引以为笑柄。有的说：“所演说，恐怕这是最简短的吧。”又有人用嘲讽的话加以解释：“孔门弟子，不是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的话题吗？张老夫子正是言短心长。我们诸生之流，正当书为座

右铭啊！”一场哄堂大笑。

吴汝纶（挚父），桐城派古文大师，经张治秋先生礼聘为大学总教习。吴先生拟先去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再就任，不幸的是，未及到任竟一病长逝了。继任总教习为张鹤龄。

张鹤龄（筱浦），阳湖派古文家，亦名士。对学生极和蔼恳挚。

此外如：于式枚（晦若）、李希圣（亦园）、屠寄（敬山，史地教员）、杨仁山（经学大义）、王舟瑶、饶樞龄（经学），林纾（文学）皆一时名彦。李家驹（柳溪）继张亨嘉之后任监督。蒋式惺（性甫）任教务提调。曾广钧（重伯）、袁励准（珏生）任斋务提调。三多（柳桥）、金梁（息侯）等职员中低级不关重要的尚多，不及备载。

班 级

我是第一期学生，肄业共五年。第一年，学普通课，第二年即分科别为四类。那时风气锢蔽，科举还未废止。壬寅、癸卯两试秋闱，甲辰一试春闱，然后停止。我们入大学后，外间蜚语，还认为不过是读经书，作策论，学学算术而已。其实大不然。在第一年已分习英、德、法、俄、日等文及普通科学了。

第一类，文学、中文、外文；

第二类，中外历史、地理；

第三类，物理、化学、数学；

第四类，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园艺，总名为博物科。

以上除分类肄习外，通习科目则有教育学、心理学、辩学、

哲学大纲。

教 员

日籍教员：服部宇知教心理学、辩学、伦理学，法贵教教育学，太田达人教化学，释加教物理学、数学、代数、几何。铃木教日语，高桥教图画，矢部教植物学、解剖学、矿物学。桑野教动物学、生理卫生。

翻译助教（中国人）：范源廉（静生）、吕慎哉、胡宗瀛（字宣，兼农学）、程家桎（兼肥料学）、江康虎、吴荣邕、刘翼周。

学生政治思想在政府方面如何控制？

清季戊戌政变、庚子拳变，虽皆以失败而告终。然在青壮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则自由、民主、革命及向往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萌发。只要是属于进步的，那怕是一个幼芽，它总是从曲折患难过程中，不断成长发展和向前迈进的，不是任何外界压力所能控制或消灭得掉的，这就是真理。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生也不例外。无庸讳言，学生都是从各处来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都已崭然露了头角的，考入大学，是新人新事，但是入学第二年即癸卯，因暑假之暇，有不少人又参加了乡试，结果有十余人中式举人，我亦是其中之一。转年甲辰，有杨景乔一人中了进士，把他分入进士馆了。可见科举思想尚未忘怀，这就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具有摇摆不定的两面性了。但学校当局亦未加以干涉，且有对得中试的学生说一声恭喜的呢。政治思想的转变都是因外界条件刺激引起。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及《新民丛报》，几乎人手一篇，成为普遍的读物。清廷为要

粉饰立宪，设立资政院，钦派议员占多数，又有由各省谘议局选派的议员占少数，而谘议局亦不尽由民选，参以府厅州县的官僚。对于本省谘议局，同学们亦常常向他们建议，促使他们向官僚政治作斗争。有一次，直隶省同学们还公推我去天津谘议局开会，我做了五天的观察，议长是阎凤阁老进士，受到恳切接待。当日俄战役前夕，日本自甲午战胜了俄国，近又面对着帝俄占据广大土地，乃至全部铁路，久已处心积虑夺取这个权力，终将爆发争夺战。彼时清廷外交，反而宣布对此表示中立。在学生们心目中，清廷真是懦弱已极，遂激起了极大的愤怒，要对清廷发表抗议宣言，先推定数人起草。宣言大意，我记得有一段是：例如我们的家园，被一方强盗所窃据，久已失去了主权，另一方强盗又要争夺这个产业，并不为原业主打抱不平，而是攫为己有，而作为主人翁的当事者，漠然无动于衷，公然坐在高山看虎斗，并宣示中外严守中立，任他们为所欲为，这还象一个主权国吗？草案文字，经同学们一致同意，就预备仿行古来太学学生伏阙上书的故事。而这个消息，已被内廷那拉太后知道了，传语张百熙管学大臣。据说，太后赫然大怒，斥责说，你们的学生要造反，不加管束是不行的。要他负起这个责任。犹忆当时管学大臣亲临大学，并没有召集全体学生公开训话，仅各班长到监督室汇集，讲话大意是：“诸君发于爱国热忱，形诸呼吁，对外交有所献替，本不为过。但不要因一朝之愤，使这个缔造艰难的大学根本动摇，切不要发表宣言为是。”同学们对他老先生素来崇敬，经这次剴切说明利害，闻之无不感泣，使这一运动无形消散了。结果加派了荣庆为管学大臣会办，这就是为控制学生思想而设的。不久，张百熙先生调任邮传部尚书，张之洞由湖广总督入为军机大臣，并接

任管学大臣，时常到大学来训话，大致仍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作为教育方针，教学生只应埋头读书，不得干预外事，以束身自爱为本等等。对毕业奖励等规章多所制订，总之不过降低而已。时势推移，头班学生迫近毕业，孙中山先生革命影响，几乎普及全国，尤其是学生对清室已不复存幻想，倾向革命的思潮油然而生。头班学生中属于第二类的丁作霖，丰润县人，亲同盟会分子，他在毕业后即实际奔走革命，组织了铁血团，其规模颇大。迨武昌起义时，黎元洪曾派专使来北方和他密切联系，但共和宣布后，他遂认为达到目的，竟把铁血团的庞大组织自动解散了，其功成不居盖如此。师范馆前后有两期毕业生，在清季与民初，有不少风云人物，自然功过亦不相掩。其余作终身教育职务的，亦所在多有。不及备载其详，即止于此。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上）

清华大学校史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大举侵略，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清华的历史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它简要地勾画出当时联大师生在抗战期间的行止、经历、志趣和情怀。

芦沟烽火 湘赣暂驻

“七七”事变时，正值暑假。当时清华大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在西苑兵营集中受军事训练，毕业生因事留校者约二百余人，土木系大部分学生正在山东实习，教职员除少数随校长梅贻琦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或作短期旅行者外，大部仍留校内。二十八日，北平陷落，学校师生纷纷向城内迁移。校长梅贻琦由庐山抵南京，但因交通中断不能北上。二十九日起，敌军即开始

侵扰校园，至八月中，敌军驻校达三千人，清华园完全沦入敌手。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清华校长梅贻琦受命于八月底由南京抵长沙负责筹备。根据教育部制订的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规程，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中，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负责校址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招聘师资、收受学生、及建筑设备等事宜。

临大的法、理、工学院设于长沙湘江之畔，租借圣经学校校舍（地处韭菜园）作教室和办公楼。这是一座湖南最讲究的建筑。当时三校同学赶来长沙上课的不过数百人（不包括文学院），教室足敷应用，又经湖南省政府拨给一座营房（四十九标）并租借了涵德女校分别作男女生宿舍。文学院设于南岳衡山之麓（亦属圣经学校校舍）。

临大于十月二十五日开学，十一月一日上课。全校共有学生一千四百五十二人，其中清华学生六百三十一人，北大三百四十二人，南开一百四十七人，加上北大、清华联合在武昌招收的新生及南开附中升班新生一百一十四人，借读生二百一十八人。三校教师共有一百四十八人，其中清华七十三人，北大五十五人，南开二十人。^①（清华航空组学生十一人，在南昌清华航空研究

^① 此为截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数字，见《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工作报告》。

所开班上课。南京失陷后，奉命迁往成都。)

长沙临大共设文、理、工、法商四个院十七个系，略如下表：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设置 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社会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设置 物理学系、化学系、算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工学院：院长顾毓琇，设置 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设置 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

长沙临时大学的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不同于战前的清华大学。它是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校务，下设秘书、总务、教务和建筑设备四部，每部分若干组，处理日常工作。此外还有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等专门组织。各系设有教授会议，由常委会在各系教授中指定一人为教授会议主席。

临大的教务长是樊际昌，训导长为潘光旦。

长沙临大落脚未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战火逼近，临大师生再次被迫转移。

南京失陷后，同学们都认为书不能读了，必须直接参加抗战，大家都要去从军，马约翰教授在一次“誓师会”上也一直喊着“清华精神，清华 Spirit，”鼓励同学去从军。这期间，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应邀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和八路军抗日的情况，给同学以很大鼓舞。于是，有很大一批同学投笔从

军奔赴前线，有一些同学去延安抗大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丁玲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奔赴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余下的学生近一千人，由学校请准教育部决定迁往昆明。此事一月底决定，随着便有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同学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生，体格不好的和不愿步行的，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二百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分二个大队，三个中队，学校方面派黄子坚为总负责人，并由全体随行教师闻一多、李继侗、曾昭伦、吴徵镒、许骏齐、李嘉言、袁希渊、王仲山、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等十一人组成辅导团。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嶽中将担任旅行团团团长，毛鸿等三名军事教官分别担任三个中队的队长，小队长概由同学担任。这次旅行时经六十八天，行程约三千五百华里，（除乘车船外，实际步行约二千六百华里。）沿途饱览祖国风光，体察民间疾苦和风土人情，对师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绝徼移栽 楨干爰济

“旅行团”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汇合，奉命改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这时联大学生共九百九十三人，其中清华四百八十一人^①，清华教师职员除由湘来昆者外，尚有由平直接南来的，共达二百人以上^②。

① 见《联大档案·教职工学生人数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文合字296号。

② 见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原载《清华校友通讯》五卷三期，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至昆明，租借昆华工业学校为校舍。一九三九年春，新校舍落成，总办公室及文、理、法商学院均集中于新校舍。昆明本属大后方，但自日寇侵占越南、缅甸后，便成为接近前线的重镇，而西南联大一直支撑其间，“绝徼移栽，弦歌不辍”，前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西南联大的院系，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设置的。一九三八年秋，师范学院（及师范专修科）设立后，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系，同时，工学院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一九三九年度起又设立了先修班，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划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系。次年度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至此，联大发展为拥有文、理、法商、工和师范五个学院，包括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的规模。全校学生约三千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

联大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是沿袭长沙临时大学原有体系，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处处长及各学院院长列席。三校校长中，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①，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实际掌管校务。加之清华的人力、物力在联大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在经费方面，清华因有庚款，除了应负担的一部分外，往往还额外给联大一些补助。再如在师资方面，联大工学院实际上就是清华工学院的继续。（北大原来没有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工系加

^① 张伯苓曾任国民党参政会副议长，后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蒋梦麟曾任行政院秘书长。

入)理学院百余教师中,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因此,联大的一些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如联大的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基本上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

联大常委会下设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先后担任这三处处长的列表如下:

	处长	担任时间	备注
教务处	潘光旦	一九三八年一至十月	由杨石先代理
	樊际昌	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周炳琳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杨石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八月	
总务处	周炳琳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六月	
	沈履	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四〇年八月	
	郑天挺	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八月	
训导处	查良钊		训导处于一九三九年初设立

此外,设叙永分校和先修班时,分别设主任主持。叙永分校主任为杨振声,先修班主任为李继侗。又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月间,曾设有建设处,由黄子坚任建设处长。

联大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自己原有一套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

这一时期,教师的聘任,仍分别由三校各自办理,各校教师除接受本校的聘书外,同时还接受一份联大的聘书,等于有双重校籍,他们享受各所属校的某些特殊福利。也有少数教师专由联大聘请而无“双重校籍”,这部分教师(多属师范学院)在工作、生活上比较没有保障(联大结束时,除师院教师并入云南师院外,其他不属三校的联大教师工作即无着落)。但他们升级不

如三校严格，讲师在各校不能升为教授的，来联大一般都可升为教授。联大教师数目，一般在三百五六十人左右，其中清华教师约二百人。联大组成后，三校合并，教授的数量激增，一九三九年度全校教授、副教授即达一百七十七人，到一九四四年增至一百六十二人。

一九四一年，教育部又实行所谓“部聘教授”制度，挑选一些资望较高、任教十年以上的教授改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每一学科设一人为部聘教授，月薪六百元，另加发研究补助费四百元。第一批部聘教授为三十人，其中包括清华的吴宓、吴有训、庄前鼎、陈寅恪；北大的汤用彤、饶毓泰、曾昭伦、张景铨等。

这一时期，原清华职员随校南迁者有四十余人，后相继离校，留校工作者只有十余人。联大职工大多数是新招的本地人员。职员最高年份（一九四三年）有二百一十二人（包括校医、理、工各系技术员等），工警有二百七十四人，职工共四百八十六人，该年度学生有二千八百三十六人，与职工的比例约为5.7:1。

学生人数，由于免试招收了大批新生，加上由临大迁来的九百九十三人，一九三八年度骤增至一千九百五十人^① 一九三九年度学生人数已超过三千人^②。

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八年中，联大毕业生共有二千五百二十二，清华学籍毕业生有七百二十三人，其中工学院毕业生二百八十人。

① 包括本科生、先修班生、试读生、旁听生、特别生。但研究生因分别属于三校，故不计在内。下同。

② 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即一九三九年度下学期），联大学生有三千零十九人。见联大档案《学生人数卷》发文合字二一四四号。

筚路蓝缕 “弦歌”不辍

西南联大地处边远，创业维艰，在战火硝烟里历经八年，创造出“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

长沙临大和昆明联大的经费，出自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清华的经费仍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照例按月拨给。一九三七年九月起，政府因抗战缩减文教经费开支，把已经核定的全国各国立院校的经费都改按七成发给。当时三校各以所领经费的半数拨给临大，此半数经费尚须由三校各自扣除参加临大教工的工薪。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起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止，三校拨发经费额清华计为十八万九千余元，北大计为一万六千四百余元，南开计为四千九百余元。平均每月只有三万余元，勉强维持学校。三校所剩余的一半经费各自保留作为校产保管和员生救济之用^①。

一九三八年四月以后，在按七成拨给西南联大的经费中，教育部还要扣去三成，做为“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三校各自设置的昆明办事处的开支，则由教育部在所扣的三成经费内酌量发给。不久，庚款再次停付，清华经费的来源也告中断。西南联大经费与临时费完全改由国库负担，并且按照核定的预算全部发给。至此，结束了由三校分摊联大经费的现象。但在物价高涨、法币不断贬值、师生职工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常入不敷出，只好靠贷借支撑。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联大借款的本息，累计共达法币

^① 见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经费决算档案。

一千四百余万元。

西南联大的校舍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要的临时费，政府则不予解决，由于教授与学校当局的奔走，才于一九三八年先后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法币二十五万元，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曾先后补助法币十五万元，直至一九四一年，教育部才拨给设备费三万八千美元，



西南联大图书馆外景

规定其中百分之十五用作装运保险等费，以百分之五用作购置行政设备费。其余三万零四百美元中，以一万五千四百美元用作图书购置费。此外，联大有少数系如社会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等，曾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补助。

抗战期间，教师的生活待遇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一九三七年九月份起，教师薪资以五十元为基数，其余按七折发给，还要负担一些捐税，实领不过五成左右。一九四〇年一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给，但就从这一年的上半年起，物价暴涨，战前每月实支三百五十元的教授，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实值仅十三元六角。这一年十一月间，联大五十四位教授曾经签名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中有云：“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

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联大教授薪资如以战前月薪三百元计，则只合战前八元三角了。（参见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载《观察》一卷三期第七页。）一月薪资只够半月左右的开支，教师吃不饱饭，有的甚至每天只能吃一千二稀，多数人不得不兼职谋生。政府虽也发给一点生活补助费，如“平价米贷金”、学术研究补助费、久任教员奖金、教员讲助金等等，但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一年，教育部规定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各发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不愿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曾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犹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满而滋怨”。（见《联大档案》）结果只有三个常委仍每人月领一千二百元。教师们生活一般都比较清苦，梅贻琦原有一部汽车，后来不得不改乘人力车，还常常步行一二十里路；马约翰家里常常没菜而吃白饭，汤用彤一九四二年卖掉了皮髦，家里常吃稀饭过活；冯友兰常常带着菜篮上课，准备下课后自己到市场上去买菜。但在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下，多数教师努力克服困难，坚持了严格认真的传统。例如，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下工作至深夜，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他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讲《中国文学史》时，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有的学生一年中就写了十几个报告，有的报告长达一百页左右。他不同意那种只顾教师个人学术研究，不肯为学生花工夫改作业的态度，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如果都不肯替青年人服务，下一代怎么

办？”^①他仔细地为学生改笔记，他所开的新课《文辞研究》虽只一人选课，仍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②理学院的一些教师，也克服教学设备上的种种困难，设法维持教学。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因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试验，他们便就地取材，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蝾螈呼吸实验。地质地理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作气象台。工学院各系教师在基础课方面对学生保持了严格的要求。战前清华的严格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继续进行。

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更为艰苦。工学院学生住的是草顶泥墙的宿舍，也住过“暗无天日”的盐行仓库，在不避风雨的草房里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讲^③。统舱式的寝室，每间挤四十多人，很多学生在走廊里画图，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当时昆明市的一些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的自修室。

一九四一年前后，昆明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学校上课时间，不得不改为上午七时到十时，下午三时到六时，还经常因空袭警报响而中断上课，有时甚至使实验半途而废。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联大遭大轰炸，校舍损坏，天雨无处不漏，学生在图书馆看书也要打伞。

在这种条件下，联大师生大都能发扬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精神，坚信抗战必胜。校长梅贻琦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象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① 见《橄榄式的人——朱自清》载《人物杂志》第一卷。

② 见季镇淮，《朱自清年谱》载《朱自清文集》第一卷第六十六页。

③ 见《桥会小史》载《土木工程学会会刊》第六期第七十五页。

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①。在教师方面：“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之谔谔……^②特别是在学生方面，建校伊始，学习与生活“是热烈、痛快而鲜明的。正课之余，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咏、壁报、集体旅行、集体学习都蓬勃一时。”^③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这种局面曾一度受白色恐怖的影响而低落下去，但同时孕育着新的民主运动高潮。一九四四年起，民主运动发展起来，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以后，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

院系春秋 教研成果

联大院系设置总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历史学系。

理学院：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

法商学院：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社会学系。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

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学系、算学系、史地学系、教育学系。

① 见《梅校长答辞》。载《清华校友通讯》一九四〇年9月。

② 见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

③ 见《联大八年序》。

公民训练系、理化系、师范专修科。

其他：大学先修班、进修班、西洋哲学编辑委员会。

各院系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文 学 院

文学院各系基本上是由三校原有各系联合组成。哲学心理学系的设立，是鉴于只有清华一校有心理系，且规模较小，故将它合并于哲学系。系内仍分哲学与心理学两组，实际上两组在教学与人事等问题上仍各行其是。心理组还兼受清华理学院领导。

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各系情况如下：

中文系：

中文系通常有教授十五六人，其中清华教授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王力、刘文典、浦江清、许维遹、陈梦家等。北大教授有罗常培、罗庸、杨振声、魏建功、唐兰等人；南开教授有张清常、李广田等；属师范学院的教授有沈从文、余冠英等。又，杨树达于临大时期在校，迁校后离校，刘文典一九四三年离校。联大中文系主任先为朱自清，一九三九年秋后为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一九四〇年秋后为闻一多。

联大中文系的课程仍分为文学和语言文字学两组。清华教师除王力、陈梦家外，多偏重于文学，北大除杨振声外，多偏重于语言文字学。课程编制上与战前清华的不同点是“古气”更重些，对古典文学与古文字学的课程有所加强。新文学方面的课程仅有杨振声和沈从文先后开出的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附习作）及李广田的《文学概论》。古典文学方面，较注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除《中国文学史》必修课外，还有《中国文学史分期

研究》的选修课，分四段，作为四门课讲授。闻一多讲第一段上古文学，对古代神话歌舞的起源与发展，有独到的研究，水平较高。另外，部订必修课程《历史文选》、《历代诗选》，在中文系也都各分为三门课分期讲授。战前清华中文系的《国学要籍》一类课程，这时期改名为《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与《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选读》，分别作为文学组与语言文字组的必修课。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课程亦较战前清华为充实齐全，其中，王力开的《语言学概要》，在当时为国内第一次开出的新课，选修课《汉越语研究》（王力）、《汉藏语言调查》（罗常培等）是利用了昆明接近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利条件而开创的新的研究领域，对培养一些从事实际调查的语言学人才有一定作用。

这一时期，中文系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多。闻一多这一时期完成的学术著作，在数量上胜过战前，他先后完成的著作有《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及一些诗文评论，杂文与演讲，并写了《中国文学史稿》（一九四四年在昆明中法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的大纲）以及关于上古文学史的一些片断论文。他还对《诗经》、《周易》、《庄子》、《楚辞》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工夫。

朱自清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文学批评和普及、提高国文教学的活动。他完成了《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经典常谈》、《语文零拾》和《伦敦杂记》等书稿，并有《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汉藻’说》、《古诗十九首释》等论文，及《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稿。此外，他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又陆续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精神指导举隅》（一九四二年出版）、《略谈指导

举隅》（1943年出版）及《国文教学》（一九四五年出版）等书，并于一九四一年与浦江清等创办《国文月刊》。这些学术活动，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对指导青年读书、提高国文教学的重视。如他所说，他要求自己在“经典通俗化”上尽他“作尖兵的一份儿”。

这一时期王力先后出版了“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语法摘要》。王力的语法著作开始注意到汉语特点，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语法的规律，这在当时语言学界尚属创始。

这一时期其他清华教师完成的著作，还有许维遹的《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诂》、《尚书义征》；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等论文。此外，余冠英在乐府诗集方面，李嘉言在唐诗方面作了一些研究。联大学生刘兆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也编印了他在长沙临大迁昆步行团中沿途收集的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有的教师为研究“三礼”，也对西南少数民族风俗礼仪作过一点调查。

外文系：

联大外文系教授最多时达二十人左右，其中属于清华籍的吴宓、吴达元、杨业治、温德、赵诒熊、陈福田、陈定民、陈铨（一九四一年离校），专任讲师雷夏、李赋宁以及教员王佐良等。北大教授有叶公超、莫泮芹、冯承植、闻家骢、林文静等人；南开有卞之琳（副教授）、傅恩龄、柳无忌等。短期在联大任职的清华教授还有钱钟书、陈嘉、吴可读、李金堂、胡毅等，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四年末）、陈福田（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由莫泮芹代理。

外文系的课程编制，与战前清华外文系有较大的不同。

第一 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增多。由于外文系教授多，各展所长开课，名目繁多，学生有较多选择余地，但亦流于杂乱。

第二 文学史的课程大为减少，自一九三九年起，已基本上不按战前清华分期讲授断代文学史，而只有吴宓开的《欧洲文学史》一门必修课。

第三 文学家课程则大为加强，有《欧洲名著选读》，两年必修四个作家的著作。就各教授的专长与兴趣，除开出《莎士比亚》外，还有关于拉辛、莫里哀、乔叟、纪德、亨利、詹姆士、雨果、弥尔顿、尼采等等，称得上是“纷然杂陈”。

在学术研究方面，清华教师主要在编写文学史和翻译上做了一些工作，著述较少，吴达元编著和出版了《法国文学史》（一九四六年出版），这是解放前较详尽的一本国别文学史，他还翻译出版了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载《文史杂志》）。陈铨在联大时写了《野玫瑰》，曾风靡一时，并受到当时教育部嘉奖。但接着又受到重庆戏剧界二百余人联名抗议，说它是“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要求教育部撤销嘉奖。

历史系：

历史系有教授十余人。其中清华教授有雷海宗、刘崇鋳、吴晗、邵循正、噶邦福、王信忠、朱庆永、陈寅恪（与中文系合聘）等人。北大教授有毛准、钱穆、傅斯年、郑天挺等；南开有蔡维藩、皮名举等。姚从吾为师院教授。联大与清华历史系的主任都由雷海宗担任。

历史系课程编制与战前清华比较，变化不大。由于三校教师各有所专，荟集后开出的断代史、国别史课程较战前任何一校为

齐全。

因受图书资料限制和其他原因，历史系教师的学术工作普遍作得较少，清华教师中吴晗较有成绩，他发表了《灯下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记明实录》（一九四〇年九月）、《大明帝国与明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元史食货志钞法补》、《记大明通行宝钞》等论文和《明太祖》一书（该书在复员后经过重写，增加了大量材料，改名《朱元璋传》）。这些著作都是一九四三年以前写的，较有学术价值。此外，陈寅恪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九四四年重庆版）一书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稿本。邵循正对蒙古史作了一些研究。

哲学心理学系：

该系系主任是汤用彤。哲学组教授有八、九人左右，其中清华有金岳霖（兼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四人。北大教授有汤用彤、贺麟、郑昕等；南开有冯文潜、王维诚等。除冯友兰外，清华教师都是担任逻辑方面的课程，内容偏重逻辑技术方面。冯友兰除讲授中国哲学史外，主要是讲全校共同必修的部订课程——《伦理学》，他还开过《人生哲学》等选修课。

心理组都是原清华教师，其中孙国华只断续在联大任教一年。组内又有教授周先庚、敦福堂，后增聘教员曹日昌等。课程与战前差不多，只增开了几门教育心理方面的课程，由师院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樊际昌兼课。

哲学组清华教授的学术研究有：金岳霖出版了《论道》（一九三九年）一书，并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知识论》（稿本），这

两本书与他在战前所著《逻辑》一书，构成他的认识论与思想方法的体系而交互推演。

冯友兰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新理学》（一九三九年）、《新事论》（一九四〇年）、《新世训》（一九四〇年）、《新原人》（一九四三年）、《新原道》（一九四四年）及《新知言》等一整套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经济史观、处世哲学等内容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命为建立了一个继承封建社会的道统的新统”。（见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

此外，王宪钧写了《论蕴涵》、《语文的必然》，沈有鼎写了《真理的分野》、《意义的分类》等几篇逻辑方面的论文。

心理组这期间只作了一些为军队服务性的工作。

我所知道的京剧富连成科班

万子和

京剧富连成科班在其四十年历史进程中，造就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班人才。我过去服务于梨园行多年，又与富连成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我把有关它的史料提纲挈领地写在下面，供大家研究。

富连成创办人叶春善

叶春善字鉴贞，北京人，已故。他是叶龙章、叶荫章、叶盛章、叶盛兰、叶世长（后改盛长）的生父，是已故武生泰斗杨小楼先生同社坐科的师兄弟，又是肖长华先生的平生好友、儿女亲家（叶第四女儿嫁给肖盛萱）。

在前清末季北京有个小科班叫荣春班，当时都呼之为小荣春。如叶春善、程继先、郭际云（水仙花）、郭春山、蔡荣贵、王荣山、杨小楼等都是八年坐科毕业于这个小科班的人。

那时北京的戏班最有权威的就是同春班（后改同庆班），因为挑班挂头牌的就是京剧泰斗谭鑫培先生。谭先生与当时第一武生杨月楼老先生是好友，杨小楼就是杨月楼之子，通过世交关系被谭先生拉入同春班。叶春善因与杨小楼是师兄弟就同被拉入，但为期不久叶春善不太得意，就退出了同春班。

此时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个吉林戏班的主人来京约角，以充实他的戏院。此人名叫牛子厚，是吉林的一个资本家，在当地开设一个保升堂药铺，另外还有一个戏院和一个戏班子。在北京打磨厂设有一个源升庆汇票庄。为了和当地的戏班子、戏院争雄，来北京后他通过一个给戏班做盔头的姓周的（都称之盔头周）约好梆子班的崔灵芝、十八红，二簧班马德成（武生，以后在东北很红）、蔡荣贵、刘春喜、姚增禄、范福泰，还有叶春善等人组成班子。这些人到了吉林，由于牛子厚事先作了宣传，一经演出个个叫响。

这叶春善是个八年坐科出身，虽然学的老生，但是生、旦、净、末、丑一概不挡。可是他到了吉林并未登台，原因是他在出关途中，由于素性屈己从人，一路上照顾同行的伙伴。大家都有了坐位，他却在一节铁闷子货车上凑合一遭，几昼夜间饱受风寒，到了吉林，就患了重感冒，以致声哑至于失音，不能登台演出。他觉得自己与班主牛子厚素不相识，无感情可言，长此负人，心实不安。于是他从同来的人中借了些钱，凑上了留京的包银，找牛子厚表示愿意退还包银，回京养病。牛氏是个跑码头的，最讲面子，一见到叶的表示，十分重看，他早知道叶是为了照顾别人致患感冒的，当即表示慰留。正好因新从北京约来的各角与后台原有的管事人员新旧相处习尚不同，牛恐怕日久生出隔膜，于是就请叶在后台帮助管事。

叶春善热心能干，吉林当地年轻演员技艺比较生疏，有时向叶请教，叶耐心相告，绝不保守。就是他在日常工作当中，也颇著成绩。一则由于北京戏班原来就优于关外，二则由于叶的才长心细，能针对当时环境制订一些无损于人而有益于事的规章制

度，工作井然有序，关里、关外人对他都有好感。牛氏查知此类情况，对叶更加器重，优礼相加，彼此相处甚得。

牛子厚筹设科班

牛子厚很早就想在吉林成立一个小科班，培养一些人材为他的戏班打下基础，以使他的戏班更加巩固地发展。牛当时认为叶春善人格、能力足当此任。他虽早有此意但无着手决心。至光绪二十九年，日俄战争爆发，吉林邻近战场，娱乐场所纷纷停业。牛氏一方面准备资遣北京约来各角，期以后会；一方面即与叶商量拟趁此留叶在吉林筹设科班，培植人才。叶春善说办一个小科班不是难事，但是在吉林就地办不成，因为京剧首重口白，吉林小孩既是东北口音，究竟不太相宜，要办就在北京办比较合适。牛子厚认为言之成理，就同意了叶春善的说法来北京筹办。二人意见一致，逐日筹商。

牛子厚起初认为用钱很多，叶春善草草计划了一下，说只要几百两银子就够开办的啦，并说开办的第一年是个纯消耗时期，一年以后一部分学生可以演出，暂时孩子们身量都小也不能多置行头，能陆续演出就多少有收入可以找补开支。二人商量就绪，就由叶春善回北京着手筹备，当时开了一张二百八十八两银子的汇票（当时每一元按七钱二折合，共四百元）。牛子厚说写信通知北京源升庆汇票庄（牛的买卖），再用多少钱都由他们那里拨兑。

叶到北京就先请他的好友肖长华协助，肖的戏剧造诣很深，生、旦、净、末、丑，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和叶既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经过晤谈，慨然应允。二人首先共同物色教习（教员）人才，后来又在琉璃厂西南园租了一所三合房。

先后请到的几位教习有唐宗成（负责场面，是叶的换谱弟兄）、叶福海（叶的族弟专教净行）、徐天元（教武旦）、李风云（教梆子）、曹心泉（教昆曲老生）、王月芳（谭鑫培弟子，先教老生，后来改唱青衣）、茹莱卿（教武生）、苏雨卿（教青衣、花旦）、丁俊（教小生）、叶春善（主要教老生）、肖长华（生、旦、净、末、丑都教）。肖长华并表示在学生未登台以前是义务职，先不支薪。叶春善得到肖长华这个好帮手才敢大胆作下去。

按当时的组织，叶春善相当于校长，肖长华相当于教务长，那些教习就是教员。科班最初定名“喜连升”，因牛股东的买卖全带“升”字，到入了广和楼演唱时才改“喜连成”，后来牛股东让给沈股东时，又改“富连成”。

筹备就绪开始招生

光绪二十九年开始招生，这头一班学生招进后年龄不一，有大几岁的，有小几岁的，于是大的排“喜”字、小的排“连”字，分排两字其实一班。

首先招入的有六人：赵喜贞（艺名云中凤）学武旦、小生，赵喜奎学花脸，陆喜才学武丑，陆喜明学武生，雷喜福学老生，武喜永学梆子老生。因为这六个人是首先招入的，后来称这六个人为“六大弟子”。

以后陆续招收的高喜玉（艺名元元旦）学武旦、花旦。侯喜瑞先学梆子老生，后改唱京剧文武花脸，是个能翻能打的武花脸，文的唱、作也好。康喜寿学武生，长靠、短打都演。吴喜年学武生，阎喜林学梆子老生，李喜龙学武老生，王喜瑞学花脸，

陈喜光学文老生。

说到陈喜光要插一段闲话，那就是陈喜光是现在京剧院剧团青衣花旦杜近芳的生父。陈喜光因为家境不好，不得已把亲生的女儿写给杜菊初名下，更名杜近芳。这杜菊初是戏班中的剥削者，他把杜近芳培养起来之后，就带到上海、汉口以及江南各地演戏，大生其财。北京解放后近芳从汉口拿着梅兰芳的信来北京，找到王瑶卿，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剧团。如若不是解放，前途不堪设想。

梁喜芳学武生，何喜春学青衣花旦，迟喜珠学老旦（外号小龚云甫），王喜秀（艺名金丝红）学文武老生，郝喜伦学武花脸，王喜沅学老生，田喜丰学武生，应喜芝学武生，李喜安学老旦，陈喜星学老生，钟喜久学武花脸。

科班开办之始，梆子、京剧并重，后来一时风气，梆子不受欢迎，就渐渐地都改成京剧。

学生进步“连”字班继起

科班逐日发展，连字班学生继起，其成就最大的当属马连良。他唱、作、念、打都不泥守旧法，能推陈出新，尤以念、作受到好评。他长于衰派老生，如《三娘教子》之薛保，《打严嵩》之邹应龙，《四进士》之宋士杰，《审头刺汤》之陆炳，《打渔杀家》之肖恩等，他身段潇洒自如，表演唯妙唯肖。他如孔明戏之《群英会》、《借东风》、《失街亭》、《斩马谲》等，均以扮像雍容儒雅称合身分而有“活孔明”之称。再如重头戏《定军山》、《珠帘寨》等也均能唱。他行腔圆润耐听，使人神往，惟咬字方面讲究不够，所以观众有“字正的言菊朋、腔圆的马连良、字正

腔圆的余叔岩”，说明言、马还都逊余一筹。

其次于连泉（艺名小翠花）也曾学过梆子，后来改学青衣花旦，造诣很深，常演《四郎探母》、《玉堂春》等，颇有号召力。后因嗓子起了变化，就专工花旦，和马连良演《游龙戏凤》、《坐楼杀惜》一类的戏，一时称绝，并且晓工第一。现在年岁已大，偏重于教戏方面。他曾加入过鸣盛和。

骆连翔、何连涛、王连平、高连甲都是学武生的，金连寿武生能演重头戏。钟连鸣、王连浦学花脸（二人均受到观众称赞）。李连贞学青衣花旦，方连元学武旦，肖连芳、程连喜都是学文武小生的。刘连荣一入科还学梆子花旦，晓工甚好，后改京剧架子花脸（有一个时期曾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姜连彩学武旦、小生，曹连孝学文老生，王连魁学花脸，赵连升学短打武生（出科后曾搭俞振庭班），高连峰学文丑，苏连汉学文武花脸，马连昆学文武花脸（武戏也能演），殷连瑞学武生，金连涛学武旦，张连保学武丑（后为本社教师），常连安学小丑（他是天津兄弟杂剧团小蘑菇的父亲，小蘑菇抗美援朝时曾参加赴朝慰问团演出，因美帝飞机轰炸，牺牲了，以后剧团就由连安主持）。以上都是喜字、连字两班优秀学生，其余上下手、龙套、武行、旗、锣、伞、报等，就不一一详列姓名了。

学生猛进举行试演

喜字班学生如康喜寿、侯喜瑞、高喜玉（元元旦）、王喜秀（金丝红）、赵喜贞（云中凤）、迟喜珠（小龚云甫）等优秀学生，以及不少二路角，能戏不少，唱的也不错，都够登台演出资格。肖长华、叶春善二人商量，决定对外彩排一次。一是为了教

学生历练历练舞台火候，二是为了对外作个介绍，也就是做个宣传。二人商议好了即向宣外大街江西会馆借台演出。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同时有很多在家里从师学艺的青年都想参加同台演出，藉以历练舞台经验。如梅兰芳（他是梨园耆宿梅雨田老先生的侄儿，是个梨园世家子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以及后来在上海很出名的林树森（当时艺名小益芳）、姚佩兰、葫芦红（梆子老生），还有贯大元（武老生）、刘荣升（老生）、水上漂（梆子旦角）、董岐山（艺名小穆子，铜锤花脸）、小菊花等十个人，都是科外参加的。

在演出的这一天，观众已经不少，科里科外的学生家长也都来参加。试演圆满结束，博得社会好评，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街谈巷议，一时轰动了北京城。以后又不断的演出，应大小堂会，还到保定等外埠露演过，观众评论也都很好。

物色馆址长期演出

试演、堂会以及到外埠演出，均得到好评，大家喜出望外。为了学生的科外历练和增加收入，找补开支，计划找个馆子长期演出，即由叶春善先找到大栅栏广德楼唱一个时期，又想到肉市广和楼。前门外地处冲要，馆子很密，开支不大，可以维持长久，就与广和楼主人王善堂进行接洽。王善堂也认为科班很有发展前途，可以长期合作，免得馆子忙三天空两天，同时叶春善、肖长华二人也好共事，三言两语就说定了。订立了合同，长期开演，从此改喜连升为喜连成。时值光绪三十三年。

再补述一下在广德楼正式露演时情况，那时科外参加的学生还是不少。开幕的那一天，在门前搭了一个彩棚，挂满了各方面

送的喜联、喜帐，十分热闹。当时的票价是每位一吊钱（铜元十枚相当银币一角），每天卖满堂。因为学生和科外参加的人数太多，每天不能全出台，只好轮班上演。

此种成果有一半应归功于科外参加的学生。这些学生借台演出，虽所得不多，却可与社会人士相见，可以说是彼此借重相得益彰。

在广和楼露演以后，康喜寿、王喜秀（金丝红）、迟喜珠、律喜云、雷喜福、小穆子（董岐山）、麒麟童（周信芳）等比较露头角。康喜寿、麒麟童都常演轴戏。还有唱梆子的水上漂、毛毛旦、银娃娃等也能叫座。梅兰芳与麒麟童时常合演，如《战蒲关》、《九更天》、《庆顶珠》（《打渔杀家》）等戏。

那时候唱堂会戏风气盛行，所以一面在馆子唱，一面应堂会。由于学生多，可以两不误。堂会索价极廉，白天带晚才一百元，但须管吃，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回馆子吃饭来不及。

不合意图股东出让

牛子厚成立科班的意图原为培植一班基本人材，来充实他吉林的戏院，准备第一期学生出科就带到吉林去。后来因为科班在京露演，受到社会人士的欢迎，也就是开门红，所以将科班学生带往吉林的打算也就动摇了。但是牛子厚是吉林人，北京虽然有个汇票庄，常来常往，但在北京添这么一个买卖终究使他心悬两地，不合乎他原来意图。

到了宣统末年，第一期学生大部分倒仓，第二期（连字班）学生还继续不起来，搭班的学生又陆续退出，营业受到影响，开始衰落下去。翌年民国改元、牛氏基于这种种原因，想把科班让

给别人。于是就和北京的外馆商人（一些专作蒙古买卖的商人都集中在北京安定门外、地名外馆）沈秀水（又名仁山）进行商量。说妥以后，牛子厚在王广福斜街元兴堂饭庄定了一个座，介绍叶春善、肖长华和沈秀水见面，三方相谈甚欢，并且还办了让股手续。

牛子厚从此与喜连成科班脱离了关系，并将所派会计撤出，一同出关而去，由沈秀水接充了股东。牛子厚在经营的八年中得到了相当的盈余。在富连成的史料中，牛子厚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更换股东改“喜”为“富”

沈秀水既接充了股东，就同叶、肖两个人商议决定：根据商业习惯把科班改一个字，以划清前后界线，即改“喜连成”为“富连成”。

在牛子厚为股东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干戏院和戏班的，虽然对叶春善十分信任，但有时也参加一些意见。沈秀水是个外行，除去派他柜上一个王姓会计来管财务以外，概不问世。

新的东伙相处甚好。在此不久沈秀水的母亲六十正寿，请富连成唱一天堂会，并说了“东家唱戏也要给钱”的客气话。叶向沈秀水问准了日期，做好了准备，并外串了几个名角。那天学生也都吃的是席（一般堂会都吃中座，次于席面），以示优待。出演的本科学生和外串的名角全很卖力气，结果非常圆满。事后沈秀水赠给本科学生每人毡毯（库伦即乌兰巴托毛质产品）马褂一件。

叶社长得意中遇到飞灾

富连成社换了股东之后，学生倒仓已渐恢复，“连”字班继

起有人，业务又蒸蒸日上。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有个总统府秘书梁敦彦住东单牌楼麻线胡同，在家里唱堂会戏，由富连成作班底，另有外串杨小楼、郝寿臣、王长林三个人合演的《连环套》，余叔岩、尚小云二人合演的《四郎探母》。这几位外串的名角不论是否是叶社长代约的，既是富社的班底，叶春善必要到梁宅加以照看才觉圆满。那时富社有个极不好的风气，就是学生离开家就要钱，有的教员跟出去也不管，因为一耍钱就不往外跑不致误场。学生只怕叶春善和肖长华两个人。叶社长到梁家时，学生正在耍钱，一听社长到了，纷纷地往里跑。时已掌灯，在纷乱中竟把社长撞倒了。他当时昏迷过去，腿也摔伤了，苏醒后已不能动转。大家就用木板把他抬回家去疗养，过了很久才能下地。

“富”字班赶招新生

此时东北又有人来北京约角，富社骨干也被约去不少，如高喜玉（元元旦）、赵喜贞、赵喜奎等，还有好多场面、杂角等多人。于是赶招新生，定名“富”字。当时招进的谭富英，学文武老生。他是清末民初梨园书宿谭鑫培之孙、谭小培之子，可以说是梨园世家。就富英艺术来说，够得上第一流老生，可与马连良分庭抗礼。其次是马富禄，他先入鸣盛和科班坐科，后因鸣盛和报散，改入富社学小花脸兼老旦，常与马连良合演老旦戏。过去梨园前辈王长林，本是武小花脸，也兼老旦，他常与谭鑫培合演老旦戏。邱富棠学武旦，沈富贵学武生，陈富瑞学武花脸，李富齐学老旦，李富秋学青衣花旦，傅富铭学青衣花旦，茹富兰学文武小生，茹富蕙学文武小花脸，苏富恩学武生，奎富光学武丑、武生，尚富霞学花旦（在科内一直演花旦戏，出科仍演花

旦，后因尚小云班内小生朱素云已老，无小生，富霞才改唱小生），范富喜学青衣花旦，钱富川学武生，唐富先学青衣花旦，宋富亭学架子花，范富春学武旦，吴富琴学青衣花旦，高富全学小花脸，陈富康学武老生，杜富兴学青衣、杜富隆学小生（他是富字班最小的、常与杜富兴演对戏）。以上全是本科的优秀生，其余场面、杂角等不列名。本科共收了七、八十人。

富字班陆续起来了，还有一部分连字班没走的帮助，才能维持局面。按科班制度，坐科一写就是七年，满科后照例留科效力一年。但也有满科就走的，不是在本埠搭班就是被外埠约走，当然这都是比较优秀的。这不能责备学生家长不讲义气，因为大多数坐科学戏的孩子多半都是家境贫寒，眼睁睁盼着孩子七、八年毕业了，外埠人拿钱来约，说好当时就放下现洋一两千块，孩子也红啦，家里也阔啦，谁肯多受一年之苦？所以马连良刚毕业就被福州来人约走，但为时不久，因只带去几个人，福州戏院班底太差没法配搭，凑合下去恐影响声誉，就赶紧回来，搭入尚小云班了。

继起需人 四科招生

以上三科喜、连、富，虽然是人才蔚起，但好的满科就走成了风气，因此，一科顶一科不容间歇。继续又招第四科，定名“盛”字。这时叶春善、肖长华的儿子也都想入科。当然先登记别人。如裘盛戎，他父亲是裘桂仙，已经故去，过去是个有名的花脸，还拉一手好胡琴，谭鑫培生前曾临时约他架过弦，也是胡琴名手，余叔岩生前和他配戏时间较长。裘盛戎已成第一流花脸，可以说家学渊源。李盛藻学老生，陈盛泰学文武小生，孙盛

辅学老生曾红一个时候，赵盛璧学武生，他在天津时间长，后因堕落倒卧天津。随着登记肖盛萱(肖长华的儿子)，他学小花脸。叶盛章学武生、武丑。叶盛兰学的很多，青衣花旦、文武刀马旦、文武小生，最后专工小生。这二人都是叶春善的儿子。孙盛文学文武净行，孙盛武学文武小花脸，李盛斌学武生，长靠、短打翻打很冲。贯盛习学武老生，也学老旦(在科专演老旦)，贯盛吉学文武小花脸，刘盛通学老生，罗盛远学武生，罗盛公学小花脸，刘盛常学架子花，高盛麟学文武老生、武生，仲盛珍学花旦(他是个有天才的演员，能戏最多，唱作最精，梅兰芳看过他演《金山寺》、《断桥》，曾评为“可造之材”，可惜离出科还有半年就不幸死了)。钰盛玺学老生，林盛竹学武花脸，刘盛莲学文武花旦、青衣旦角，张盛禄学老生，杨盛春学武生(他的武工甚好，能戏最多，原来叶盛章排《三岔口》是他的任堂会，后以他搭入梅兰芳承华社才改由苏富恩配)，许盛奎学武花脸，王盛意学青衣，李盛泉学老旦，张盛利学老生，李盛佐学文武小花脸，韩盛信学武花脸，孙盛芳学青衣花旦，朱盛富学武旦，毛盛荣学武生，冯盛润学老生、老旦。这些都是优秀生。

这“盛”字班最红的，如裘盛戎、叶盛兰、叶盛章、高盛麟。再如文武老生李盛葆，在科时曾学高庆奎，后专摹仿马连良，如《群英会》、《四进士》、《苏武牧羊》等都摹仿得惟妙惟肖。

招收五科 人才涌现

招收第五科新生，定名“世”字，如袁世海学文武花脸，李世芳学文武青衣花旦，毛世来学文武花旦带小生，迟世恭学文武老

生，沙世鑫学文老生，詹世辅学文武小丑，李世霖学文老生（他入科一年已能正戏，常与裘盛戎、袁世海合演《鱼肠剑》，他的伍子胥，裘的王僚，袁的专诸，颇为观众称赞。）李世奇学文武老生，耿世忠学老生，姚世茹学武老生带武生，李世章学文老生，江世玉学文武小生，张世桐学武生，袁世涌学武二花，艾世菊学武小花脸、武生，贾世珍学文武旦角，王世续学文老生，叶世长学文武老生，华世丽学文丑，傅世云学青衣花旦，傅世兰学正工青衣（他在科时很红），高世寿学文武老生，高世泰学武丑，刘世勋学文武老生带老旦，阎世善学武旦，班世超学武旦，朱世友学老旦。这“世”字班招收的比较多，仅把优秀出色的写在这里。

李世芳不幸遇难

富社自开始就没出好唱工青衣，到第五科居然出了一个李世芳。他唱作都好，在科里真算是出类拔萃，有小梅兰芳之称。他与袁世海合演《霸王别姬》，酷似梅兰芳。他一出科就先想与袁世海一起组班，世海还聪明，向他说“才出科资望不够，过几年再说吧！”谢绝了他。这时老演员姚玉芙，对于世芳特别器重，把女儿嫁给世芳，并叫他到上海去找梅兰芳想出路。梅也很看重世芳，认为他是后起之秀。

他到了上海，就住在梅的家里。梅还给他说了几出戏，但并没安置他。世芳住了很长时间，决定回北京。当时他坐的飞机是“霸王号”。飞机到青岛附近，不料遇上大雾，迷失方向，不幸撞在山头，全机人同遭于难。世芳竟得如此惨局，这不能说不是戏曲界一个损失。

科班正在鼎盛社长忽然病逝

一九三五年“富”字班优秀学生大半尚未出科，“盛”、“世”两班又蔚然继起，真是人才济济、兴旺发达。白天在广和楼演出，夜晚则在华乐演出，天津也经常分包去演，很受欢迎。如遇叶盛章、李盛斌合演《三岔口》，准卖满堂。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李盛藻等在天津人缘亦甚好。

这时山东省的主席韩复榘，派人来京约富社到济南唱堂会，富社很愿意去，因为唱完堂会就准备在济南北洋戏院露演。起程那天，全班人员准备齐全，登车要走了。有一个学生迟悞没赶上车。到济南当天有堂会，这个迟到的学生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叶社长当时很急躁，精神受刺激，因此病倒济南，被人护送到北京，病势很重。虽然经过很多中、西名医诊治，但已病入膏肓，终于不治，竟溘然长逝。当时年仅六十一岁，壮志未酬，不少人认为这是戏曲界一大损失。

继任社长事关重要

自从富社成立至此三十多年，叶春善、肖长华二人始终和衷共济，才获得了当时的成就。叶社长中途病逝，一般人都认为由肖长华继任社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是富社的师生以及叶氏弟兄，也认为顺理成章，肖长华本人也觉得义不容辞。但是他此时正在上海搭入承华社，与梅兰芳长期配演，主要是与上海戏院有合同关系，不能不履行到底，而富社万不能无人负责，遂有人提议让叶社长的大儿子叶龙章继任。龙章本是外行，一向在东北作事，此时正来北京奔丧，遂经过各方面酝酿，又经电报请示

了肖长华，这才决定由叶龙章继任富连成的社长。

业务不振 同业帮忙

富社的叶社长故去，又面对戏曲学校（校长程砚秋，为时不久即停。李和曾即出在该校。）这个劲敌，可以说不利因素接踵而来，因之声势下降，业务不振，又有许多学生纷纷出科，即每天唱大轴的李盛藻也脱离了母社。并且不但好的走，差的也跟着一起走，因为师兄弟们在科里一起配搭都熟了，若一出科配搭生手就唱不好啦。所以高盛麟出科时，带走张盛利、李盛海、毛盛荣、陈盛泰等很多人，这也对富社影响很大。

尚小云在同业中是个极热心的人，对富社这种情形颇为关怀，就在李世芳、毛世来、袁世海等人还没走的时候，帮助他们排演了几出新戏，借此振起富社生气。如排《新天河配》，全体参加，每天卖满堂。《酒丐》，是叶盛章主演；《金瓶女》，是由李世芳、毛世来合演；还有一出《昆仑剑侠传》是由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沙世鑫、江世玉、叶世长等人合演，最为精彩热闹。

富社经此花样翻新，果然声势大振，抬起头来，但又觉人手不够，急于招生。

六科招生 取名“元”字

第六科“元”字班进行招生，招入的有：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学武生、老生，黄元庆、徐元珊、茹元俊、王元信学武生，王元喜学武旦，白元明学老生，张元贵、马元禄学老旦，高元阜学花旦，刘元汉学武花脸，李元瑞学武生、小生，刘元彤学青

衣花旦，杨元才学小花脸，杨元勋学武老生，杨元英学青衣花旦。以上是“元”字班优秀生。这班招入不多，但也加强了阵容。

借助外力 推陈出新

自从尚小云帮忙替排了几出新戏，使观众耳目一新，挽救了富社。叶龙章认为应该随时改进，不能再泥守旧法。正好从外边来了一个王桂林者，艺名盖春来，专排新戏。他还有很多彩头东西陪衬台面，找叶龙章商量合作，双方互相借重，一拍即合。

当时排出的如《乾坤斗法》、《八仙得道》、《桂影广寒宫》等一类的新戏，除《桂影广寒宫》为整出外，其余演头一本接着二三四本连台往下演。

有时文场里加上一部分广东音乐，或者再附上一段舞蹈，使观众觉得新颖，受到欢迎。富社的班底好，演员都有几年坐科的真实工夫，再配演新玩艺，自然精彩动人，所以影响很大。

自从与王桂林合作，富社业务发达，声势大振。但一般学生都认为这种玩艺大部分靠彩头陪衬、音乐伴奏等，是偏重物质的集体艺术，如果把工夫全搁在这上，唱的多么好，出去也不能挑班独立，因此更想早点从科里跳出去。这一来就更挂不住人啦。于是为了维持局面不得不再赶紧招生。

最后一班 半途而废

这一班原拟取“盛世元音”之义排以“音”字，肖长华认为“音”字不如“韵”字雅致，于是改用“韵”字。这一科只收三十多人。

把优秀可记的写在下面：张韵秀学青衣花旦，冀韵兰学武旦、小生，谭韵寿、王韵武学小花脸，李韵兰学花旦，刘韵秋学老生，韩韵杰学武生、花脸，黄韵甫学小花脸，郝韵长学武生，楚韵良学老生、武生。按这一科人数不多，颇有可造之才，后以富社环境日非，以至停业，所以这些学生也随之风流云散。

药店失火 殃及富社

一九四二年富社与王桂林合作的时候，正是沦陷时期。白天在广和楼，夜戏在华乐，分成两班，局面还不错。华乐邻近长春堂药店，它是避瘟散的创造者，所用的原料主要是来自日本的薄荷冰，那是易燃性的东西，不慎起了火灾，波及到华乐（正上演《桂影广寒宫》），连房子带戏箱等都被烧了。经过交涉由长春堂赔了戏箱等，答应重修房子。但是连绘图带修建共需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出演华乐夜戏的学生大部分离开了北京，各奔前程。有的参加当地各班。虽然经过重整旗鼓，但仍是每况愈下，不久就报散了。“韵”字班学生也没满科毕业。

在此以前，沈东家将富社让给叶家，叶氏弟兄分家时将富社分给叶荫章，所以就在他手里告了终。

富连成社虽然告终，但在四十多年历史中培植了七科学生，其中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就我所知择要写在下面。首先说叶氏弟兄，盛章、盛兰二人在北京全成立过班社，也时常到外埠演出，到处均受欢迎，后来认为自己挑班太操心，盛章曾与李少春合作，盛兰则参加马连良的扶风社，现在二人全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剧团，任副团长。叶世长则是京剧院剧团演员，谭元寿参加了北

京京剧团，谭韵寿参加了中国京剧院，纪韵兰参加了南京江苏省京剧院，袁世海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剧团，任副团长，毛世来参加了吉林省戏曲学校为校长，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全参加了北京京剧团任正、副团长。（以上是六三年情况。）

我自前清末年到现在，所见的多少个组织科班的，真正历史悠久，精神一贯，造就人才众多，驰誉于各省市的，只有一个富连成科班。这是由于叶春善社长的坚苦耐心，立法精严，处师徒如父子，和肖长华老先生的四十年如一日的热心协助，才有这样突出的成就。

回想我所亲见成立的科班，历时都不很长。如：陆华云办的长春班。坐科的有荣蝶仙、张春彦、李春林等。田际云办的玉成班（后改小吉祥），坐科的有张玉峰、李玉奎、陶玉芝等。郭际云（艺名水仙花）办的鸣盛和，坐科的有张鸣才、李鸣玉，小翠花、马富禄二人也入过鸣盛和，报散之后改入富社。前清皇宫戏班（升平署）负责太监王姓（那时都称他“祥王老爷”）办的三乐科班，（出名人李继良）坐科的有尚小云等。俞振庭在民国初年办过一个斌庆社，坐科的有徐碧云、孙毓堃、朱斌仙等。此外程砚秋办的戏曲学校，尚小云办的荣春社、李万春办的鸣春社，为时也都不太久。

总之办科班不是件容易事。富连成科班在众科班中是历时最久、成绩突出的一个。

中华书局历史点滴

徐 秀 成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伯鸿，姓陆费，名逵，字少沧，浙江桐乡县人。先世本姓费，十七世祖出嗣舅父陆氏，便改陆姓。隔数代，费氏本支无人，又兼桃两家，因此复姓陆费。

陆费伯鸿的头很大，外号大头先生，他自己给朋友写信，也往往署名大头。他好读书，好写文章，记忆力和计划性都很强，多年往事偶一谈及，丝毫不爽；对未来的工作，胸有成竹。这就是他的创业本领。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是依然有问其姓名、个性及中华书局简史者。谨就所知，略述点滴。

一、中华书局是清末时代的产物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我国冯子才、苏元春等将领大败法军于谅山。清廷昏庸，反与法帝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提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清廷败与日本，签订马关卖国条约，更给我国人民以莫大刺激，政治革新的要求，便迫切起来。清廷坚持“宁给友邦、不与家奴”的祸国政策，顽固阻挠革新，于是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行动。

伯鸿先生亲历其境，受革命洪流的激励，一心赞成革命。又

思欲使中国独立富强，不但要自革命着手，也要自提倡科学文化着手，因此专心创办书店。

清朝末年，湖北省提倡新学校早。伯鸿先生因受湖北新学吸引，十八岁时到湖北武昌教书，并集资一千五百元，于武昌横街头开设新学界书店，发行《出使四国日记》（薛福成编）、《新政真诠》（何启编）、《盛世危言》（郑观应编）、《救时要义》（陈虬编），以及康梁所编各书和上海广学会出版的科学书籍等近千百种，另售《蒙学课本》。（此书当时有两种，一是南洋公学出版的，是我国最早的小学教科书；一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适用最新教科书》）

所发行的书籍，每种留存一二本，另辟一屋，做为寒苦学士阅览处所，因此交游日广。先生每天也在边卖边读中，真正做到了“架上不存连日货，腹中留有架上书”。

他旋应聘《楚报》主笔。因反对铁路借款筑路，得罪湖北当道，《楚报》被查封。当局大索主笔，他脱险逃往上海，任文明书局经理。年二十三岁时，又就聘商务印书馆编辑兼出版部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他预料必当成功，乃约同戴克敏、沈知方、陈协恭等人，日夜赶编《中华小学教科书》。编成后，发表宣言，以下列四项为出版宗旨：

1. 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2. 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3. 注重实际教育。
4. 融合国粹欧化。

宣言和样本，受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和各省新学界的重视，他立即集资二万五千元，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华书局（此时伯鸿先生年二十五岁）。开始发行《小学教科书》，很受国内小学欢迎，发行量逐步扩大。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成立早十五年（一八九七年成立），资金又雄厚，较中华百倍以上。它于一九〇三年创版的《小学适用最新教科书》，早已风行海内。中华《小学教科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行，不免大受影响。中、商两家，因此就长期展开了教科书利润的争夺战斗。同行是冤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但也因竞争而改进了教科书的内容。一九一九年范源濂应聘于中华书局任编辑长，他使中华书局教科书的质量得到了改进。

中华书局成立时，中国出版业大多数集中在上海，据说有四十四家之多。除了最大的商务、中华之外，尚有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嗣后中国图书公司归并于商务，文明书局先同有正书局合并，嗣又归并于中华。中国出版业，就自此形成了中、商两家领先的局面。两家都是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这在商业性质的文化事业中就更占优势。当时出版界的主要矛盾，是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的矛盾，对于后来政治发生根本影响的，则是一九一五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改名为《新青年》），和一九一八年创刊的《每周评论》，它们是最先接受伟大十月革命影响的刊物。五四运动后，革命文化浪潮日高一日，中华书局为了追随潮流，陆续出版了《新文化丛书》等，同时调整了各种杂志的组织，并不断改进书刊内容，以迎合新文化的要求。但是不敢放步前进，终究还是以出版教科书和古典书籍为中心。

二、中华书局与孔家官僚力量的斗争

中、商两家，当时各依人力物力和交际力，维持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中华”物力在“商务”面前相形见绌，一九一七年几乎倒闭歇业。“商务”力谋吸收“中华”，但因条件较苛，始终是水乳不能相融。

当中华书局濒临绝境时，孔祥熙、宋子文乘机以投资相利诱，企图夺取“中华”做为其政治资本（他们知道书籍在宣传上的重要作用）。但因旧有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设计，一边利用，一边限制。因此宋未得投资，仅借给大宗款项，孔投资仅占百分之一。

据说当时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有一种“马大妈”的思想风气。“大妈”就是指孔的老婆宋蔼龄，“马”就是跟踪，就是“马首是瞻”的意思。孔操纵市场，垄断市利，都是由宋蔼龄出面。他们的消息灵通，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生意。因此追逐市利的场所就出现了“马大妈”的思想风气。孔投资虽少，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吸引力的作用。此时中华书局又采用厚发股息，吸收资金办法，资金迅速增长，由初期的二万五千元增到一百六十万元，继增到二百万元，终增到四百万元和八百万元。孔家力量，虽然在中华生下了根芽，但终因股本太小，受着限制，并没有得到什么权利。

资金收足后，因伪关金法币等币制，形同悬岩转石，每况愈下，降低了股息，甚或数年得不到股息，中华股票价格因此就跌落下来了。闻孔又想收买中华股票，但是伯鸿先生对孔总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据传孔也时常说伯鸿先生的怪话，什么“不

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见”，“想成独立王国”等等，这些话传到了伯鸿先生的耳边，他总是一笑置之。孔收买股票的如意算盘，也就没有如愿以偿。

一九四一年伯鸿先生在港逝世，孔即着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受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职务。李对孔惟谨惟慎，孔也就当上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一九四五年人民抗日胜利，孔、李即着其亲信郑健庐去香港恢复业务，做狡兔三窟的准备工作。但是全体职工受革命思想激励，反孔反李的力量无形中壮大了起来。李升明进中华书局时带来了一个名叫姚戟楯的充当协理，替他总揽大权。大家认为反李必先反姚，于是全体职工对姚持不合作态度，把姚赶下了台。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法币日落千丈，孔、李认为离开他们，“中华”必难维持下去。但是全体职工发出了减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号召，汉口分局全体职工首先通过减薪，添售外版书籍，增售文化仪器等措施，不但维持到了原状，且求得了发展。一九四八年孔、李力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全体职工坚决抵制。正在斗争期间，孔见大势已去，一溜烟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这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中华书局，却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三、从发展看中华书局的奋斗目标

一九一五年《大中华》杂志创刊，主编为梁启超，于十二月号撰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称帝甚力。各期社评也揭发了袁世凯一系的阴私，对于倒袁起了一定的作用。前者梁启超曾办《庸言报》意在拉拢袁世凯，及袁阴谋称帝，梁极力

反袁。当时有人说：“任公进了中华书局思想上起到了前后不同的重大变化。”这说明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日见冲淡。

一九三三年《新中华》半月刊创刊，主张对日抗战。当时国内对日有着显著的两大趋势：一则主张对日立即开战，一则得过且过，假忍辱负重之名，过醉生梦死的腐化生活。《新中华》创刊号唱出“快快备战”和“全面抗战”，对于军事、交通、文化等项，都有简要的建议。这一期杂志，一再加印，据说数目达到了五万余本，读者总是以先读为快，争相购买。这说明人民抗日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点，“中华”的抗日主张，大得人心。

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华”曾聘请钱亦石为编辑。钱是湖北咸宁人，早年参加革命。当武汉马列主义小组成立时，据说钱曾同李伯刚创编《武汉评论》和《武汉星期评论》，后到上海成了左联名将。上海抗战爆发，钱即服务战场，组织慰问团和战地工作组及儿童剧团，积劳成疾，一九三八年病逝，葬于上海虹口。伯鸿先生闻知，哭泣终日。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新中华》的每期社评，都指出了蒋家天下大势已去，这也说明了心理上的向背。

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总公司和各分公司都建立了学习制度，全体职工始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即出版苏联知识小丛书和人民民主国家介绍小丛书，颇受读者欢迎。全体职工在学习基础上，提出立即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乃于一九五〇年筹备和“三联”、“商务”、“开明”联合，走向合营，取名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旋又并入新华书店。

一九六二年元旦写于汉口

评 剧 的 起 源

徐 存 甫

我的朋友是河北省丰润县东丰台镇人。他说，在清朝末年，我们那里有一种农村副业，就是制做“年画”。它是过去农村家家必备的新年点缀品。河北省专产年画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天津以西的“杨柳青”，它那里的年画专销河北省西部各县；一处就是我们东丰台，专销河北省东部各县，并远销东北三省。

年画制作的程序，是把各种图案先钩出轮廓制成木版，上了黑色印在白纸上，然后再散给各村庄的农民去填色。此种手工差不多都在冬季农闲的时候，由几个人凑在一个家里共同做，颇像现在的“流水作业”：就是描红的拿着红笔，专描红的色，描绿的专描绿色。大家凑在一起干这项活的时候，感到生活单调枯燥，于是就哼哼唧唧的用自来腔信口乱唱。那时没有无线电收音机，农村里偶尔能听到的玩艺儿，就是野台子戏里的西皮、二簧、梆子、打莲香的（把一根竹杆挖上若干孔、里边加上铜制钱，唱者拿着竹杆一面唱一面耍），大伙哼出的唱词、腔调，就离不开这些。大伙就东一段西一段乱唱，起初南腔北调、难听刺耳。正如古人所说的“下里巴人之音”。

其时有一个村子叫于潮庄子。这个村里有一伙人在哼这些自来腔时，渐渐能够大致合拍了。从此就有了较为固定的腔调。又

随意想出一些戏中人的对话，便有了词。随后在过春节的时候，大家便凑在街头上，扮作男女各种角色演唱。扮男角的穿上一件干净衣服，把小辫挽成一个鬏子，扮女角的擦上些胭脂和粉，穿上红绿衣服，这便由清唱发展到有了化装。他们在空场上蹦蹦跳跳做着动作，再加上胡琴、笛子伴奏，当时人们便称之为“蹦蹦戏”。上演时不论唱哪一出戏，一上来就一律唱以下四句开场白：“竹板儿一打响连天，问一问伙伴们唱哪一桩，要唱文的有包公案，要唱武的有上梁山。”唱完这四句以后，再转入应该唱的戏词了。

那时终年受苦难的农民男女，很少有娱乐的机会。“蹦蹦戏”出现以后，有的三里五里以外邻村的人们还点上火把，到于潮庄子来看戏，围观的人群多到好几层。因为站在远处的人看不见，于是村中好事的人，就用木板搭个高台子。这一来吸引的人就更多了。那些扮演的人，一面唱旧的，还一面在编新的。还有的人点戏目送点心等等。闹得整个东丰台镇，真是万人空巷，人们趋之若狂。

后来这种戏逐渐传到唐山，唐山市小戏园子就把这伙人约去登台演唱。唐山的居民多半都是开滦煤矿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这种大众化的通俗玩艺儿，适合这些人的口味，在唐山地方颇受欢迎，可以说是开门红。为了适应新环境，就添置行头和找文人编新戏本。结果这通俗的曲艺就专业化了。这种戏曲起初叫“小戏”，后来发展成为“蹦蹦戏”，又由“蹦蹦戏”发展成今天这样大众化的评剧了。

还有一个丰润县的朋友说，在这评剧雏形的时候，不论春夏秋冬，一般乡邻们都怂恿着演员们，有空闲就演。附近的男女老

幼都争着去瞧，尤其是那时未被解放的妇女们，终日受苦受累，一朝能看到开心的评剧，更趋之若狂。当时有一个旦角叫“万人迷”尤为叫座。据说有一个妇女听说他演蹦蹦戏，赶紧抱起炕上的孩子去听戏，慌忙中把枕头当孩子抱起就要走。还有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去听戏，经过一个西瓜地，叫西瓜蔓绊倒了，直着两只眼睛没把孩子抱起来，抱起一个西瓜就要走。

这些虽然是流传的笑话，但是从这笑话里可以想见当时“蹦蹦戏”迷人之甚了。

因为评剧创始于唐山，以后到外地以及京津演唱时道白还用唐山乡音。这正如京剧“皮、簧”本渊源于汉剧，所以它的唱、白都要像湖北人的发音。

现在，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评剧正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现代的评剧，已与当初的“蹦蹦戏”有了质的变化。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二）

刘 开 渠

在飞来峰前

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我由马赛登船，踏上归途。我站在船头上，眺望着我住过将近六年的法国，一股眷恋之情象浪花涌进胸中。我想起美术街对面的巴黎美校，想起我流连在米罗维娜斯像前连饭都忘了吃的情景，想起坐在趣罗丽花园往速写簿上画着嘻笑游玩的女郎和小孩的时刻，尤其是想起在一起做雕塑和争论艺术问题的老师和同学，离别之情，难以割舍！

船开了，我回头久久地凝视着马赛港，直到港口朦胧不见，才转过身来。这时，船已开足马力，船头犁开碧蓝的地中海海浪，向东方前进。东方，我要去东方，回到我亲爱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雕塑事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春夏之际，印度洋还没到大风浪季节，船平稳极了。若不是触目都是无边无际的大洋，远处的长鲸向空中喷吐着水花，真会忘记是行驶在海上。

船停泊在新加坡港口，我登岸游览。那里有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更多的是中国式的房屋和街道。忽然，我听见了唱京戏的声音，那悠扬的琴声、鼓点，圆润的唱腔，使我感到十分亲切。祖国，我已经快到你的身边了，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和气息！

当船行驶到临近香港的海面时，我发现香港的山头上架着许多门大炮，阴森森的炮口对着我国大陆，仿佛随时准备轰击。我欢跃的心顿时沉了下来。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然而现在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跳板。这种情景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了实在气愤。我们的船又行驶了一天多，终于看见了吴淞口。吴淞口是祖国的东大门，伸向大海的长江两岸，如同祖国的两只手臂，欢迎她的儿子的归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到了上海后，立即去中央研究院看望蔡元培先生，向他汇报了我在法国的学习情况。他听了十分高兴，对我说：“你能回来为中国雕塑工作，这是很好的。从发展上看，雕塑没有绘画艺术那样兴旺，希望今后你为中国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工作。”这时鲁迅先生正在那里看报，蔡先生把我介绍给他。鲁迅先生说：“过去只做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

到了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就让我担任雕塑的教学。当时雕塑系只有十几个学生，教师是一位白俄。这位白俄好酗酒闹事，时常在西湖边调戏妇女，被警察告到学校。校长为了他很伤脑筋。后来，学校不得已把他辞退了。

我到杭州一个多月后，生了一场伤寒病，在一所天主教会医院里住了四个多月。在病榻上，我想了许多。从我国雕塑的过去，想到今后的发展；从我个人的创作，想到对学生的培养。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雕塑发生了兴趣，开始注意中国历代雕塑，曾多次到图书馆和书摊上去找雕塑资料，但能看到的资料是不多的，就是有一点，也只是在别的史书中带上寥寥几笔。那时，我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我到各地去参观。在法国时才看到了

法国人和英国人写的关于中国雕塑的书和图片。现在，学校图书馆也有了日本人著的中国雕塑史，给了我比较系统的知识。在我身体稍微好些时，我就时常到飞来峰、烟霞洞等处考察。

飞来峰是一座不大的山，可是布满了大小佛像，从五代经宋到元朝，各有刻像，烟霞洞等处也有。这些像大都刻得很好；有些是原像被毁，后人修补的型像，都是失真的了。灵隐寺的大佛不仅造型生动，而且雄伟，好像要使人情不自禁地拜倒在它的脚下。罗汉堂里的每个罗汉形象，各自不同，表现手法也很丰富，我看了久久不愿离去。我从飞来峰想到规模巨大的大同云岗、龙门、敦煌。在古代工具、运输条件都非常不便的情况下，我们的雕塑家竟然能够在峻峭的高山陡坡上，凿出洞窟，在洞里雕刻出如此伟大的大佛像，真是了不起。我为我国有如此高超的古代雕刻艺术而自豪。

我见到古代雕刻的题材，多是与宗教有关的，直接反映每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雕塑品是极少的。这样一类的题材内容，反复出现，形成了一套程式，只是在人物形象上，塑造手法上，略有粗犷、挺拔、清秀等等不同罢了。就题材内容和造型上来说，始终没有跨出前代人的框框，所以中国雕塑到唐宋以后，发展是很缓慢的，也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以至有些人认为这种不变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就是必须遵守的规律，这当然是不对的。

我认为艺术主要应反映生活，应该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在每个时期内有所更新、前进。内容决定形式，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在未有学校以前，学习雕塑的方法，主要是由家传，或拜师从学。师傅做，徒弟跟着模仿，这样过了几年，徒弟就学会了几

套不同题材的塑造，比如佛像、观音、八仙过海、麻姑献寿等等。跟师傅学得套数愈多，学到的本领愈大，能够在师傅教的题材基础上出新样，那就更好。这种学习方法，基本上是临摹。从临摹的角度上说，掌握前人的技术是比较快的，能按着老样作品进行制做。但是，临摹得熟练不等于学会了能用雕塑直接去反映生活的本领。以前我也接触过老艺人，他们的优点很多，在古代传统形式作品的制作上，他们确实做得很熟练，他们的作品有时的确很好看。但这究竟是传统的东西，复古的东西，离开现在的社会，离开现在的生活，是很远的。如果要他做个反映现时社会生活的新作品，就十分困难了。我认为传统的学习方法，只能使我们了解古代艺术，了解古人的造型处理手法；要表现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再完全沿用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我们不能把以前时代的内容和形式，总是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某一种内容和形式在初被采用时，是好的，是能创作出好作品的；但如果总叫人原封不动地摹仿下去，不能有所变化，那么艺术便僵死了、枯竭了。这在中外美术史、文学史上的例子是不少的。

我想使中国雕塑从以宗教等题材为主的道路上，转向以反映现代社会、社会生活为主，艺术形式能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前进。

我在创作上，想努力做到使自己的作品不离开社会生活，使它能够概括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作为自然的人，在时代的进程中，生理上是无太大变化的。主要的变化在于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对人生的认识。我们应该把这些新生活、新思想、新认识，做为雕塑创作的主要内容，从而创作出不断向上的新作

品。我认为，说一种技术方法，开始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就说是哪国，哪民族专有的，而且不能有新发展，是错误的。火药技术是中国发明的，后来世界各国都应用了，能说他们都是“中国化”了吗？这种例子在科学上是举不胜举的。同样，在雕塑艺术上，直接反映当代社会、反映今天人的思想感情的方法，是任何国家的人民、民族都可以用的。但由于反映的题材思想内容不同，作者的气质和感受不同，艺术上的修养不同，也就创造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产生各民族不同的艺术。其次，我认为传统也应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古人的认识，古人的传统，可以帮助我们对人、对社会、对自然有所认识。在前人的认识上，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能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新境界，新意义，我们能够有更高的认识；我们绝不能把传统的东西当成认识的终点，当成最高点，认为后人就不能比前人更高。传统的形式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我们这个时代变了，我们的认识也应该变，因此传统也应该变。社会上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习惯于古代宗教雕塑和前代的艺术形式，认为离开了这种造型，就不是中国雕塑。我看这纯属一种偏见，一种停止不前的见解，是今不如古的错误思想。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感情，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社会又随着人们的认识和思想的提高而进步。这是不管哪国人民，哪个国家前进的共同规律。如果封建社会的人总说奴隶主义好，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总说封建主义好，认为后者不能超越前者，必须象孔丘那样，“郁郁乎吾从周。”一切都要照着前样做，那我们的社会还能有什么进步？所以在雕塑创作上，和培养青年的指导思想，要打破“传统至高无上论”，才有助于后人向新的高度前进。

史书上关于古代雕塑的记载是寥寥无几的。人们只把雕塑当成菩萨、陪葬、陶俑和陵道翁仲看，从没有被视为像书画一样高雅的艺术品。雕塑的作者都是些被社会瞧不起的匠人。直到学校有了雕塑系，社会上仍没有把雕塑品当作供欣赏的美术品看。我在回国后的几个月，做了一些社会调查，社会上所谓雕塑就是指佛像、菩萨或寿像。由于我用泥来塑像，邻居都叫我是做泥菩萨的，警察把我列为靠此谋生的摊贩，让我去登记。没有人找我为活着的人做像，说是我会把活人的灵魂收去。我找了几位朋友为他们做头像，这些头像也都是被当作某某的照片看，没有象中国画那样，被作为美术品来欣赏。

我睡在病床上，坐在飞来峰前的茶座上，想了很多。我意识到雕塑的前途是困难的，道路是坎坷的。古代的伟大雕塑品鼓舞了我，我决心不怕千辛万苦，为发展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的现代雕塑艺术，尽我一生的努力，雕刻一座来自人世社会的新飞来峰。

教 学

一九三三年底，我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我第一次走进教室，发现学生的基本练习都接近罗丹的泥塑手法，连如何堆大型，也是有些罗丹的影子。在随班观察几天之后，我婉转地对同学说，基本练习的目的，是要通过实践达到逐步提高观察能力和塑造能力；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提高基本功，使之成为自己的本领，就必须加强自己的观察能力，对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加深理解；按照自己观察和感觉到的印象，去描写、塑造，逐步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临摹，达不到锻炼眼睛、增强感受力的目的，在技巧上也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仅如此，“师古人”

师久了，不易跳出古人的圈子，而且会把许多新鲜的题材和内容也都套上古人的色彩和形式，受到桎梏。有人觉得：“今不如古”，“古人才能入画”正是“师古人”的结果。我不反对初学者临一点古人，正如小学生“描红”，临点好的书法是有益的，是必需的，但不可作为最终的目的。我们学习和练习基本功是为了在艺术上有能力创作新作品，培养具有我们时代特点的雕塑家。

开始，我的观点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甚至有的同学说，罗丹是伟大的雕塑家，我们照他的手法做，难道不对吗？因此，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和我是有隔阂的，但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向学校阐明自己的教学想法。学校同意我的意见。

和同学们相处的时间久了，不仅是我教，他们也提出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不断地互相讨论，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雕塑家，首先应当注意锻炼的是自己的眼睛。眼睛的锻炼，不能只停留在看上，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塑造所感受的对象，描写这个对象，而后又从自己塑成的习作像上来对比、衡量自己的观察是否正确，是否是自己感到的东西。倘若从这个习作上感到的，正是你从对象上感觉到的，塑造技术也就随之提高，这就是能够增长自己本领的好习作。这样反复做练习，不断地增强眼睛的观察能力，不断地加深表现技术能力。能有这样的基本功的雕塑家，就能独立工作。否则，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与人合作，自己就难以前进。

为了使同学们能够充分注意基本功的练习，我有时还对他们讲我所见所闻的美术界的一些情况。

我从美术中学到国内外的美术学院，过了十四、五年的美术学生生活，前后的同学真是不少，经过的中外老师也很多，在美

术界的熟人就更多了。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成了著名美术家，但也有一些人只是人云亦云地在作艺术品，更有些人做不下去了。出现后一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太差，使他不可能继续做下去。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学到扎实的基本功，只是不知所以然地模仿古人、洋人；因此，离开了别人，离开了原有的题材内容和形式，在新的现实面前，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教学生，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等到他出了这个学校，到社会上以后，只要有条件让他们做作品，他就可以自己做，不至于做不下去。

为此，我对同学的基本练习，要求是比较严的。我希望按部就班地进行，扎扎实实地练。这样才能得到好处，不要追求那种表面的虚假成绩。

这样进行基本练习，同学在开始时是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正因为困难，就不能不认真观察对象，不能不想方设法进行塑造。为此，他们就必须仔细考虑教员的正确意见，正确地、而不是皮毛地借鉴古人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同学们就能逐步地自己进行工作，向深度发展。

当然，在雕塑创作上，单有基本功是不够的。我劝同学们读中外历史，尤其是读通史，读比较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从古人的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中，比较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应如何走自己的路。做我们自己的雕塑品。其次，我劝青年雕塑工作者多读诗，多听音乐，注意建筑艺术，以加深修养。雕塑在形式上近绘画，但在艺术处理上，更近诗的韵律，更近音乐的协和，更像建筑的大小体积、明暗安排。艺术品的最根本来源是

社会生活，是由社会影响而产生的思想感情和人的素质。每一件雕塑品产生的开始，都是由外在的或作者自感启发的，也就是平常说的“灵感”。灵感离开生理，是感不到的；但灵感的内涵是由人所受的思想感情教育，社会环境等等形成的。因此，一个雕塑家要想做作品，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培养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不断地有“灵感”，才能不断地有“自我感受”。这种“灵感”、“自我感受”是否正确，形成雕塑品后要在人群中产生什么效果，每个作家都是在考虑的。在这上边，每个作家的考虑不会是一样的，也不必一样。但在总的趋向上，我希望同学们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管走了多大的弯路，总是向上的，总是以达到人类身心能健康发展为目的——来衡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是否对人类的进步是有益的。

我的雕塑工作

我于开始教学的同时，在杭州西大街武林村弄堂租了一个小单元。在仅有两平方米半的天井上，加了个玻璃顶棚，作为工作室，雕塑工作就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这地方离西湖不远，我到位于孤山的学校上课，或早晚到湖滨去散步，总爱在断桥上停留，心旷神怡地观赏美丽的风光。白居易诗云：“湖上春来似画图”，苏东坡赞曰：“浓妆淡抹总相宜”，确是写出了西湖的神韵。我想，若能在这桃红柳绿、苍松翠柏之间，立几座洁白的雕像，不更能显示出河山壮丽，人杰地灵了吗？

于是，做雕塑的欲望更加强烈。

但当时的社会，没有用雕刻艺术装饰、美化园林风景区的习

惯。我也不愿做宗教或宣扬迷信思想的雕像。社会更不把雕塑当作美的艺术来看。

为了打破旧俗，开辟新路，我和雕塑系的同学一起在城里举行雕塑品展览，宣传雕塑艺术，希望引起社会的注意，想让人们知道，雕塑决不只是做泥菩萨，它主要的功能和文学、绘画一样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是供欣赏，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陶冶人们的性情的，是美的艺术。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雕塑；回家后，就在小小的工作室里，塑造我周围的人的像。我想通过塑像歌颂、赞美中国人民。让看到像的人，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而且能体会到自己民族的聪明才智，精明强干，从而启发观众在各自的行业上，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进步，大胆地创造，努力前行。

除了教课之外，我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雕塑工作上。我做了三个青年女像，两个男像，一个女裸体像。这些雕塑品的照片很快就被画报拿去发表了。但作品却留在我家里，因为人们不把它们当作供欣赏的美术品看，只把它们视作某某私人的肖像。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象中国画幅一样陈列在自己家里。

雕塑不象书画，有笔墨纸砚，再加上一点颜料就行了。做雕塑品用石膏、木、石、铜等为材料，创作时需要请模特儿作参考。这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也需要用钱置备材料。

钱从哪里来呢？靠我的工资是不够的。这时，我很烦恼。我跑到灵隐寺，望着飞来峰徘徊，想到古人为宗教，把偌大一座山都雕刻了，我今天想为人做雕像，竟陷入这样困难的境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买材料，还做什么像呢？

当时，我在北京艺专的老师郁达夫先生也住在杭州。我时常去找他，向他谈了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也谈了我的困难和苦闷。

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春，他说他的熟人要为已死的母亲做个浮雕像，我答应做了。这是我回到祖国后，第一次有人找我做雕像。像的背面是郁先生写的铭文。铸成铜质后，就被那家埋在坟里了，我连个照片也未能留下。

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春，艺专一位色彩学教员周天初找我为“一·二八”淞沪抗日牺牲的八十八师将士做纪念碑。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法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遭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消息，曾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我要回国的意愿。现在介绍我为抗日牺牲的将士塑像，使我有建造大型纪念碑的机会，可以实现我在雕塑艺术上的理想了，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个像在构图的时候，我决定塑两个人，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军官。头部是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塑头像时，我着意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尤其是在战士的头像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

记得这两个头像塑完后，我把它们拍了照，寄给我的老师朴舍看，老师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说这两个像塑得很好，他把照片给巴黎美院的同学们看，给美术界的朋友们看，还说要送到一个刊物上去发表。

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时，订主派人来催，说我做得太慢，他们不能等了。四块浮雕还只是堆了大样，他们就叫几个兵抬走

了。我非常生气，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对待艺术，这样不尊重作者的意见？我和他们吵了一架，但没有用，浮雕就这样草草了事。

纪念像立在西湖第六公园的岸边，场地不宽，离马路和湖滨又很近，左右都有树木，不适于远看。所以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的像座不高。可是后来他们没有告诉我，就叫一个搞建筑的人，一下子把像座加到了五公尺高，这样两个铜像就显得很小，很不相称，尤为奇怪的是在像座上四角，倒装四颗炸弹，不知是为了炸自己，还是炸敌人。我去质问他们，他们却把我拒之门外，不理我了。

这就是雕塑艺术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我更感到苦闷。不久，郁达夫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雕刻家刘开渠》登在报上，对雕塑艺术给予热情支持，表示同情我对雕塑艺术的努力。

这以后，我又做了几个死人和活人的像，都要照着订主的意思做，否则他们处处刁难。这哪里是做雕塑！是受气、受罪。

大约到了一九三六年，我认识了程丽娜，她学绘画，爱戏剧，很有艺术修养。我为不能够做我想塑造的作品而苦恼，她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占领了北平和上海，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消息，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杭州人望见日本飞机在西湖上空盘旋，就惊慌逃避，一片混乱。

程丽娜一家人在十月中旬躲到绍兴，我第二天早上去绍兴看望她们。这天下午就从远方传来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她们一家和我当晚就从车窗跳进了已挤满了逃难人的火车，去了南昌，后又至汉口。我和程丽娜在这流亡途中结了婚。她的亲属在汉口住

下后，我们俩就跟随已迁到江西省贵溪的杭州艺专，再到长沙。一九三八年初我们到了湘西沅陵。仓促离开杭州，我所做的头像和书籍等全部丢下了。在这三个多月中，今天不知明天逃往何方，我无法再想雕塑的事。

在沅陵，学校租了民房作教室，预备长住，又开始上课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逃难的混乱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我有时坐在屋前，想到西湖，想到丢弃在家中的作品和书籍图册，想到不能进行雕塑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愤恨已极。

沅陵城建在沅水、西水相交的山坡上，郁郁葱葱的树林镶着江边，明亮的流水围绕在邻里相毗的轻巧的房屋下边，好似湘西姑娘衣裙上闪亮的飘带，景色十分秀丽。我想，如果能在这锦绣般的土地上添几座雕塑品，该有多好！

白日有所思，晚间有所梦。夜里梦见自己和逃难的百姓整天跑，到处都是死伤的群众和炸坏了的自己的雕塑品。一会儿，敌机又来轰炸了，就急得大喊起来，一喊就醒了。第二天我去城里找沈从文兄和他的大哥沈芸庐先生。他们是凤凰县人，沈大哥定居在沅陵城。学校能够在这里很快地安顿下来，也多靠他们的帮助。沈大哥说，你们这些艺术家能到湘西来，很不容易，应该给沅陵留点作品，这是抗日纪念，也是你们在这里居住过的留念。我对沈大哥说：“我昨晚还做了个梦，幻想在你们城里雕几座像……”

过了几天，沈大哥真的带着城里管事人来看我，说欢迎我在他们城里建立雕塑品，约我一起去看哪些地点适宜建立雕塑品。记得我们从长沙要来湘西时，长沙曾有些人劝我们不要去，说那

里很乱。到了沅陵才知道，当地的头头是个草莽英雄，与蒋的嫡系亲信不和。我见到了他，不料传说是绿林好汉出身的“湘西王”，却很文雅，不仅同意我为他的城里做艺术品，并且很快地为我造了两间木板墙并装有天窗的工作室。我准备动工做雕塑了。

正在这时，由长沙向沅陵、向贵阳逃的人日渐多起来。纷纷传说武汉失守，长沙危急，学校又决定迁往四川。程丽娜这时已怀孕，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是随学校走，还是留在沅陵？我觉得工作室已造成，雕塑的准备工作已齐备，就不想走，让丽娜先走。

沈大哥一片好心，比我想的更细致，他说去贵阳的长途汽车非常拥挤，你们应该早走。向西南逃亡的人越来越多，再拖延怕丽娜就走不了啦。

我仍觉得扔下才建起的工作室走了，对不起热心的沈大哥。可他却说：“你们只管走，别的事不用担心，我来处理。”

就这样，沈大哥把我们送上了去贵阳的长途汽车，离开了我们很是留恋的沅陵和新造的雕塑工作室。

历尽艰辛，我们辗转经贵阳、重庆等地，直至一九三八年底才到了成都。

这时方知道，在长沙大火时，艺专仓促离开沅陵，经贵阳转迁昆明去了。日本侵略军已到湖南。传说纷纭，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打听川、贵、滇长途汽车，都说来去困难。丽娜这时已近临产，再也经受不了汽车的颠簸，我们只好留在成都了。

在成都《华西日报》上，看到我已有十多年未通音信的老朋友赵其文的名字，我就去找他。从他那里得知陈翔鹤、周文、肖

军、李劫人等均在成都。他们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聚会一次，后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以后在整个抗战期间，成都的进步文艺界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它组织的。我告诉其文，成都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是我在北平艺专的老师，曾写信给我，问愿不愿意到成都为在滕县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师长做像。当时我在湖南，觉得四川路途遥远，没有答应，现在被日本侵略军追到成都，王铭章又是死守阵地为抗日而牺牲的，如果他们还要为他立像，我想承担此项工作。这样，一是表扬抗日精神，二是我能继续搞雕塑艺术。

其文很同意我的想法，说应当做，便同我一起去找熊佛西先生；经熊先生说合，就与王铭章所在的四川部队单位商订了造像合同。

他们要求做一个骑马像，连像带座都由我一个人设计，承包费先付一半。

我过去做的都是头像、立像。现在正处在抗日战争炮火纷飞，敌机不断临空轰炸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能为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做骑马像，我很高兴。我想，王铭章是个抗日志士，要在这个像上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激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誓保疆土，把敌人赶出祖国之外。

这个像有三米多高，王铭章骑在马上，挥动着右手，召唤军队向敌人冲去。在像座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浮雕，浮雕反映王铭章等人和敌寇英勇战斗的情景。

在成都从没有做过这么大的铜像，一切工作条件都要我自己从头准备起。丽娜拖着沉重的身体，去找一位在川康铜业管理局

的熟人，帮助订购了三吨铜，租到一家停办的补习学校教室当工作室。我跑到郊外田地里，找到了可以做泥塑的观音土，一车一车地运到工作室；找铁匠铺和木器作坊，请他们做马的骨架和铸像下的铁轨转盘。因为雕像是立体的，必须把像建立在转盘上，做做转转，才能照顾到立体的互相连结关系，使像成为浑然一致的完整立体。但这样的铁轨转盘，铁匠铺铸不了。于是又向一



一九三九年秋刘开渠与夫人程丽娜摄于成都工作室院前

家铁厂求助，才按我的设计铸了出来。我们白天四处奔波，精疲力尽。晚上丽娜泡上浓茶给我喝，提提精神，进行骑马像浮雕的构思，捏草型、设计像座和画建筑图。一连忙了两个多月，准备工作总算就绪了。我们虽然觉得这样不分昼夜地忙，很辛苦，但艺术工作又开始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做大型的雕塑品，不仅是用脑力的创作，还像建房子一样，是细致的工程施工过程。单靠雕塑家一人，是既分散艺术精力，又施长时间的。恰巧，这时有艺专雕塑系的同学到成都来，我就留他们帮忙，一道工作。

因为工作室比较大，文艺界的朋友们有时便到这里来聚会，开诗歌朗诵晚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朗诵了艾青的《火把》。

由于订主不懂艺术，屡次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延迟了泥塑时间。我们只顾埋头紧张地工作，却没注意到社会上的

物价在飞涨。到一九四〇年春，泥塑做完时，房主要加房租，所需用的石膏粉也涨了很高的价。我存在银行里的承包费也贬值了，买不到原来预计能买到的材料。我们赶快搬到另外一个空着的职业学校。这时成都的石膏是由卖石灰的商人带着卖的，量很少。我同商人谈，由他提供足够用的石膏粉。他要的价钱很高，我只好照付。第一次卖给我的质量还不错，但没有想到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第二次送来的石膏粉中，却埋藏着受了潮的坏石膏粉。在灌马身大块阴模时，大部分石膏粉都不凝结。我只好把不凝结的石膏粉洗掉，重新翻制。为此浪费了材料，也浪费了人力、时间和钱。

九月初，一天晚上，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的住处。我说我想到延安去，他说：“欢迎你去。如果一时不能去，留在成都多和文艺、美术界的人士一起，为抗日做些工作也好。有一封信，托你代为转交。”我表示一定亲手交给收信人。由于我的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也由于想结束未完成的雕塑工作，我就继续留在成都。

成都一般的铸造厂怕翻铸不成，都不敢承担翻铜像，我只好自己翻铸了。我请了两位翻过砂的老师傅来帮忙，可是他们没翻过铜，我们就先翻浮雕做试验。翻铸应该用铁砂箱，铁砂箱可以竖起来灌注，使铜水能顺利地上升灌满阴砂模。可是我的经济条件已不允许我先铸铁砂箱，只好用木制的砂箱代替。怕木砂箱承受不了铜水的热膨胀力而破裂，只好将砂箱平放着浇铸。这样，铜水平铺灌进阴模，总不能流满而剩有几处空隙。后来想了种种办法，才把浮雕翻成功。

轮到翻骑马像时，由于缺钱，不能添设备，困难就更大了。

但我总要把它铸成铜像，不能半途而废。

我想出一个办法：在院子里挖一个比骑马像稍大一点的长方形的坑，代替砂箱，然后用厚木板做两个大盖子，当作上沙盖。一个垫底，以使用大铁条连接起来，夹着中间的沙模。马的砂模、灌铜水的浇铸口、散热的出气口等都预先烘干，安装好。坑的两边各砌一大化铜炉，由十六个人轮流拉风箱，吹风扇火。我以紫铜、铅、锡、铝为主，使像成后呈现青铜之色。

老工人要求以公鸡之血祭炉，这是迷信，但为了助长他们胜利完成工作的信心，我同意了；他们将一只大公鸡提在手中，斩鸡头，血洒化铜炉和风箱。

这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白天来轰炸。有一次在成都投弹，一下子就死伤几百人，我们院子里有三人遭难。可是化铜必须是一气呵成，不能因为警报而中断，我们只能等到下午五点钟以后开火，到午夜时，炉火正旺，至黎明三四点多钟时灌铜。到时候了，两个炉中火红的铜水同时向砂模中灌进，周围的人都鸦雀无声地注视着，我的心情更紧张。铜水灌到接近马背时，由于压力增大，也由于一处砂模内未加铁丝网，铜水由该处冲破砂模，从出气口中猛喷出来。焰火冲向空中，将旁边的一棵大树的枝叶烧糊了一大半。铜水像雨点一样从空中向四面落下来，我和在场的工人身上的衣服都烧穿了许多小洞洞。这次事故使马身只铸成了一半，我们只好在这一半上，重新做砂模，接着翻制。经过多少昼夜的奋战，骑马像终于在一九四一年暑翻成功了。

从王铭章骑马像订合同到铜像完成，物价涨了好几倍。原估计够用的承包费，不够用了。要订主根据物价的增长情况，略为增一点费用，他们不肯。我只好省吃俭用，把丽娜教学的薪金也全部



一九四一年刘开渠为抗日阵亡的王铭章师长塑的骑马像填补上，到最后还不够，只好卖衣物救急，继续进行工作。有些朋友看见我狼狈困难的情况，对我说：“你若早用这笔订费跑生意，一定发财了。”朋友是出于好心，但我做梦也未想到做生意，更觉得这对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时，我没有任何别的工作，单靠丽娜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困难。

在这不知怎样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由昆明又搬到重庆青木关松林岗的艺专新校长，约我再去担任雕塑教学。于是我们全家就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到重庆，回到艺专。

学校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时局是这样险恶动荡，那里还用得上雕塑！雕塑这时有什么用呢！学雕塑的同学不多，但都很认真地学习，我也认真地教。我们都相信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打败，祖国一定会重新建设的。重建家园时，一定是需要雕塑艺术的。古代有很多的雕塑，现在仍是我们的骄傲，仍能鼓舞百姓的爱国心。目前，在山沟里教和学，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想到了为了能继承、发展我国的雕塑事业，学些本领，大家就充满了

信心和力量。

学校在北山岗的南坡上，不少的教职工和学生住在南岗的北坡上的农民家里。我们住在一家生活比较苦的农民的猪圈和储牲畜草料的小房上边，开始时不习惯猪圈的气味，久了也就无所谓了。我每天穿过梯田小径，越过小溪到北山坡去上课。在那里住了一年，看见农民秋季收割，打场收粮；冬季整理旧农具，修补破房屋；春季开始以后，又忙着整田，准备耕种。老人、小孩放羊、割草、拾粪。我有时也帮助他们干点活，和老人坐在田埂闲谈。他们说，要不是社会混乱，军阀巧取豪夺，官僚横行霸道，再加上日本鬼子侵略，他们也不会这样苦，生活会好些的。在四季中，眼所见，耳所闻，启发我想做以农民家庭为题材的雕塑品。到一九四二年，艺专又换了校长，而且为了将就他，学校再次搬迁到重庆郊区沙坪坝嘉陵江北岸黑院墙农村。我们一家租住在沙坪坝刘家坟祠堂里，和丰子恺先生邻居。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去的小女儿，就生在这里，所以起名叫刘沙平。从住处到黑院墙，过江后还要走七、八里，遇到天雨路泞，走起来十分困难。有时还要滑倒在泥浆中。我本有头痛病，有一次刚到学校就晕倒了。我和丽娜虽说都工作，但因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不动，所以生活很困难。尤其是丽娜，除了上课外，每天还要牵一个孩子，背一个孩子，洗衣做饭。但她还是让我腾出时间做雕塑。在这一家人挤在一小间屋的情况下，我做了一个少女像。依以为模特儿的女孩子，长得健康又富有中国少女的典型美，我很满意这个塑像。但当时连拍张照片的条件都不具备，后来这个像又失落不见了，使我每一想及，就悔之不已。后来很少再见到象她那样美的少女了。

到一九四三年夏，郭有守先生从成都来信，说那里的市政府为纪念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要做无名英雄铜像，请我去担任这个雕塑工作。但说该市没有多少钱，希望我能半尽义务。我收到信后，很生气：一个市政府说没有钱，倒要我喝着西北风为他们卖力。我多少年来做雕塑工作，不少的时候，由于订主不懂雕塑是艺术，是创造性的工作，只是把雕塑当成是他们眼光所见事物的翻版，在创作过程中乱出主意，甚至以出了钱的老板态度，表示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改，就不要了。真是做一次订主的工作，生一次气。甚至想再不做雕塑工作了，认为雕塑艺术在这个社会中是不能存在的。气头过后，还是爱这一行，还是想做。而且觉得只教别人学，自己不常做，我不是变成了个“说雕塑”的人，而不是做雕塑的人了吗？我只有做好，才能教好，也只有创作出雕塑品，才有雕塑艺术。想到这里，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成都。那是个“无名英雄”像，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我可以按我的意思做，也许能做个比较好的作品。这样，我约两个同学一起，又去了成都。

我原先借用的学校已为别的单位用了，托了好多人，才借到成都市参议会两间房当工作室，和两位同学一起准备塑像泥和木头骨架等。把像的大型堆好，同学回重庆学校学习，我就一个人进行工作。“无名英雄”像是表现一个战士身背着斗笠，穿着短裤，打着裹腿，足蹬草鞋，端着枪，两眼怒视前方，冲向日本侵略者。

我没有模特儿，也花不起钱去请模特儿，我就自己持枪跑步前冲，体会抗日英雄向敌人冲杀的勇敢形象，参照着自己仇恨敌人的情感，来塑造英雄的脸形。他嘴唇紧闭，眼睛里充满怒火，

直视前方。为了塑造好形象，不知反复了多少次。也是在反复塑造中，形象才有了逐步的提高。我在像的周围，在那间小屋里，白日站在木架上工作，夜里也去开灯看艺术效果。每有一点满意的形象出现，就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我深深体会到，刻苦努力探索，坚持不懈地工作，是使艺术逐步提高的必经之路。

像快塑完的时候，一天有人敲我工作室的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徐悲鸿先生。他说他到成都后，听人谈我在塑像，便马上来看我。我连忙请徐先生看塑像，请提意见。

这天天气晴朗，顶棚的光照也比较强地射到像上，使像的造型神情能看得清楚。徐先生一边看一边说：“很成功，很好，向你祝贺！”

我告诉徐先生说，如果能让我做得时间长些，也许还会有所改进。他说：“我去告诉他们，应该允许艺术家有足够的创作时间。”

无名英雄像塑完后，铸成铜质，建立在成都东门外的广场上。铜像是完成了，可又有谁知道我是另外又接做了一些私人头像，把得到的报酬，来补足费用才最后完成的呢？

丽娜为了在工作上帮助我，在一九四三年冬，带着三个女儿也来到成都。参议会因为雕塑做完了，不让我再住下去。后来还是得到郭有守先生的帮助，让我们住进督院街教育所的空房子，将原来的厨房当做工作室用。我在一九四四年做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就是在这四面墙被烟熏得漆黑的小屋中做的。那时，在成都春熙路，有一个很矮小、也不像孙中山先生的石质立像。大约由于“无名英雄”像受到好评，市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又建议由我

来重新塑造一座孙中山像，以换掉那个石像。立像的场地不大，我设计了一座坐像。孙先生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一只脚略为向前伸，另一只脚稍微向后。我准备把像座改建低些，以便和坐像协调。这个象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做完。雕塑工作的进度赶不上物价，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时石膏粉又涨了好几倍，我只好自己买生石膏，自己加工了。

生石膏和石头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用铁榔头把它打碎。丽娜和请来的工人拣大块的打，我的大女儿那时还不到七岁，也跟着用小铁锤，将已打成小碎块的再锤成碎末。碎末不够细，还要上石磨，把它磨成粉状。生石膏粉是有水份的，必须把它上锅炒干后才能用，否则它不凝结，不能做成硬模。因为我们无钱置买炒石膏的设备，只好用我们的铁锅来炒。生石膏放进锅里，随着火力的增加，生石膏粉像水一样在锅里滑动，随后便积成堆。一边翻转，一边炒，等到水分全干时，粉面满屋飞扬。这个最关键、最难做的工作，都是丽娜承担的。

有一次，陈翔鹤兄看见她满身满头白粉从屋里出来，就开玩笑地对她说：“怎么，你们开面粉厂，丽娜做老板娘啦！”这个像，用自己加工的石膏粉翻起来，很顺利。只是在拆泥塑下垫的砖时，石膏阴模倒在丽娜的左手腕上，差一点把腕骨压折。

孙先生的铜像铸成已是抗战胜利之后，安装时我去了上海。后来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改建像座，所以上下显得不协调。

到了一九四五年底，熟人介绍李家钰的家属来找我，要我为李做一个骑马铜像。并说，李家钰是在河南省洛河誓死抵挡日军前进时牺牲的。但公家没有人提出给他立像，所以他的家属愿意自



刘开渠同志在工作
(一九四四年·成都)

已出钱，就是出的钱多些，也一定要在成都为他建一座骑马像。

这是一个同王铭章像一样大的骑马铜像。他们在钱上的确没有太计较，因此我也就有钱能请两位雕塑系的同学帮忙一道工作，同时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做这些私人肖像以外的雕塑创作。

这时候，我想起在重庆青木关松林岗那一年多难忘的经历。由于住在农民家里，朝夕相见，不但看到了他们四季繁忙的劳动场景，象插秧、割稻、喂猪、饲禽，也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虽是在饥饿贫困之中，他们也是渴望幸福、向往欢乐的，他们也有憧憬，也有追求。

我决定用高低浮雕并用的形式，表现他们的生活，倾吐他们的愿望，于是多年来的构思成熟了，我进入创作过程。

浮雕正中是一个健康乐观的妇女，她含着笑在奶孩子，左右各有两个较大些的孩子，分别踏着一只猪和羊。左侧还坐着一个穿草鞋的老人，一个中年男人含笑望着她。右侧是一个握着铁锤的木匠，一个纺纱的女



一九四五年刘开渠创作的浮雕《农工之家》

工。背景则是打铁、拉锯的匠人和驱牛犁田的农夫。在这些人上面，是火车和飞机，整齐的住宅和美丽的园林。我给这座浮雕定名为《农工之家》，这是我在成都真正完全按自己的意愿，不受别人牵制的唯一的大型创作。

浮雕完成后，很多同学和友人来看，都表示喜爱赞赏。他们认为，用雕塑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以农民、工人为题材创作的作品，这在中国雕塑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一个开端。

抗战胜利后，许多战乱时流离失所的文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归去。我无家可归，就想只要哪里有雕塑做，便到那里去。想来想去，觉得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工作机会可能多些，于是便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动身去上海，在上海园场管理处担任技正，负责园林和广场的美术设计。因为那时上海租房子住，房主要先用金条当押金，我没有钱，租不起房子，就住在园场管理处的盛

工具杂物的库房里。有了安身之处，不久丽娜也带着孩子来到上海。

我住的库房外头，是一个很大的清粪池，贮存粪便，沤烂用于养花。所以风一吹，气味就扑进房门。尤其是夏日，更腥臭难闻，令人作呕。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做了鲁迅像、蔡元培像、范旭东像等等，还为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作为篮球赛奖的小型男球员全身像。

直到上海解放，我才搬出了这不能住的住处。

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雕塑艺术的春天就要到来，我的眼前一片光明。

（刘米娜帮助整理）

我和明月社（下）

黎锦晖

（二）中华歌舞团

当初创办歌专，我和许多朋友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如今垮了下来，实不甘心。但当时的环境和经济力量都无条件恢复“歌专”。如把它从公共租界直接迁到法租界，又不可能，只得通过华界美美女校来过渡，而王绶之只允许维持两、三个月。以后怎么办？最理想的出路是组织歌舞团出国。因为：（1）我受着帝国主义和白崇禧的部下双重压力，在上海干不下去了。尤其是那个“黄秘书长”，一时不易摆脱；（2）到国外表演，可筹措一笔经费，以谋重整“歌专”；（3）出国表演，还可提高演技水平，进一步培养中国歌舞方面的专门人才；（4）殖民政府不愿华侨推行国语，更不准个人搞国语统一活动，我想借艺术团体名义，进行调查，以便把自己这几年推行国语的工作，作一全面性的总结。

我们向在沪侨商和有关人士了解，他们也认为去南洋是个办法。他们还说，殖民政府对个人入境限制很严。如：检查身份，要当地铺保或有名望的人作保，居住期限和经过地区也要由他们决定等等。但如带一个艺术团体去，则方便得多。

1. 日夜忙碌组团出国

关于解决入境和经费问题，刘廷枚表示全权负责。他一向和马来亚半岛各地侨商有商业往来，相当熟悉，对组织歌舞团出国巡演，很感兴趣，我就请他担任总务。在他积极联系之下，华侨表示欢迎。英法所属马来亚、暹罗、西贡地区由刘负责，荷属各埠由青年公司负责。

整顿、充实“歌专”人才和组团训练问题，由我负责。这个工作比较复杂。头一个困难是演员。向学生家长说明出国计划后，他们顾虑很多。有的不愿远离；有的说，南洋天气热、瘴气多，蚊子象蜻蜓，叮在身上受不了；有的还听信谣言，说南洋有抢姑娘的国王；加上部分学生也不愿去，剩下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所以必须重新组织、抓紧训练。除原有的黎明晖、刘小我、黄精勤、章锦文等外，又招了新生，增加了薛玲仙、李文云、陶醉、陶丽芬等十余人。最后介绍来的是王人美、王人艺和钱箬箬（黎莉莉），她们的境遇都很苦。如只十二三岁的王人美、王人艺兄妹，父母已双亡，其兄人路托我负责；钱箬箬的父母早年参加革命，漂泊无定，不能照顾女儿，就把她送到京剧班学戏。她受不了责打，后来进了孤儿院，更受虐待，不久又逃出来。有一位姓贺的画家将她交给了我，她们算是第四批学生。

在美美女校的近三个月中，除训练基本工外，我又一次修改并充实了以前的四套节目。因为南洋各殖民地政府对上演歌词的审查极严，每首歌都要译成当地文字并附上中文，批准后才能演唱。不要说“反帝”的字眼不能用，就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句子也一概禁止。每场演出要三个多小时，因此还必须增写一些歌曲和

舞曲。后来，参加出国演出的学生、教练、乐队约三十余人，都迁到我在法租界萨坡赛路（淡水路）二九〇号一幢住所内，进行排练。这个时期还被邀参加过几次外界团体的表演活动，曾到过宁波演出。

这个阶段很艰苦。我把自己禁闭在四楼的一间房子里，房门外加锁，与外界完全隔绝，以便集中精力和时间编写歌曲。可是有一件事不容许我不过问，那就是三十多人日支浩繁的费用。虽吃大锅饭，房租、水电、钢琴租费等等，每月不下一千元。当时我们毫无外援，仅有的收入是我的局外编辑费百余元、明晖在电影公司的工资三百元，连同我的版税，仍入不敷出。苦撑一个多月后，适有大中华公司接洽灌片收音，立即签订合同，才打开了这一经济危局。这是我们用明月音乐会名义伴奏的第二次灌片（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为中华书局灌的《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七张），因之又约了老会员严个凡、张遇羲、严工上、严折西、孙杏叔、黄继善、杨九寰和我共八人，当时号称“灌音八仙”。我们常聚会研究实验音乐与唱腔的配合。该公司选灌了《落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月明之夜》、《三蝴蝶》、《麻雀与小孩》等十余种。由黎明晖、刘小我、严醒华等主唱。那时经验不足，录音技术也差，但销路甚广，远达南洋各埠。为我们出国前又尽了一次义务宣传。

生活虽较困难，时间又紧迫，可是大家非常努力，可举几个例子：

（1）排演时间从上午八时到深夜十一、二时，租的三架钢琴，叮叮咣咣不停息，热闹得很。以至一位西籍邻人竟告到法巡捕房，说我们扰乱他们的好梦。

(2) 舞蹈教授马索夫夫人(以前是沙皇时代的侯爵夫人)曾游历欧洲各国, 精于芭蕾舞。她每星期从教学两次增加到四次, 还把练单人舞的学生带到她家去教练, 完全是尽义务。

(3) 为了使学生至少表面上要象正规的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演员, 花了不少工夫讲述国外风俗人情, 传授社交礼貌。因为有了这种派头, 到外面才吃得开。虽是额外负担, 学生兴致却很好。

不久行期确定, 一九二八年四月刘廷枚来传达华侨意见说:

“如以中国新兴歌舞剧的名义来南洋表演, 繁荣市面, 容易取得入境便利。”同时对具体办法也作了安排: 剧团全体旅行、伙食、场所一切开支, 完全由各地剧场经理人负责, 即所谓四管——管接、管送、管吃、管住。售票收入的分配, 也决定除开支外, 在英、法属地区, 刘廷枚洽妥, 由当地戏院负责, 售七成以下对半折账, 七成以上的按三七分(剧团得七成), 荷属各埠由青年公司负责, 不按成分摊, 每场付给我们场费。出国之前, 先预支三千元作治装费, 将来在收入中扣除。

大家对这些条件都很满意, 除加紧排练外还马上准备:(1) 赶制服装。(2) 添置乐器。(3) 确定团体名称为“中华歌舞团”, 使人一望而知是从中国来的, 而且保留了“歌专”的名义。广告上还加写“明月音乐会伴奏”。组织采团长制, 分工如下:

团长 黎锦晖(兼音乐指挥)

副团长 黎明晖(兼交际、演员)

秘书 黎锦皇 剧务 黎明

总务 刘廷枚 舞台设计 王人路

女演员	黎明晖	薛玲仙	刘小我
	黄精勤	章锦文	徐来
	张素贞	沈慧贞	陶醉
	陶丽芬	范山青	李文云
	王人美	钱箴箴等	
乐师兼男演员		顾梦鹤	严折西
	马陋芬	谭光友	罗静华
	黎景光	王人艺等	

组织上演的节目分为五套。因《长恨歌》服装太费事，无法排演，添上了《神仙妹妹》，又排了《小利达之死》和《小羊救母》一套新节目，《最后的胜利》作准备剧。每套二出，正好十出。每套的前半部包括歌咏、舞蹈、歌舞表演，后半部便是歌舞剧。剧有长有短，靠增减前半部节目伸缩时间，使每场演足三小时。华侨看到祖国民主革命获得进展，革命军先后收回九江、汉口两地租界，认为是极光彩的事，正希望有一个由教育界出面的歌舞团演出。当时无新的国歌，我们就练了《总理纪念歌》，以代国歌。

出国之前，田汉、郑振铎两先生还谆谆鼓励说：“这个史无前例的活动很好，希望你们为祖国争光！”我即以此临别赠言，时刻鞭策自己。

2. 一路顺风下南洋

(1) 在香港、广州 我们高举“中华歌舞团”的旗帜，于一九二八年五月间乘轮船去香港。刘廷枚已给团体安排了一家最华贵的旅馆，并决定在当地最大的戏院“香港大舞台”演出。预定

演五天，每天日夜两场。第一场给我印象至今尤深。当时我们先是采用《鹧鸪飞》的调子作前奏曲，开幕后由八个女演员穿着国产最好的雪白小纺长衣长裙上场，合唱《总理纪念歌》（节目单上有用中英文印的歌词），唱时，观众全体肃立。许多身穿大礼服的英国贵族们，在四周观众的影响下，也不得不随之站了起来，气氛非常严肃。三段唱完，恰好三分钟，观众才坐下开始欣赏节目。以后每场都是如此。在当时确实是个破天荒的事，爱国侨胞深受感动。五天演出，天天客满。澳门侨胞也闻讯赶来，英国、葡萄牙等外国观众也不少。由于侨胞盛情要求，我们又续演了三天。

在港八天，常有华侨以便宴或宵夜热情招待全体团员，观众来访也很频繁，由我和黎明、王人路、刘廷枚分头接待。来访者以教育界人士最多，他们第一句话几乎都是称颂：“你们真给祖国争了光。”有的说：“唱《总理纪念歌》，英国人也得肃立，这在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是个创举。”他们谈到节目，认为：“《春天的快乐》的音乐接近粤曲，令人感到亲切；词藻典雅、优美，成年人最欢迎。”《春天的快乐》前面有一段引子，需在台上朗诵，让观众明了剧旨和意境。钱黛黛从小生长在北京，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国语，嗓音嘹亮，口齿清楚，首次登台，即博得热烈掌声。他们还认为：“《七姊妹游花园》的服装很美，七个姊妹各出场七次，换了四十九套衣服，这种豪华的舞装使外国人亦为之叹服。歌词接近古代诗词，典雅之至，音乐有特殊风味。”

教育界人士特别重视歌舞剧与小学教育的结合问题，提出一些疑问，我也一一作了答覆，如：（a）《月明之夜》是否含有

迷信色彩？答：此剧说明中已指出：世上并无神仙，剧中所谓的神仙也感到人间快乐而向往人间，是反迷信的。其中的神仙起了和儿童文学中用来分别善恶美丑的许多神怪一样的作用。（b）剧中多采用动植物，为什么不直接用“人”？答：剧中的动植物已人格化了，这类东西是儿童最易接近的，不但感到亲切，还能丰富儿童的知识，启发儿童的幻想。（c）“中西合璧、雅俗同堂”是否混乱？答：西洋有名望的音乐家曾引用民间曲调创制乐曲。我们民族、民间的音乐也是新音乐的基础；民间曲调又是雅曲的源泉，我们只是根据剧情需要，选择适当的乐曲，使其为剧情服务，因此不会混乱。

香港演出的消息，当地和广州报纸都有报导。广州的绅商各界要求我们回广州公演。因此又到广州的永汉大戏院演出。第一天晚上不售票，招待军政绅商教育各界知名人士，第二天开始公演，演了四天八场，场场客满。歌舞剧在广州并不陌生，很多人看过小学生的表演，但我们的演技、服装、音乐以及舞台、灯光等方面，要比小学生的高明多了，因之受到市民欢迎。尤其是《最后的胜利》新剧，观众看了情绪很高。广州有一位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姓陈，是个开明绅士，他破例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团员，请了不少陪客。席间，我致意希望对演出的节目多提供些意见，免得在国外有辱祖国荣誉。他们认为这种新兴歌舞剧拿得出去，不过《最后的胜利》，最好不要上演，这会影响到剧团的存亡。

广州演罢仍到香港候船，团员们游历了两天，在两地公演后，经济上比较宽裕，大家分头置备了一些衣物，以壮行色。这时，黎明、王人路接到第三党成员的来信，要他们回上海去安置避难者。于是剧务由我兼，舞台设计不变动，也不再添人主管。

(2) 在马来亚各埠 中华歌舞团由港搭船去新加坡，这是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一个大都市，华侨很多。入境一向限制严密，检查非常麻烦。因我们是以教育界艺术团体名义出现的，当地政府教育司派了一位高级官员前来接待，减免了检查手续，每人仅打一次防疫针，就顺利地上了岸。

我们在当地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大钟楼戏院演出十天，售座很盛，所演节目^①基本上与香港相同。

在南洋巡演中，主要演员是黎明暉，薛玲仙等几人，王人美、钱筑筑仍在训练阶段，有时也担任配角。

新加坡演罢便到吉隆坡、怡保、槟榔屿，然后乘火车直达盘谷（曼谷）。

(3) 在暹罗的盘谷 盘谷是暹罗（泰国）的首都，当时是英属国，也是华侨集中点之一。当地艺术界为了表示欢迎，还特地举行一次歌舞观摩表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扇子舞，相当精彩，音乐也别有风味，后来我们曾加以吸取。我们在盘谷共演了十天。

我们每到较大的城市，那也是华侨最多的地方，必然与教育界人士接触，听听他们对演出的意见，同时了解华侨教育情况。可是到了这里，见不到一个教员，只好自己去找。有一天和两个团员在马路发现一家有中国字招牌的饭馆。和老板一谈，才知道他是广东人。据他告诉我们，有华侨办的学校，并给我们指点方向。走来走去，我迷了路，忽又发现路旁有个中国孩子，我喊了一声“小朋友”，他居然听得懂，把我们引到了那所学校。校名很特别，挂着“黄魂学校”的牌子，不知指的是黄帝的灵魂还是黄花岗烈士的灵魂。见到校长和教员，他们竟是“语专”的

^① 节目单保存在中国音乐学院。

学员，分外亲切。他们以茶话会热情接待我们，我还谨慎地讲了几句话。据校长说：“暹罗政府对华侨的文化教育和活动，控制甚严。对出版物和课本进行审查自不必说，就是对个人行动，也暗中进行监视。所以知道你们来了，我们也不敢拜访。”又说：

“当局也很注意你们，下次千万别来，以后我们将派女眷回访，以避耳目。”我一听气氛那么紧张，不便久留，匆匆离去。演出到最后一天，也不见他们人来。结果等来的是政府的官员，他们调查去“黄魂”的事，我支吾其词地说与校长是亲戚，见面谈些家事，才算敷衍过去。

歌舞剧深受侨胞欢迎，本来可续演两天，终以精神压力太大，到期就转往马六甲了。出人意料之外，马六甲英政府竟设宴为我们举行招待会，这是在南洋仅有的特殊礼遇，原因不明。演完又去峇（巴）里峇达。按照巡演旅程，至此已是英属地最末的一个据点，以后就要转入荷属境内，但这儿没有航线，必须回到新加坡搭船。

（4）在荷属各埠 巴达维亚（雅加达）是荷属南洋群岛爪哇的首府。一路演来，甚至在盘谷那样严审剧目的城市，《总理纪念歌》都能照唱，可是这里以及三宝瓏、泗水、井里汶、茂物、万隆、玛榔、苏甲乌眉共八个大小城市，一概禁唱。好在精神上感到宽慰的是，所经各地，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由于航线关系，从苏甲乌眉又回到巴达维亚，华侨要求重演三天。记得最后一天正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大家想庆祝一番，与戏院老板商量，把没经送审的《最后的胜利》演一天，好在演完就走，因为团员已买到英国船票，一致同意冒这个险。这天卖出四场票，半价发售，全部客满。每场观众掌声不绝，似极

兴奋。卸装后，老板为了祝贺成功，特在家中设宴为我们饯行。他打开银箱得意地说：“你看！钱都装满了，售座之盛，真是空前。”可见他如何的高兴了。这倒又是一个例外，《总理纪念歌》不准唱，而各地都不能上演的戏却在此连演四场。因无人告密，事后荷政府毫无所知。可以想见华侨之爱国情绪。

从巴城乘船再到几个大岛去表演，先至班各的文岛等四个城市，接着到苏门答腊的棉兰等四商埠。全程演毕，第三次折返巴城。全部巡演路线，至此完全结束，这时已是一九二九年的二月。我们准备从这里回国。

（5）人各有志各奔前程 我们这个团体几乎跑遍了南洋群岛各大中城市，许多女孩子思乡心切，急欲回家。她们没有嗜好，积蓄不少当地银币，购备了很多衣物，可谓满载而归；少数团员在巡演中找到了工作，也有个别人另有野心，想趁回国机会把她们拉拢过去，另组歌舞团。他们听到部分华侨说什么“华侨爱听西洋歌、侨生情歌和粤闽小调，如果加上魔术和机关布景，一定更受欢迎。”等等，受了金钱的诱惑，他们希望团体早日解散，自组班底，重来淘金。

由于以上的复杂思想情况，当时要保持原团回国已不可能，所以决定解散。黎景光、章锦文已受聘在巴达维亚的学校担任音乐、舞蹈教员；罗静华留在华侨所办的报馆工作。我因国内威胁未除，暂不能归，准备去新加坡，徐来同行，明晖有了朋友^①；

^① 我们在香港表演时，有一位十八岁的中学生，过去他父亲是马来亚太平府国王，他的二太子名叫郑国有。为了追求明晖，一直自费随团经历各埠，从未离开。后来他家庭不赞成他和歌舞女郎结婚，断绝经济，所以他也与我们同住。直到我们回国的前夕，他的母亲才派人把他和蔡明晖接回香港。

王人艺、钱箴箴无家可归，他们都随我留在新加坡，其余团员回国。我建议回国团员，仍以中华歌舞团名义，沿西贡、堤岸、香港，边演边返上海，然后解散。

3. 创作“家庭爱情歌曲”百首

当初出国的目的，主要是打算积款恢复“歌专”，结果落了空。大部分团员有了私蓄，可是没有为团体储备些资金，以至解体。我个人仍不能归国，黎明来信说：“第三党处境险恶，特别是那个国民党党棍‘黄秘书长’旧恨未了，不会罢休，此时回国仍不相宜。”

黎明晖、徐来、钱箴箴、郑国有、王人艺和我六人集居一起，也有问题。新加坡有一华侨当户籍警，他告诉我们：“照殖民政府的法律，与两个外姓的少女同住在一起，会被误认贩卖人口，那就麻烦了。”于是钱箴箴自己改名为黎莉莉，做了我的女儿，徐来算是我的太太（同居未婚），郑国有是我的女婿，便登记在雪兰莪路的户口簿上，凑成了一个家庭。我请了一位菲律宾籍的音乐教师教王人艺小提琴，同时教莉莉英文

这时上海方面的朋友，开始把《毛毛雨》等六首歌曲正式发行，每一单张卖二角，暴利十倍于印本。他们函促我暂住南洋，写爱情歌百首，保证稿子一到上海，回国川资、“歌专”经费立可解决。我想自己写了大量儿童歌曲，费尽心血，而且是规规矩矩相当谨慎，可是还有一部分人说我的作品是：“下里巴人，玷污学府，村歌小调，遗害儿童”，还说我是“旁门左道，不是正宗”。但全国广大的教师和儿童使用已八年之久，并无任何害处。所以我认为骂我的人到底对不对，还难肯定，现在写写爱情

歌曲，又有何妨？于是决定接受上海朋友的建议，开始大量写作爱情歌曲。

我四岁上学，第一部书就是《诗经》，开卷第一章诗，就是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诗，下学时，唱的是“小小仔，想媳妇”的童谣。少年开始阅读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西厢、红楼、聊斋等旧小说，内容体会不深，但对文章词藻十分欣赏。直到青年时代，才把这些诗经、词曲、小说的内容弄清楚。但那时已在中学修业，由于阅读了《民报》、《新民丛报》等新书报，思想倾向爱国和民主革命运动，也没有为那些旧东西所陶醉。后来搜集民间音乐，对戏曲、鼓书、民谣、小调等歌词，我也认为粗糙庸俗，甚至猥亵不堪，实在没有麻醉人的力量。因此以为音乐、歌唱与国家兴亡以及个人品格好坏关系不大，只要在写歌的时候，能革旧更新，自无妨害。所以订出十条作为写新歌的准则：（1）妓女唱的不写；（2）“后花园赠金”之类的不写；（3）相思病的不写；（4）爱情悲剧不写；（5）为三角恋爱而情杀的不写；（6）“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7）用阴谋手段取得爱情的不写；（8）猥亵的不写；（9）对金钱权势的爱情予以讽刺；（10）对一见倾心的儿戏爱情也加以讽刺。

本着这个方针写下去，写得多了有的也超出了这个约束。

本来我是领团出来巡演的，根本没想到要编写大量歌曲，所以手头上没有一点儿材料。写到后来，象挤牙膏一样挤出来，不论古今中外各家诗词、西洋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以及南洋一带唱的西洋小曲、爱情歌等，一古脑儿搬来作为我的创作素材，但决不照抄。有的改头换面，有的脱胎换骨，或取其一点加以夸张、扩充。至于编曲写词，既称爱情歌，就以抒发感情为

主，还须符合中国情调，并选用浅近而美丽的歌句，曲词结合紧密，唱出来，使人人能懂，人人爱听，自以为是“新型的爱情歌曲”。当时也有人称为“流行歌曲”。这里也举几个例加以说明：（1）《小小茉莉》是改写英国的一位诗人的作品《Little Merli》而成；（2）《夜深深》是改写胡适译的美国民歌《小吉梅》而成；（3）《特别快车》是讽刺乱谈恋爱、放纵乱爱的，结果，适得其反；（4）《桃花江》歌词中“我也不爱瘦，我也不爱肥，我要爱一位，象你这样美”之句，是摹仿古代宋玉写的诗句造意；至于“我一看见你，灵魂天上飘。”是采《西厢记》张生的话：“灵魂儿飞去半天”之意。

写成的歌曲，一批一批地寄往上海，由各书局大量发售，果然风行，一版再版。写作时间共八个月，除发表费外，还收到预支版税。

百首完成后，接黎明来信，告诉我那个对头“黄秘书长”因犯案去职。威胁已除，于是整顿行装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和徐来、黎莉莉、王人艺乘轮返国，黎明晖和郑国有仍留在香港。我一到上海，便准备重整旗鼓恢复歌舞团。

（三）明月歌舞团

1. 从头再起北上组团

一九二九年冬我回到上海，与徐来结了婚。施高塔路（武进路）恒盛里有两幢房子，一幢我住，又将散居在旅馆的第三党朋友庄明远、丘我华（新民）等多人迁入另一幢。这房子的前门是公共租界，后门通华界，地跨“两界边缘”，行止相当灵活，开支也可节省。几个人凑在一起，办了一张四开的周刊名《善有善

报》，秘密印刷发行，目的是打击当时乌烟瘴气的上海各小报、讽刺新旧军阀、大小流氓。这次奇袭，确使对手们慌乱了一阵，及至他们发现阵地，我们即收了兵（发行至十三期就停刊了）。

黎明曾用我的稿费数百元，在北四川路开了一间“明月音乐书店”^①作为第三党在沪联络站。这倒是最早的音乐专业书店，发售歌谱、唱片、民族乐器之类，营业利润，我从未过问，据说仅敷开销。

我个人的打算是尽快恢复歌舞团。也曾考虑再办专校，而开办费、经营费太大，不是我的经济力量所能办到的。与黎明一核计，不如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歌舞团，边训练，边演出，少贴点钱，我还能撑得下去。为了与“明月音乐会”的名称统一起来，定名为：“明月歌舞团”。当时旧伙伴多已星散，身边只有徐来、黎莉莉、王人艺三人，幸而薛玲仙、王人美也表示愿意归来，于是有了几个基本演员。这时有同乡张其琴、张其瑟兄弟俩，突然从湖南来沪避难，他们因在本乡领导农民起义，“马日事变”后被通缉。他们能演奏一些民族乐器，正好留下来，继来参加的还有严折西、谭光友和七弟黎景光。他们都是“中华”团友，于是乐队基本上可以凑成了。

问题在班底，薛玲仙、徐来歌舞根底浅，黎莉莉、王人美入校晚，都没有受过严格的基本训练。在南洋忙于演出，亦无暇补练底子功，这次勉励她们加速练声习舞，补课进修。她们下决心

^① 书店由第三党张听若、魏也娜夫妇主持，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第三党人分化离散，失去联络。次年书店迁至爱多亚路（延安东路），即脱离政治关系。

勤学苦练，进步惊人。例如：黎莉莉努力学舞蹈，有时伴奏的人嫌次数多了，不够耐心，她就自放唱片练芭蕾舞，其中天鹅舞竟练到千遍之多。她以坚强的毅力终于掌握了比较高的技巧；王人美对音乐有特殊才能，练琴习唱，进步很快，且富于表情；王人艺学小提琴刻苦用功，意志坚强，每天练足八小时，从不间断。有一次患疟疾，冷得要盖四床被子，仍顽强地爬起来，浑身发抖拉着提琴。劝他休息，还不肯放手。以上几个人，后来都成了我们二次组团的主要演员兼教练员。事务、交际方面，分由四弟黎明和二妹锦皇担任。

在研讨招生训练问题时，我主张把这一工作移到北平去，因为那样可以缩短训练国语时间，生活方面也可节省些，就这样作了决定。一九三〇年初，我们乘“奉天号”去天津转北平。在船上想不到遭到一个“稽查老爷”的留难，他说：“海关外国大班的命令，要你们找保。”这真是怪事，黎明反问：“我们坐的是中国船，走的是中国海，外国人凭什么要保呢？”争执一番，他实在无法回答，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北平，住在东城栖凤楼十九号，这里是幼时同学张裕笙夫人所办的幼稚园。我租下一部分房屋做为团址，开始招生。经介绍吸收了胡笳、张静姝（张静）等二十余人入团。这次招生要求较高，每人必须有些特点，才能录取。如王韵清外表清秀、嗓音甜润，表情较好，虽然唱时板不准，就让她在表情上发挥特长；张裕笙的长子张少甫是北平师范大学数理系三年级生，深爱音乐，要求参加，我认为毕业在即，劝他继续完成学业。他说：“毕业即失业，我还是早点学音乐好。”入团后改名“张簧”，先学二胡，继学大提琴和作曲。他为人忠厚纯朴。十八年来，我



1929年明月社成立后在北平东单栖凤楼合影
 前排左起：王润琴、黎锦晖、黎莉莉、王人美、胡笳
 后排左起：张兹、谭光友、温如一、张其器、王人艺、张其琴、
 张策、严折西、黎锦光



1931年联华歌舞班在上海爱文义路1280号合影
 前排左起：胡笳、王人美、陈倩、杨枝露
 二排左起：知乐、黎莉莉
 后排左起：白虹、于立群、韩国美、万美君、英茵、张静、魏也娜

俩从没有分离，成了知己朋友；温一如过去是阎系军阀的少将军官，也经常来团，参加练习和表演；裕笙的次子张弦也参加了乐队。歌舞由薛玲仙、王人美、黎莉莉助教，相当认真。练的差不多都是旧节目，单纯的舞蹈尽量减少，所以教练比较容易熟习。教练期间的开支，取诸为首歌曲的稿费和大中华唱片的版税，数额有限，不得不抓紧排练，争取早日演出。

2. 平津、东北巡演

四月中旬，清华大学举行联欢会两天，特约我们参加表演。我们准备了两出歌舞剧，这是专业化的歌舞团首次与北方人士见面。同时，有熊佛西先生领导的“北师”话剧组参加。张贴的节目单上话剧在前，歌舞剧在后。“北师”提出话剧应演大轴戏，我们请求校方把那张大节目单一分为二，前后对调，我们来演开锣戏。

上演时，可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窗口也挤满了人。开幕前，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今天我们演唱的《三蝴蝶》，原是儿童演给儿童看的，现在由成人来演，力求适应成人的欣赏兴趣，大家看到缺点，希望多多指教。幕前曲，用中西乐器合奏《湘江浪》，技巧比在南洋时稍有提高，博得满堂掌声。演唱时，台下鸦雀无声，表演结束，掌声如雷，谢幕多次。

王人美、黎莉莉第一次担任主角，获得成功。《三蝴蝶》扮演者是：

红蝶王人美、白蝶黎莉莉、黄蝶赵晓镜、红菊王宝金、白菊胡笳、黄菊王韵清、风安雅琴、云于淑雯、雨薛玲仙、雷张静姝、电于秀霞、太阳王宝筠。演出时休息十分钟后，“北师”接演话

剧，可能独幕剧太长了，或清华的同学早已看过，启幕时场内观众所剩无几，散场时只有几个人，弄得气氛有些尴尬。

第二天晚上，“北师”话剧组换了个剧，并要求先上演，我们同意居后。上半

场观众不多，演到中途，发生观众催请下台，秩序不能维持，“北师”话剧组更是恼火。等他们刚演完，在休息十分钟时观众涌进会场，较昨晚尤多。“北师”话剧组有人气极了，在后台大受攻击。我们在南方经常遇到这种磨擦，力劝团员忍耐。此外，既无法安慰他们，更不能代表观众向他们道歉，只好付之一笑。我们在掌声中演出了《春天的快乐》。这次阵容是：

忧愁公主薛玲仙、桃花胡笳、李花王宝金、蜜蜂赵晓镜、蝴蝶王人美、黄莺黎莉莉、燕子王韵清、姊于秀霞、弟王宝筠。

这次表演后，北平的大小报纸，出现了几篇介绍和赞扬我们的文章，各校纷纷来函约请，先后应协和、清华、汇文、盐务等校之约，每次演出均得好评，记得在清华再度参加演出的《小小画家》登场人物是：

小画家王人美、女友黎莉莉、母亲赵晓镜、塾师甲黎景光、乙谭光友、丙温一如、邻孩甲于淑雯、乙于秀霞、丙周贵英。

五月上旬正式在北平真光大戏院公演三天，售座很好。接着又在西区哈尔飞大戏院续演三天。五月十六一十八日应“安琪儿画报社”之邀，到天津皇宫大戏院上演。当地春和戏院经理高士



一九二九年黎锦晖与王人美（右）
黎莉莉（左）摄于栖凤楼前

折看了剧又约续演。春和女领票员严斐、京剧旦角严华，坚决要求参加歌舞团。在学校演出也有类似情况，但从来没有接收。

在公演中除歌舞剧外，上半场还演唱我编的歌舞表演曲和独唱、齐唱等节目，以演足三小时。

(1) 歌舞表演曲

a、《可怜的秋香》（独唱王人美、舞蹈——幼年王韵清、中年胡笳、老年黎莉莉。）

b、《寒衣曲》（王宝金、王韵清）

c、《桃花江》（黎莉莉、王人美）

d、《春深了》（赵晓镜、胡笳等）

e、《蝴蝶姑娘》（王人美、黎莉莉）

f、《真假姑娘》（王人美、黎莉莉）

(2) 独唱：《人面桃花》、《峨眉月》、《落花流水》（薛玲仙唱）；《爱的花》、《卖花词》（王人美唱）；《休息五分钟》、《小妹妹的心》（黎莉莉唱）；《甜蜜的梦》（胡笳唱）、《长记得》（赵晓镜唱）；《寄给我的父亲》（王韵清唱）；《因为你》（黎莉莉、胡笳、赵晓镜等唱）。

(3) 齐唱：各种爱国歌曲（全体）。

黎莉莉的天鹅舞也在平津上演。当时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胡笳，被称为四大金刚。

在平津地区，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压力，这与温一如向军政界作了介绍和联络大有关系。我的父母寄居北平，一九三〇年正逢六十双寿，八个儿子、三个女儿破天荒齐集一起举行祝寿盛会。温一如把我们素不相识的北平市长张荫梧、警备司令李服膺及卫戍司令某某等邀来参与宴会。这次宴会后，张荫梧介绍美商

胜利唱片公司收灌歌曲唱片，黎明选录了《桃花江》、《舞伴之歌》和《特别快车》三支歌，后竟大为畅销。在北平期间，爱情歌曲百首稿费逐渐收齐，大中华、中华书局版税以及胜利公司收音费数额不少。除团体开支外，我个人的生活也很优裕：新租了离团不远的东观音寺洋房一幢，和父母、徐来、莉莉同住，特聘曾在王府中做过厨师的人承办伙食，平日菜金就要五元，有客时还须另外加菜。往来的朋友，以知识分子为多，至于军阀政客，则很少。

我带团在天津“皇宫”和“春和”戏院演出，看着场场客满，然而摊出票根，竟不到七成座。后来才知受了商人的愚弄，玩了个“票处有票”的把戏，所以仅够开支，算是白替戏院老板服务。正在这时，从大连来了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找我，联系邀歌舞团到大连公演，旅膳费由日本报社负担，售票收入，提出三成作宣传费，其余完全归团。所谈条件优厚，我们就欣然接受了。一到大连，《满洲日报社》就招待全团到新竹浦游览，并在抚顺日本女校以中国菜举行宴会，该报还用整版篇幅刊载文章、照片大事宣传。演出第二天，东京戏剧界多人乘飞机来观摩。

到了沈阳，于凤至（张学良夫人）派人前来转达她的意见：为了救济辽河两岸水灾灾民，希望我们演两天义务戏，如有困难，至少演一天。我一听是赈灾，立即答应演出两天，不但四场戏的全部收入，我们分文不取，而且一切开支完全自理。我想，此举既可借赈灾进行宣传，又可获得当地军政界的好感，对以后的公演大有好处。于是决定在落成未久、设备很新、可容一千五百人的沈阳大戏院上演。票价每张十元（平时最高二元），演出时，汽车衔接数里，沈阳的官绅大概全到齐了。戏院经理罗明管

说：“我们这个戏院，不管演什么戏，都不能超出五成座，你们来，打破了纪录。”他也免去一切租费和照明费，可谓涓滴归公，是否真用到灾民身上，那就知道了。事后，于凤至用赈灾会名义在报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公开的慰问信，表示感谢。

从第三天起接着公演，沈阳附近城市都有人赶来看戏，有的场场不缺席，我们赚了不少钱，大大超出预期的估计。锦耀高兴极了，拿着这份合同赶到长春与一家戏院照抄订约。我看到对外一切顺利，内部也很能团结，此时徐来快要分娩，我就陪她回到北平。他们在长春演了四天，锦耀又匆匆去哈尔滨洽订合约。

在哈尔滨，世故不深的锦耀可出了岔子。订约的是停业一年多的旧戏院，演期十天，要求我们重修门面。更上当的是这儿的戏院有惯例：“买一张票，看一天戏。”就象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一样。歌舞团到来，一时轰动，门票顷刻即尽。观众大都带饭进场，节目演完，台下大鼓其掌催请接演，而剧团只有一个，只好再上场，场场相连，节目虽相同，百看亦不厌。演员疲于奔命，声嘶力竭，饭也顾不上吃，观众仍不罢休。与戏院交涉，可是那个姓苗的经理是当地的流氓，蛮不讲理，定要演足十天，结果因收入有限，广告、食用开支浩大，把在沈阳等地节余的钱，全部垫光，一算账还欠戏院一千余元，最后只得把锦耀作人质，押在戏院，其余团员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回到北平，等我筹款汇去，才把锦耀赎出来。天津的教训没有吸取，又上了哈尔滨奸商的大当，竟惨败到如此地步。锦耀是明月音乐会会员，原在萍乡、大冶等地矿场任职。他认为歌舞团的生活象“天堂”，采矿的生活象“地狱”，于参加庆寿来京时，便请假参加剧团工作，这次东北之行，尝到了苦头，愤然回汉阳去了。

回国组团、公演遇骗，我的资金消耗已尽，但四十多个团员的生活，我不能不管。为求生存，我于一九三〇年底独自重返上海，接洽业务，另谋出路。

3.大量灌制歌曲唱片，致使黄色音乐泛滥

在北方巡演期间，迭接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王寿岑来信，他要求将我编的歌舞剧和表演曲，由他们独家灌成唱片，我于是特地回到上海和他研究灌片问题。

王寿岑之所以提出大量灌片，是因为前年灌过的十几张，销路很好，胜利公司灌的三张爱情歌曲唱片，又大为风行，并远销日本。商人见有利可图，所以一再来信要求签约。在前次灌片之后，我发觉所谓“大中华”原是日商，深感懊悔。对此，王寿岑曾有解释，说明后来已由上海十二个中国资本家将全部日股购进，改组为完全华商经营，仅留一部分日籍技术员，系雇用性质。他为了表示诚意，将该公司大量华股证件摊出，还约了几个大股东与我接谈，真相搞清，双方即迅速商定条件和灌片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点：

(1)灌片数近百张。其中有《三蝴蝶》、《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又名《觉悟少年》）等十个歌舞剧。并选灌歌舞表演曲和家庭爱情歌曲（即黄色歌曲）；

(2)期限半年。工作包括团员分段演唱的训练和公司录音技术的改进；

(3)灌片费每面二十五元，一次付清，发行权税（即版税）是批价的百分之十，先预付一部分作团员旅费，以后扣除；

(4)团员食住，由公司负责解决；

(5)未得“大中华”同意，歌舞团不得再与其他公司灌片。

基本问题确定后，王寿岑要我立刻签订合同，我认为需要回平推选代表共同签字。他对我这个歌舞团负责人——等于老板，竟不能负责签字，感到奇怪。我说明了组织团体的目的与戏班不同。他献策说：“无条件训练学生，一旦学成，随时可走，这太不保险。应吸取过去教训，规定学习期两年，学满须为团服务五年，如能这样，你的团和你个人的利益才有保障。”我谢谢他一片“好心”，可是我不是商人，过去对团友没有立过什么合同，今后也不想这么做。

我再到北平，由团友推定王人美（歌唱）、张其琴（音乐）和我（作曲）三人为代表签订合同。在北方训练的学生一部分不愿南来，只好听便。我与徐来、黎莉莉先行，王人美、张其琴、薛玲仙、胡笳、王人艺、张簧、张炫、张静姝等八人由黎明安排启程。经大中华公司租定典当路（海兴路）一一〇弄长沙商栈二楼供我们排练和住宿，这里可容四十人。后来由黎景光、严折西，并托赵晓镜之兄赵振协助，在北平又招到许曼莉、白丽珠（白虹）、于思歌、于思咏（黎明健）、杨枝露（路曦）、严励、薛陶、董西娜、李红等十余人。北籍团员南来，忽为新任市长袁良所阻，后经化整为零，分批到沪。

自一九三一年初开始，加紧分组训练，生活无忧，人人温饱，身心健乐，进步自然很快，旧团员分配了灌片任务，各有精益求精之志；新团员也努力追赶，打算争取在公演时担任要角。

从舞台走进录音室，集中一次灌片百张，促使我和团员重视训练。灌片并不因减去舞蹈动作而轻松，在台上唱错或走板，下次可纠正，唱片录上音，就无法更改了。首先把过去我们灌的片

子，反复放给大家听，检查缺点，发现问题不少，主要是：音调圆滑有余而坚实不足；发音部位不够正确，且轻飘无力，行腔不熟练；感情太平淡。针对这些问题，抓紧分组苦练；要求字正、腔圆、板准，演唱感情丰富，伴奏恰如其分。

据据以上五点要求，每歌从头练起。上下午各三小时，练习演唱伴奏，晚上两小时，朗读报纸，早晚还须练口型发音。新生同时参加，历时一个多月。

接着正式录音，按照办公时间，每天到大连湾路大中华唱片厂灌片。我弹钢琴指挥，以明月音乐会名义伴奏。试听样片也较过去认真，不满意，必重改。分三批收录，不断改进，逐渐提高。终以录音设备和技术较差，制成唱片后，有的带有“嗡嗡”之声，未免美中不足。录音进度很快，我们提前完成。

录音消息传出后，各外商唱片公司纷纷派人与我联系，如美商胜利公司经理英人路易斯，表示也要灌片数十张，并可提前三个月结算付费。如按照合同规定，不得到大中华同意，是不能与其他唱片公司签约的，但是，“大中华”本身的缺点无法克服，无权硬性阻止，经多次交涉，我们还是和各公司先后订立合同，继续大量灌制，并且一处胜过一处。“胜利”比“大中华”的好，而“高亭”又比“胜利”的好。

就在这次大量灌制之后，所谓“家庭爱情歌曲”的黄色唱片，便开始泛滥了。

(四) 联华歌舞班

联华影业公司经理罗明佑想把“明月”的全部团员吸收过去，组成歌舞班。我想到团体的前途，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

团员也感到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全体赞成。

一九三一年五月，罗明佑、朱石麟约全体团员到新雅饭店晚餐，席间，罗对我说：“虹口奥地安大戏院（“八·一三”战时被炸毁）明晚没有戏上演，很多朋友都想看看你们的歌舞剧，演两小时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场集体的考试，当然同意。我建议演一出集锦式歌舞剧，临时定名为《公园》^①。剧情是：一个青年在苦闷中，邻家女郎邀他散步。在公园内，他看到处处都有欢快激昂的歌舞，他的情绪振作起来了。“剧情简单，仅把我们十几套熟练的歌舞，串成一气。穿上舞衣便是演员，加上外衣便是游客，场面上还热闹。当夜排练了一个通宵，第二夜演出更加娴熟，观众称许，报上赞扬，联华老板满意，不久便订好集体合同。后来，有人说我一夜之间编好并排练成一出大型歌舞剧，这是捏造的神话。

一九三一年六月，联华公司照合同拨出一年开办费，租下爱文义路（北京西路）一二九八号整幢房子，置备了应用家具，联华歌舞班就正式成立了。从一九二五年黎明晖十二岁开始拍片，我也写过两部剧本，与电影界接触多年，到这时我才算是正式参加电影厂的工作。

歌舞班的组织采主任制，我担任主任，负责管理和音乐指挥，下设艺术组、音乐组，分由黎景光、王人艺负责；王人美、黎莉莉、严折西、谭光友等分别为演员、乐师；在北平最后招来的许曼丽、白丽珠等十余人为练习生。这时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

^① 原定名《公园春晓》，第二天发现宣传品误印为《公园春宵》，音乐是朝气蓬勃，剧名却死气沉沉，索兴锯去木戳的“春宵”二字，留下《公园》。

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一个十二岁的孤女周小红。我觉得小红这名字不雅，那时正在“一·二八”后，抗战期间，我写《民族之光》一剧的歌词中有“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一句，于是为小红改名“周旋”。她正式当了电影演员又改成“周璇”。这时，于思咏的父亲经过上海，约我到“知味观”吃饭，说明他的家族反对他女儿学歌舞，他愿成全女儿的志愿，但必须改名换姓，过继给我，并且书面委托我担负父亲的责任，主张改名为“黎明健”。

在班里，我们开始有了正规的待遇，全体一律由公司供给膳宿，演员、乐师分等级支給工资，练习生月薪都是十五元。并规定，拍的片子成绩好，受观众欢迎的练习生，随时可提升为演员与公司直接订合同。这个鼓励起了一定的作用，她们在班中生活严肃，遵守纪律，积极锻炼，希望争取当上“电影明星”。

我的工作计划是：一方面加工排演《春天的快乐》、《小小画家》、《小利达之死》几个旧剧，并督促演员努力学练芭蕾舞；另一方面，排练黎景光新编的成人剧《野玫瑰》和《民族之光》^①，同时为公司拍摄了上海还不曾有过的《娘子军》、《吹泡泡》、《舞伴之歌》、《小小画眉鸟》，四个彩色歌舞有声短片。后来听说摄录技术欠佳，始终没有演出。

是年底，公司希望派歌舞班赴南京公演，由孙瑜领队。以前我们同人组织，凡收入节余，按南洋办法，照级别分场费，这次由联华公司主办，大家提出：不问营业情况，都要付场费，基本

^① 《民族之光》不准上演。其中我作的歌词曾录有唱片，以后也遭到日本通知租界禁唱。

数亦须提高。几经磋商，公司才接受。这一次交涉，双方的感情颇受影响，使公司方面产生停办歌舞班的念头。

在南京世界大戏院上演的都是几出旧剧，曾试演《小利达之死》，很受观众欢迎。此剧由王人美（剧中孙儿）、薛玲仙（剧中祖母）、黎莉莉（剧中大毛）演出。我因正在赶写成人歌舞剧，没有随行。演罢归来，据说此行成绩甚好。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日寇炮火烧到上海。国难当前，联华股东主张紧缩机构，借此为因，决定停办歌舞班，发了三个月遣散费。经我要求把公司制成的、约值二千元服装，也移交给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联华歌舞班。

四、后期（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一）明月歌舞剧社

名义上联华歌舞班被遣散了，实际上全部班底一个不缺，原封不动地重新组织起来。大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团体维持下去，改名为“明月歌舞剧社”。当时歌舞团既多且滥，废“团”改“社”，以示区别。在联华打好了一年的基础，团体得到了全面发展，阵容比较强。女演员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章锦文、英茵、张静姝（张静）、黎明健、白丽珠（白虹）、杨枝露（路曦）、万美君（万山青）、严斐、韩树桂（韩国美）、周璇、于知乐、于秀文、李红、许曼丽、欧阳飞莉、陈情（红樱）、胡秋萍（胡枫）等；男演员兼乐师有：严折西、谭光友、黎景光、王人艺、张簧、张炫、张其琴、张其瑟、严华、罗静

华、张昕若、聂耳、严励、江涛、许赞成、黄鸿儒、李果等。共四十余人，此时莉莉的弟弟钱镗（现名钱江，为摄影师）及母亲张振华，也加入了。

既是自愿、集体组织，就成立了“社务委员会”，由我、黎景光、张簧、张絃、王人美、王人艺、黎莉莉、聂耳等九人担任委员，推张昕若为会计。大家商定：待遇一律平等，吃大锅饭，每人每月支零用三元。为了节约开支，迁出联华宿舍，找到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内一幢房子。据说：这所屋子闹“鬼”，空关了两年多没人住，积尘很厚，在房东派人初步打扫之后，聂耳又邀集几个社员进行了洗刷，房子焕然一新。

1. 江南巡演败兴而归

谈到剧社的前途问题，因国内各地都不安定，社员主张再去南洋巡演，有机会到欧洲去一趟。我认为：我们的艺术不够成熟，到南洋演老一套，毫无把握，何况一时也没有人事关系；去欧洲更是冒险，不如老老实实排些新的节目，稳步地去国内较大城市巡演，或可维持下去。大家觉得这个计划，比较谨慎。除商洽在上海中型戏院演出外，并联系跑码头，准备到江南、华中一带巡演。我因准备写作一批歌曲供给胜利等公司收片，没有随行。关于巡演情况，王人艺曾写过如下一段回忆。

一九三二年五月初我们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镇江各演了几天，然后到南京，最后抵汉口。节目部分是旧的，但也准备了几出新的节目：歌舞剧有：《剑锋之下》（一部分）、《野玫瑰》、《小利达之死》、《小小画家》、《三蝴蝶》、《小羊救母》；歌舞有：《破浪舞》、《夜花园》。再配合其他歌舞，排

就了四套节目。

苏州、镇江演期很短。到了南京，仍在世界大戏院演出。由于王人路在《中央日报》工作，新闻界大为捧场。观众不少。不料戏院秩序很坏，上演十天，几乎每天闹事。因国民党“丘八”十分跋扈，他们进院抢座（当时不对号），动辄殴打观众，有的甚至拔枪示威，弄得乌烟瘴气，跟着大批警、宪拥进，原来他们也是来看白戏的。座客虽常满，买票的不多，演期结束，还欠了戏院一笔债，商妥容后偿还。

到了汉口，长江大戏院招待新闻界和我们。会上一个记者官派十足地说：“先唱一段让我们听听。”简直把我们社员当作出演“堂会”的。景光还是平心静气地解释：“今天没带乐器，明天请到‘长江’看戏，并请指教。”那位记者站起来说：“不唱，我们就走，不吃了。”戏院老板赶紧打招呼，倒激起一位姓沙的记者不平，他说：“我们是为了吃才来的吗？”想跟着走的人才稳定下来。老板还是搬来风琴，要求我们息事宁人，不得已，我们唱了几个曲子才算了事。举此一端，可以概见当时艺人的处境地位。

戏院老板名叫陈立夫，是当地一个大流氓。合同订明收入按三七分配（我们七成），等演期结束，他竟以“生意不好”而赖付一千余元的场费。这时冒出几个自称“和事佬”的人来调解，我们一减再减，终拿不到分文，可是“和事佬”反伸手来要调解费了。

我在上海知道了社员被流氓赖债的事，立即打电报促社员即日离开汉口，留一人索款，免蹈哈尔滨时愈陷愈深的覆辙。张其琴在汉苦等了一个多月，空手而回。社员辛辛苦苦地冒暑演了几

十场戏，血汗钱装满了流氓的腰包。会计张昕若竟趁火打劫，了目不清，还说衣服被盗，要求赔款，他回到上海，就被社员撵走了。

2.内部分裂社员散伙

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与我社接洽，拍摄彩色有声长歌舞片《芭蕉叶上诗》，一九三二年七月签订了合同并开始拍片。社里推王人艺兼会计，据他回忆：“此片由李萍倩任导演，黎景光任副导演，黄鸿儒任剧务，演员有王人美、黎莉莉、韩树桂、严华、谭光友、杨枝露等；音乐由严折西、张簧、聂耳、王人艺等担任。此片名义上有正副导演，实际上由天一公司总经理邵醉翁亲自监制，他根据自己的喜爱调动乐器，录音时，把喜听的乐器放得近些，不喜欢的挪远些，灯光、镜头、演技处理，样样都管，正副导演只好袖手旁观。有些歌舞剧在台上演来，看去尚好，往往搬上银幕，由于处理不当，就失去原样，甚至面目全非。这部片子至年底摄成，自知不甚高明，一九三三年元旦，放在二轮的中央大戏院公演，颇受舆论指摘。”王人艺说：“江南巡演归来，剧社内部思想已有分歧，至“天一”拍片时斗争更加尖锐，形成了以聂耳为首的进步派与以景光为首的保守派短兵相接的局面。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和《中国歌舞短论》，首先揭起了反对黄色歌舞的大旗，引起保守派的仇视，景光即写信质问‘黑天使’，锦晖以黎莉莉的名义写文辩驳。继之景光与聂耳当面争吵，景光认为这是破坏明月社的名誉；聂耳认为剧社这样下去，没有前途。不久，聂耳便在《新闻报》上以‘因志趣不合，自愿脱离明月社’为由刊登启事，措辞还照顾了双方的

关系。”

“天一”摄片时期，我适在南京参加“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等影片上映，我才看了一下，连我这编剧的人，也看不懂影片的情节。据有人告诉我：这是由于李萍倩与邵醉翁失和，内幕究竟如何不详。

一九三三年春，几乎五分之四的社员离社他去。那时我正在专心爵士音乐，准备训练一班舞场乐队，所以对社务印象极淡。王人艺亲历其境，记得比较清楚。据他说：“当时剧社经济相当困难，业务由黎景光负责，春节前，景光洽妥丽都大戏院（现北京大戏院）公演，节目有：《泡泡舞》、《小小茉莉》、《公平交易》及王人美主演的《花生米》、《野玫瑰》等剧。售票收入不少。可是，戏演完景光带走了支票，社员拿不到场费，公推张其琴索款，两人发生争执，闹到巡捕房去。景光回来大发脾气，社员们感到无法合作，议决解散，凡是家在外地的另发路费，同时把恒德里的社址退租，明月社就散了伙。”

据我所知，散伙还有其内在因素。自“联华”、“天一”与社合作解除之后，一小部分社员即与影片公司各自挂上了钩，签订了合同，担任演员，但她们还须承担社的公演义务。同人议定：
（a）剧社演出，仍按民主评定支给场费，余款存社作基金；
（b）个人参加影片工作或灌制唱片，由社出面签约，从报酬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作为社内基金。由于经济不平衡，劳逸不均匀，产生了相互不能协调的现象，所以有条件的大多数社员脱离了明月社，加入影片公司，成为正式演员。上述景光与众争执，不过是分散的导火线。

3. 歌舞成员的新出路

明月社确为电影公司输送了不少演员。首先是这个组织来去极为自由，没有合同约束。长期培训的学员，通过舞台演出、唱片录音，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加以与两家公司拍片以后，老板感到这些社员既有歌舞的根底，又有表演的才能，比较招收试用演员来得经济方便，影片公司资金又较雄厚，因此有些成就的社员，就陆陆续续地都被吸收过去了。不过离社社员，与社的关系老是藕断丝连，找到职业就离社，失业又可回社，例如王人艺参加公共租界交响乐团，或到江西参加怒潮剧社，都是如此。

当电影演员最早的是黎明晖。她十二岁时，大中华公司导演陆洁，看到她演的《葡萄仙子》很不错，即与我商量叫她在该公司所摄由张织云主演的默片《战功》中饰一配角，月薪五十元，居然演得活泼可爱，总经理吴性裁即来谈订长期合同，月薪突加五倍到三百元，第二部片子《小厂主》即由黎明晖主演。至一九二七年止共演了《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探亲家》、《可怜的秋香》、《美人计》以及在明星公司演《新人的家庭》、在神州公司演《花好月圆》计九部片子，后来成为当时名演员之一。其次是薛玲仙，一九二八年在复旦公司拍摄了《通天河》，以后在联华公司演《南海美人》，在三一公司演《到西北去》等片。

多数人是通过演《芭蕉叶上诗》转入电影界的，如王人美先在联华公司演《野玫瑰》、《共赴国难》，被聘为正式演员后，在《都会的早晨》饰兰儿一角，表演很成功，一九三四年主演了《渔光曲》。该片于六月十四日在金城大戏院首次上演时，正是

上海六十年来未有的高达华氏一〇三.八度的盛暑，影片连映了八十四天，打破了郑正秋编的《姊妹花》（胡蝶主演）连映六十天的纪录，旋与左翼作家共同加入了电通公司，主演《风云儿女》、《自由神》以及新华公司的《壮志凌云》等片。黎莉莉于一九三二年主演《火山情血》后又演《天明》，并参加了《小玩意》的拍摄。她在联华公司六年中演了十三部片子。胡笳也于一九三二年开始拍摄电影。徐来于一九三三年进明星公司，拍有《残春》、《女儿经》等八部片子。许曼丽于同年在艺联摄有《猫山艳史》，并与王人美在亨生公司拍《春潮》。一九三四年以后，转入电影公司的人更多了，如白虹、黎明健、周璇、胡枫、张静、严斐、欧阳红樱、周曼华、李红等多人。演员中白虹、周璇不但歌唱出色，拍摄的影片也最多。白虹在九年中（一九三四—一九四五年）就主演《无花果》、《花溅泪》等十八部片子，周璇在十二年中（一九三五—一九四七年）共拍了三十二部片子，其中在《马路天使》中她所扮演的小红一角，如实暴露了旧社会妇女所受的虐待与压迫。小红的角色，无异是她自己现身说法。她出生于上海，由于家贫被父母遗弃，后为一个以洗衣为生的广东籍养母领去抚养，当她八岁时，养母想将她卖去为娼，但这时幸得养母的三妹托人介绍，把她送进了孙秩群办的歌舞团习艺。该团半年后又解散了，她即在孙家帮佣。四年中孙家连死三人，孙母迷信，怪小红“不吉利”，故由其邻居章锦文介绍到联华歌舞班来。

男社员进入电影界的有顾梦鹤、马陋芳、谭光友、谭志远等，最后的是聂耳。聂耳的历史，已有记载，不须赘述，这里仅介绍他酷爱音乐、勤学苦练的两个小故事。他选练小提琴，每天

自定练习八小时，从不间断。屋小人多，就在门边三、四尺宽的空地去练，还说：“这是我的门角落学校。”有一天，我发现他有病，体温很高，硬拉他去看医生，回来劝他休息，可是他还是把闹钟校准，到时“上课”。一次他与我谈起要研究作曲，我建议他先学注音字母，说会国语（当时他还带有昆明方言），用四十个字母，拼出四百个音，他以一个通宵突击熟记并能运用。后来为记熟五声的字，他在上衣袋里装满了自制的注音卡片，随时随地抽出来认。两天工夫，他记熟了千多个字，掌握了普通话初步基础。聂耳离社后，追求进步，曾到北平。一九三四年四月进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组织百代歌唱队，改编民间乐曲，创作革命歌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

此外，黎景光、谭光友、严励、杨枝露、王人艺等被罗海沙邀去庐山，加入了南昌行营政训处音乐股。

分散后，留下的白虹、黎明健、张静及张簧、张炫五人，仍由我负责，搬到胶州路一七〇弄的两幢房子。一幢我住，一幢算是新社址。邀来小提琴手金律声合作，暂时参加“中华”、“建光”等民营广播电台播音，为商品作广告，任何人都可以打电话到电台点唱。这样，一来不致荒疏业务，二来也可有点收入。延续一年多，流行歌曲更加泛滥了。上海《大晚报》还举办“优秀歌星选举”，结果白虹、周璇获票最多，为第一、第二名（第三名是汪曼杰（非明月社员））。周璇离了明月社与严华合组“新华歌舞团”，也仅在电台播唱。

前面曾谈及我训练一班舞场乐队（即清风舞乐队。新闻报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有清风舞乐队成立演出的报道）：那是我受杜月笙的委托，为将要开办的扬子饭店跳舞厅组织一个爵士乐队。

要求全部用本国籍的乐师，要身体高大的北方人，以免与菲律宾相混。一半乐曲用普通的外国调，一半用本国曲调。同时有一部分歌曲可供歌女演唱伴舞。随后徐来得到孙科等的捐款千余元，组织了“清风乐艺社”（徐来主办），由我聘请曹锦海为队长，张簧、张炫帮我配器抄谱。我和二张住在扬子饭店三〇一室开始着手，把所有的流行的民间歌曲和戏曲加以改编。在短期内乐队训练完成，舞厅开幕，营业很好，至于乐队的报酬由曹锦海直接与饭店经理张松涛订立合同。

因聘本国人的乐队价廉，音乐曲调又为舞客欢迎，以致各舞厅群起仿效，也有些舞厅来找我，我都尽力帮忙，介绍乐师，供给乐曲，但拒收报酬，因此到那些舞厅时，都很受他们的尊敬。

这时团体散了，负担轻了，版税收入储存不少，同时白虹、黎明健为但杜宇的上海影片公司拍摄《人间仙子》歌舞片，也是由我作曲作歌。我又为王美玉主演的《梨花夫人》作曲作歌。类似工作很多；还有为高亭、蓓开、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作曲作歌，由白虹、周璇等演唱录音，制了一批唱片。这时还有一笔意外的收入：数年前有一位姓孙的纸商，因欠货款被押，需数千元现金保才能释放。他托人找我帮忙，我筹措现金给他了了案，他临去香港之前拿出一张瑞典纸张货单，据说可抵借款数额，我还付过两次栈费。事隔多年，有位亲戚看到这货单，大为惊奇，他说：“纸价飞涨，如提出变卖，可达两万元。”于是我就请他代办。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以及从长沙商栈起，对社供给不多，我的经济非常宽裕，个人的生活也有了变化，乃于一九三五年春，搬到陈小蝶新建的弄堂花园小洋房——蝶邨十六号。一切装置家具都是新的，相当讲究，又买了钢琴和新汽车。为了取得徐来的欢心，特

别托人花了数百元购到“7272”的汽车牌照（照乐谱发音即“徐来、徐来”）。自己因无谓的应酬繁忙，无聊的人事纠缠，精神不支，有时用鸦片烟、威士忌酒刺激神经，造成浪费，损伤身体，不及一年，身心交瘁，但环境蜕变，有所警惕，终于奋力自拔，未陷沉沦。

（二）重组明月歌剧社

明月歌舞剧社因景光与社员闹意见，被拆散了。我总觉不甘心，所以当我的经济宽裕后，又看到有些社员还没有出路，于是决定由自己再筹组起来。当时有罗静华、张其琴、张其瑟、严折西、薛陶、石磊、老邝、袁大等人，都是过去的老社友。再加上正在播音的张簧、张炫、白虹、黎明健、张静五人，算是基本班底。我租下了沁园村十四号双幢房屋，在我迁入蝶村的同时，就在这里成立了“明月歌剧社”。添置了乐器，又招进一批新人。她们是：林琳瑯、张蔷薇、张帆、叶田田、方菲、游泳等十余人。并且请了菲律宾籍音乐指挥来教练乐队、请了澳大利亚的舞蹈教师来教练舞蹈。社务由我负责，专重训练，并准备编排一些歌舞剧演出。到了一九三五年秋，黎景光、王人艺、谭光友等先后从庐山回来，据说是因为受不了官场的拘束。景光与我商量，要求再回明月社。景光是亲兄弟，其余的都是老社友，自无不可。他们还带来一位鲍志超，也参加了这个新团体。景光担任剧务主任。数月来忙于排练，不能演出，也无外援，我除了负担家庭、团体开支外，还要担负“新月歌舞团”九个人的生活，因此，我又从经济极为宽裕的局面逐渐走向窘迫。不得不东挪西借了。正当此时，上海永安堂经理胡桂庚与我商量，打算组歌舞团去南

洋表演，双方即签订合同，由他先付二千元作教练费，约期三个月，如南洋之行不能实现，合同即作废，由家庭工业社陈小蝶担保。我们积极排练了新歌舞剧和儿童歌舞剧共六出。

三月后，南洋之行接洽不成而钱已用光，胡桂庚要偿还教练费。因为不是我们不能去，责任当然不在我们，他控告了陈小蝶；结果不了了之。团体现已成立，又排练多时，马上再解散，前功尽弃，未免可惜，只有我背下来。钱花光了，于是卖汽车、押钢琴，维持排练，继续撑下去。

此时，美商胜利唱片公司派潘某来接洽灌片四十张，据王人艺谈：“潘某提出要灌的唱片，除部分系旧歌如《桃花江》由英国乐队伴奏、严华、周璇合唱外，其余一律要新歌。他的选歌方法很‘别致’，不是看词或听曲，而是只捡好听的歌名，但黎老锦晖在‘九·一八’后所作的歌，有的富于爱国性，又不在洋商要求之内，应急之法，黎老就临时编造了几十个歌名，供他挑选。潘某用红笔一勾，当时决定了二十多首。灌片的时间紧迫，限一个月內交出成品，合同已签了字，为了赶时间，其中一部所谓新歌曲是在全体社员进入录音室后，黎老才在钢琴上现作曲、现写词，乐队跟着奏曲，唱的人也来不及多练，唱了几遍，马上正式录音。有的甚至唱出了错白字，唱片录好了，也无法变动，于是将错就错，只有按音改成符合词意的字，迁就错音。照这样现编、现填、现奏、现唱、现录音的东西，当然流传不广，可是明月社的难关，靠这次突击，又暂时渡过了。”

难关是过不完的，真是难为了兼管总务的张簧、张炫。遇到连大锅饭都开不出时，他们就把练习作曲的作品，检点出来通过我送到同声书店出版。每本封面还找名人题词，以广号召，前几

页放上我写的两三首旧歌，其余的都是所谓“新歌”了，甚至我在卷头上批的“80”分，也赫然印在歌本上。简谱出现了“8”音符，其荒唐可想而知。出来一本，维持几天，困难来了，再搜罗“新歌”续印，如此累计出到二十本（每本有二十一三十五首歌曲）。

我个人的版税不能预支，空头挪借伎俩已穷，负债累累，眼看着团体陷于绝境。我不忍甩手不管，只有设法早日演出，筹一笔经费，使社能维持下去。可是这时，貌合神离的小家庭，崩溃之象已趋明朗。徐来成为“明星”，交游日广，虚荣日增，年来生活刚刚称心，因受了明月社的拖累，家庭开支大受影响。徐来认为：不办社，便富裕；一办社，便穷困，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七岁的女儿又夭亡，她悲愁交并，不由不另谋出路。加以她的“秘书”张素贞（后与戴笠姘居）从中煽惑、挑拨，于是向我提出离婚。我将螺村一切物品全部赠与徐来，徐来归还明月社两千元，我拿到这笔钱，把社搬到西摩路（陕西北路）安逸坊，又招收几个新学员，严华也回了社。为了节约开支，自己与社员们同住。

黎景光改编的五幕新歌剧《桃花太子》，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借明月社成立十五周年名义，演出于金城大戏院。参加演出的有明晖、黎莉莉、白虹、黎明健等。排练、服装等费用，一部分是借款，一部分是别人投资的。合同写明：除开支外，盈余分给利润。这次售座还好，但开销巨大。例如约明晖参加演出，就要预付场费五百元，薛玲仙、严斐也得预付，只有黎莉莉完全尽义务，不收任何报酬。结果除去演员场费、戏院开支，结账后毫无节余，成本全部赔光。介绍投资者钱某约流氓多人开扬子饭店

找我谈判，欲动武逼款，饭店经理张松涛，也是流氓头子，因感我过去为其舞厅作曲之旧情，出面撑腰，训斥了那批小流氓。我为息事宁人起见，招待他们一餐，并致歉意，暂告平息。另一部分欠款四百元，直到后来陆续从我工资中拨出还清。

上海公演后，外地也知道明月社又恢复了。五月初，南京世界大戏院经理来沪，接洽前去表演，其实是清理前债。但景光已与青年公司梁锡佑洽妥再去南洋群岛巡演，并拨给一笔治装费，严华还投资五百元，他们定期七月间出发。我主张剧社约明晖到南京演几天，以便清偿债务，可是遭到景光、严华、鲍志超三人反对，并迫使明晖不去南京（明晖即提前与明星公司签约，结果未去）。最后协商：剧社由他们接办。黎景光即草拟契约稿，其中主要一条是“所有社产（服装乐器等）无偿的归明月社黎景光所有，一切债务由黎锦晖负责偿还。”以此作去京表演的交换条件，我毅然签了字，促成南京之行。五月底在世界大戏院演出了《野玫瑰》、《桃花太子》、《花生米》三个歌舞剧。这是明月社在国内演出的最后一次，场场客满，收入不少，除还了债，社员还拿到场费。

在南京，我遇到田汉，他被蒋介石软禁在城内，他看了戏，在《力报》发表一篇文章，对明月社这次表演作了批评性的鼓励。后来我到他家，他特别告诉我并拿出许多材料为根据，预言上海必将沦陷，劝我早日离开，否则必为日寇所利用，因此我决定不再回上海。

演毕，黎景光即带了剧团去上海，候轮出国。黎明健加入了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至此，我与明月社的关系完全结束，于是念着：“一轮明月下南洋，两袖清风返故乡”之句回到长沙。

注：有某歌舞团团长马亭亭，同女团员八人，到上海无法演出。因她们既无乐队，节目又很少，不能单独公演，特来找我帮助，而明月社社员又不愿她们参加我们的团体，形成进退两难。我劝他们自己把节目整理一下，将来找机会参加马戏团或魔术团合作演出，暂定名“新月歌舞团”，生活也暂由我帮助。

(三) 大中华歌舞团

我与“大中华歌舞团”名义上没有关系，也不负任何责任，但它终究是明月社的尾声，就我所知，在这里补叙大概，以做结局。

我到长沙后，王人艺、张簧回国，人艺只剩有一把小提琴，提在手里，来长沙找我。据他说：这次南洋巡演，造成明月社悲惨的结局；当初命名“大中华歌舞团”，因“中华歌舞团”过去曾留给侨胞以良好印象，现不能用原名，也要相似，争取观众。此行大致经过如下：

1.组织：团长黎景光、副团长严华。团员有白虹、张帆、张蔷薇、林琳瑯、叶田田、方菲、游泳、李白华、李白英、谭光友、王人艺、张簧、张其琴、薛涛、许拂春、高茫生、鲍志超，以及特约舞场乐师鄂达夫、韩恩泽等二十余人，（其中老社员七人）。

2.剧目：《桃花太子》、《花生米》、《野玫瑰》、《三蝴蝶》、《春天的快乐》、《最后的胜利》；还有滑稽空城计以及舞蹈、歌唱表演。

3.巡演路线：上海—香港—西贡—金边—暹罗各地—新加坡—棉兰—爪哇—巴达维亚—万隆—茂物—三宝瓏—井里汶—苏甲乌眉—泗水—巴达维亚—香港—上海。

4. 巡演时间：一九三五年七月—一九三六年五月。

这次巡回演出，沿途很不平静，团员与团长、团长与副团长吵闹不休。张其琴到新加坡即与歌舞团决裂先行返国，严华也因意见不合在曼谷自行折回。由于经常拿不到场费，乐队几次闹罢演。青年公司看此情况已知不能持续下去，不得不每次发场费。返程时到了巴达维亚，不能再去新加坡，公司给大家买好直达香港的船票，催着上船，据说，最后还欠下青年公司一千余元，团员更是两手空空了。

王孚记录
一九六五年八月

我的舞台生活（三）

袁 世 海

七年坐科生活（续）

二十六、喜武打 猜拳演戏

《取金陵》这出戏的内容是：元末，朱元璋率兵攻打金陵（南京），镇守金陵的驸马赤福寿和风吉公主虽骁勇、强悍，最后，终被朱之战将——善使暗箭的伍福打败，赤福寿自刎而亡。朱遂夺取了金陵。

赤福寿这个角色，是武二花应工，架子花兼功。一直由肖盛瑞师兄扮演。这位“驸马”勾红三块瓦脸，挂黑满（一种不露口的胡子）身着红靠，头戴扎巾额子，配上雪白的狐狸尾，手持一把大刀，看上去威武英俊。且他在剧中唱、做、念、打兼重。我改学花脸后，很快就喜欢上这出戏，曾利用演出或排戏前后的时间与高盛虹师兄打把子的机会，断断续续地学了一些武打，练了一个阶段，又向朱盛富师兄（饰风吉公主）学习。肖盛瑞师兄倒仓后不能演出，李喜义师兄给我加工排练，才得完成。

还记得第一次演出此剧，正是我头部生疮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开始，疮口只有拇指大，每天演出汗馊水洗，很快发展到头顶和后脑勺大部。花脸戴盔头，要留出勾脸的前脑门，靠后仰着

戴，所以盔头必须勒得特别紧，才能防止做动作时掉下来，待卸掉盔头，四周头皮都会被“彩条子”勒出一道深沟。且不说勒头时的疮疼，由于头上的疮，正好全闷在盔头里，疮面上刚刚结上的一层薄痂已被汗水沤掉，卸装后，黄水又流出。师兄们劝我不要洗，那时也不懂什么叫消毒，什么叫传染，我找一块破布照着镜子慢慢将黄水沾干，其痛苦难言。但因不妨碍勾脸，我一直在坚持着演出。

科班内专管剃头的韩师傅，外号“韩一刀”，见我的疮经久不愈，痛苦不堪，就对我说：“头上长疮，用刀子从根上剃一回就能好。你若是咬得住牙，我就给你治一治。”我想与其天天演出零碎着疼，还不如一气疼完算了，就同意了。韩师傅做好准备工作，拿起了剃头刀，我忽然想起大事一件，急忙请韩师傅慢下刀，我问他：“剃了疮还能勾脸吗？”

“那可不成，必须等都定好痂，才能再勾脸！”

我嗔地一下子站起来：“韩师傅，我先不治了，过几天要演《取金陵》，不能勾脸怎么能成？”

“头上的疮都这样了，你还……”韩师傅的话没说完，我已道过“麻烦”走了。

这才咬牙等到了第一次演《取金陵》。这天的勒头关，现在想起来，也还有些不寒而栗。几天来，疮的面积迅速扩大，连脑勺的底部也都有疮了，额子正搭在疮面上，赤福寿的武打多，额子勒得比以往更紧，直疼得我浑身打颤。上场后，我铆足劲头，挥舞大刀，杀“五股荡”，砍“三低面”，耍大刀下场，又唱又打，又威风，又过瘾，至于什么疼不疼的全忘了！得意之中，在打败常遇春等几员上将以后，在“望家乡”后面接快板时，勾起

了我日常生活中口吃的毛病。我小时说话很晚，说起话来还很结巴，可是犯戏瘾时不论是唱，或是念却都不结巴了。和尚大爷看我干张嘴说不出话来，经常打趣我：“你别说话啦，给我唱出来吧，我更爱听。”于是我就唱道：“四大爷，你领我去看戏……”真灵，一点都不结巴，这次胡琴过门一催我，我的破绽就露出来了。幸亏这种过门，多加个反复不要紧，总算没太露怯。第二次再演此戏，就取消了胡琴过门，在“望家乡”后面直接唱，我又好张口，听来也紧凑。

过后，我二次请韩师傅给我医治，敢情真叫恶治。他哪里是在剃疮，分明是用刀子将头皮刮下来。好疼！血水随着刀子，顺着脖子、耳朵往下流。他剃一会儿，我就得蹲在一边喘口气，歇一会儿，待疼得轻些再接着剃。“剃头”后我实在无法坚持演出了，师父让我回家休息。

母亲见我满头露肉，心疼极了，给我精心调治。疮是根治了，但头顶的大部分头发也从此被弄光了。

还说《取金陵》吧！我的演出，先生们认可了，逐渐地由我来接替演出。我对此戏越演越演不够。盛戎也很喜欢这出戏，他练会试演后，也很精采，就由我俩轮流演。双方都觉得一人演一次不解渴，总想连演几场。先生们也不太过问，只要是我俩，谁演都成。在师兄弟们的怂恿下，我们就猜拳，谁赢了谁演。谁若侥幸连演二、三回，能高兴得蹦起来，演不上的那位，只好自认晦气，眼巴巴地瞧着人家演。

想起少年时代的这段事，倒也觉得满有情趣。

盛戎后来继承发展了铜锤花脸的表演艺术，创造出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包公、姚期等等。不仅其唱腔韵味醇厚，百听不

厌，而且创造出包公踢裤、姚期闻子打死太师后心惊带动马惊等诸多优美身段，大大丰富了铜锤花脸的表演，促使铜锤花脸飞跃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这些丰功硕果，是与他具备良好的武功基础分不开的。

二十七、演“官”戏 绥远之行

一九三〇年前后，我十三岁时，傅作义组织的汉蒙联合会举行会议。富连成科班赴绥远、天津为其演出。

赴绥远省的归绥（现在改名呼和浩特）演出，生活很艰苦。我们所乘的火车是拉军用物资的铁闷子车，车厢里只有两个小窗户。我们每人将所发的一件光板羊皮袄铺在地上，大家躺在上面玩闹说笑。车厢中间放着一把大茶汤壶，几只黑皮饭碗，渴了可以喝水。在点火烧茶汤壶时，车厢里烟熏火燎，呛得我们眼泪横流，此起彼落的咳嗽声响成一片。

师父和出科的师兄们所坐的车厢比较“高级”，不受烟熏之苦，车厢四周、中间都有座位，车厢上还挂着一盏随车左右摇摆的煤油灯。别看条件不好，这可还是官方给我们派的“专列”！这辆“专列”走走停停，经常给正点火车让路，原只需二十多小时到达，结果我们坐了两天之久才到。

驻地是一所倒闭的下层妓院，每间小屋住十人。

这次演出，我的戏不多，只演《铁冠图》（《清清兵》）。当初，科班排这出戏时，为了能在台上用满文读圣旨，特意请来满清眷宿来教满语，马盛雄师兄饰演翻译，他下了不小的功夫呢！我在剧中饰演李自成。这位农民英雄当年被诬蔑为“流寇”，所勾的脸谱是一眼大、一眼小的白歪脸，在舞台上被歪曲、丑化

得十分难看。

几天后，盛戎耐不住一路的劳乏，嗓子又突然哑了，当天的《白良关》他饰演尉迟公难以胜任，只好临时抓人替演，我便又一次“毛遂自荐”。盛文哥一旁帮腔说我能成。先生和师兄弟们心里都清楚，这可不比演《珠帘寨》和《盗御马》，那虽也是临时替演，但我自己是有充分准备的。《白良关》这出铜锤戏，唱功吃重，我虽然跟着裘老先生学过，可是长时间以来没见我练过，也没排过，眼下时间很紧，过一遍以后，全凭台上见。再者，这种官戏若演砸了，得上倒好，其后果非同小可呀！人人都在为我捏着一把汗。戏又是圆满地演下来了，按我们的行话可说成“不撒汤，不露水”。

回到住所，专打台帘的一位老先生，拉着我的手，爱惜地说：“好小子，你真没白扒坏我的台帘呀！”这位老先生，性格比较古怪，不爱说话，很少见他的笑脸。他一反常态地称赞我，我反而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了。我每天演过戏后，除了练习自己的戏外，余下时间就是扒台帘看戏。花脸戏注意看，老生戏注意看，旦角戏也注意看，以至文戏武戏各个行当的主演戏，也都同样对待。只要有时间，下场门台帘的角落就是我的专座。这无形中给他的工作添了麻烦。他不高兴了，几次对我说：“你就不能找地方玩儿会儿去，怎么老站在这儿扒台帘（看戏）？你看看这里（指我用手摸台帘的地方），又黑又薄，快破了，都是你天天摸的！”我对他勉强一笑，仍硬着头皮接着下面的戏。如此这般，我看会了不少的戏，并从各行的表演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白良关》也是用这种方法不断观察、不断练习巩固的。

此后，我再扒台帘，老先生向我微笑点头，再不加阻拦了。

回京后已是年底，稍事休息，在春节期间，又为汉蒙联合会赴天津演出。剧目和绥远所演的相同。一个剧场只演两场，然后再换另一个剧场，共演七场。戏虽不多，倒也颇受欢迎。

最后一天，小份钱发下来了。时间太短钱不多，又想给家中买些年货。在街上看到有小块冻豆腐，很便宜，妈妈是很喜欢吃冻豆腐的，趁着过年，将冻豆腐放在肉里一炖，多香啊！我买了二十块。高兴地用旧报纸包好，又用绳子捆结实，回来后挂在后台角落自认为比较凉的地方。可巧这里的后台不太冷，冻豆腐放的时间又长达五、六个小时，渐渐地都化了，报纸被浸湿。止戏后我们马上就要奔火车站，忙乱中也未及细看，提着就走，天黑路长，又晒又累，边走边睡。这边走边睡的本领，并非一日之功，科班中不论是演日场、夜场，还是二十四小时连演的堂会，也不管戏园离科班远近，一律排着大队走来走去。就是在什刹海演了一天一夜的堂会也要一步步走回虎坊桥（科班地址），久经锻炼后，师兄弟们都学会了边走边睡的本领。有的师兄调皮，有意地将后面闭眼睡着还在跟着走的师兄弟往电线杆子前领，自己临时一闪身，后面的势必撞在电线杆子上，猛醒过来。直到以后，科班才在虎坊桥的“小小汽车行”租一辆“大”汽车。那车约比现在面包车大些，二十多人就满额了，我们每次必须塞进四、五十人。师兄们坐着，我们笔杆条直地站着，一下也动不得。不过就是再挤些，也比走着舒服哇！

我边走边睡地提拎着这包冻豆腐，到火车站灯光下一看，纸包底部浸湿的部分都破了，冻豆腐不见了，只剩下手中的纸绳和一部分报纸。师兄弟们见状大笑不止，搞得我啼笑皆非，垂头丧气。

二十八、再赴津 错得译名

天津春和戏院闻富社在津演出较有影响，不久便又约我们赴津演出。

我们住在离春和戏院很近的中和栈，十五个人住一间不大的房间。

这次演出的剧目较多：《群英会》、《七侠五义》、《铁冠图》、《打严嵩》、《独占花魁》等戏。参加演出的主要以“盛”字辈师兄为主，还有沈富贵、苏富恩、骆连翔、肖连芳、殷连瑞等大师兄们。当时“盛”字辈师兄的技艺已达到一定水平，演出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

就在演出进入高潮时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嗓子哑得一字不出，和我要好的师弟耿世忠很为我着急。他说：“听人讲中和栈里设的大仙堂，有求必应。咱们就到大仙堂求些灵药，赶快把嗓子治好，不然还有很多重头戏要演，怎么办？”我被他说动了心，到那里上了一柱香，求了一包灵药，其实就是一包香灰。世忠再三劝我将“药”吃下，（这也是在封建迷信的严重的影响下，我们才有此举。）过后我想起了大姐死前请巫婆一事，坚持着不肯吃，只吃了些清肺去火的药，又休息了几天，嗓子就恢复了。

一天，科班上演《七侠五义》，我饰演卢芳，刚刚勾好脸，听说后台门口有人找我，心里好生诧异。我在天津无亲无故，人生地不熟，谁能来找我呢？我慌慌张张地跑到后台门口，哟！怎么哥哥追到天津来啦！莫非家里出了事？哥哥说：“我考上日本人开设的橡胶洋行当学徒工了。他们到北京招收华工，要生活无

着落，身体结实没病的。妈嫌路远不让我来，可我找不到别的事，心里很着急，还是来了。事情来得急，妈让我抓空看看你，我得三年以后才能回家再见到你。”原来是这样，哥哥十五岁了，一直在为找工作发愁，现在有了安身之处，真替他高兴。我留他在此看戏，他说洋行管得太紧，只请了一小时假，一会儿就急急地走了。临别我将衣袋里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哥哥。

大家分了小份钱后，很想吃天津风味的小吃，恰好离春和戏院不远就是天津有名的包子铺——狗不理。那时，这个包子铺很简陋，是在一条窄小的街道上安放几张长桌，一边放着长凳。包子的价钱也很便宜，一大枚一个，可称物美价廉。每天，师兄弟们都去买着吃。有一次，演出前几个师兄弟买了包子带回后台，边说笑边吃，见我又是一人在那里通“胡子”，缝水袖忙个不停，就喊我和他们一起连吃带玩。我仍按我的老习惯，笑着摇摇头，继续干我的“工作”。忘记了是谁无意中打趣地说：“到了后台你就不说话，你快和这个包子铺的名字一样——‘狗不理’了。”逗得大家哄笑不止。由此我得了“后台的狗不理”这个不雅的花号。

前边曾提过，学生们到了后台，如同获得“解放”一般，任意说笑，只要不误场，就没人管。可是不管后台有多乱，师父一声咳嗽，后台就会马上肃静下来。我呢，从演第一出戏开始到后台就先抓紧时间做准备工作，挑选厚底，刷好大白、通胡子、缝水袖……这些事虽不是天天要做，但也算得是经常做。从而占去了我很多时间。

我演出前进了后台好像是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的原因并不只在于此，而是有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亲眼见到有的师哥在候场时贪玩耍，分散了精力，到了台上忘词、错词或是闹出大笑话，对我教育较深。

一次，饰演《审头刺汤》中下旨官的师哥下场后去说闲话，顺手将胡子摘下来，挂在玉带上，轮到又该上场了，忙乱中发觉脸上没带胡子，急匆匆地又去抄了一口带上，刚刚迈出台帘，观众见他脸上挂着胡子，腰上还挂着胡子，台下哗然大笑，他发觉闹了笑话，圣旨没读完就退回后台。

再一位是《鱼肠剑》中演专诸的师兄打完牛二被“母亲”唤下场去，本应很快就又被伍子胥唤出，他思想开了小差，忘了紧接就要上场，下意识地抬手将盔头搯了（即将盔头、水纱、彩条子全摘掉了），等到伍子胥上场叫：“专兄开门来！”这位光头的专兄才明白过来，但已无法上场，亏他急中生智，硬着头皮扒开台帘露出光头说：“请进内答话！”伍子胥见专兄如此狼狈的形象，被迫应声下场，惹得观众倒好连天，久久平静不下来。

还有一位是饰演《长坂坡》中张飞师哥的，在后台东拉西扯地谈一些其它戏的念白，上场后，精神集中不起来，在他念白时观众发出笑声，应是正常效果，并不为奇，可他的脑子一下就乱套了，本该接念“三军的！”，四下手应声“啊！”“速将桥梁拆断……”此时，他口不由己，将刚才在后台念的台词搬出来念到：“八吐噜！”这“八吐噜”是异族唤兵士的叫法，出自张飞之口就太不相宜了，偏巧二旁的四下手也是人在神不在，同声顺口答了番兵的架子“呜！”科班里有习惯，凡是需要“噎、啊、呜”等应声搭架子时，不管是在候场的，还是在化装、穿服装的，只要人在后台，都要应声高喊，这次当然毫不例外地用最大声音附和着喊了“呜！”引得台下哄堂大笑，倒彩满堂。

这几位师哥每人照挨“石板（十板）缸盖”，四下手挨了十五板。师父是讲道理的：“张飞晕场，你们四下手站在那里想些什么？要重罚，以戒下次。”

这些不该出的差错，皆因是不能安静候场进入角色引起的。戏演得越熟，临上场越是要背，否则，就容易出问题。前车之鉴不得不重视，我经常告诫自己，到后台可不能贪玩说笑，千万别出类似的问题。

再一个原因，是嗓子对我的作难。我的嗓子“不听话”，多年来，为了保养嗓子，我从不吃荤。即使这样，我的嗓子还是不断地给我来个“痰堵门”或者哑不出声。为了从多方面保护嗓子，我有意识地减少对它的“使用率”。

为此，只要整队出发，我就开始肃静，到后台化好装就往衣箱上盘腿一坐，头靠在墙上，两目双闭，一声不吱，心中默背场上的台词动作。唯恐到舞台上出差错或嗓子音不顺。谁若来找我玩，或者跟我开玩笑，我只以“摇头不算、点头算”的方式来对待。师兄弟们对此一举也奈何不得，久而久之，都知道我的“习惯”，也就不来“打扰”我了。

所以说，这个诨号虽听之不雅，倒也还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回顾几十年来的舞台生活，我基本上没出现过类似的笑话。

在津的演出即将结束，春和戏院放出了预演剧目广告牌，一个牌上写着：“下期特约马连良、麒麟童艺员合作演出”，另一块牌上写着“下期特约麒麟童、马连良艺员合作演出”。这种不分一、二排名次的写法，我没见过，它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牌上写着四天的打泡戏更不寻常，第一天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马先生饰演诸葛亮，周先生饰前鲁肃、后关羽；第二

天，是《官门带》。马先生饰唐高祖李渊，周先生饰褚遂良；第三天，是全本的《六出岐山》，马先生饰诸葛亮，周先生饰花脸角色郑伦；第四天，是全本的《火牛阵》，马先生饰田丹，周先生饰小生角色田法章。周先生既能演老生，又能演小生、花脸的角色，可谓博学。那时，我和师兄弟们天真地就戏牌上的剧目来“研究”二位前辈谁应居首位，争论了很长时间也未能排出名次。

在京剧艺术中，须生行当一向以“南麒北马”著称。现“南麒北马”同台演出，烘云托月，会有多么精采呀！我们眼睁睁地看不上，急得我坐立不安。无奈天津、北京相距二百多里，我们偷听戏的招数一点用不上，只好快快地离开了天津。

二十九、三兄弟 情真意切

盛文师兄的父亲是名武旦，长年在上海演出，去世后就安葬在上海。盛文、盛武两弟兄经孙毓堃的父亲介绍入富连成科班学戏，出科后在科班内边演出，边教学。

我改学花脸后，向盛文师兄学了很多戏，我们七八个学生在一起学，总是我和盛戎先会，演出也很露脸。盛文哥很是喜爱我俩，我和盛戎对这位师哥也是极尊重的。每天早晨，我和盛戎主动轮流为他准备好漱口水和洗脸水，他洗漱完毕，我们就给他端来刚沏好的热茶。他演出时，手表、钱都交给我保管。他该换服装了，我们会将他的靴包打开，帮他穿靴子扮戏；他需要饮场，我们给他预备好了温水；他需要擦汗，我们就将毛巾送到了他面前。多年来，我们师兄弟之间十分和睦融洽。

这年夏季，盛文师兄积攒了一笔钱，不忍让父亲做异乡孤

魂，欲将孙老先生的灵柩运回北京安葬。肖先生闻之连声夸奖盛文哥孝道，大力支持，破例地批准了盛文哥赴上海的假期。两星期后，盛文哥拍来灵柩即日到京的电报，肖先生恐他需要人手帮忙，问谁愿去接，由于盛武的戏在前边无法前去，我和盛戎应声而起。

早饭后，十点多钟，我俩直奔永定门车站（因有灵柩不能在前门车站下车）。一路上，我俩兴致勃勃，有说有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桥一带。我们都想多走一点路，到“城南游艺园”转转。因怕误了时间，没敢进去，只在外边绕着走过。这个儿时多次游玩的地方，勾起了我们多少回忆呀！

“还记得咱俩爬墙，你摔下来吗？”

“怎么不记得？那时太小了，其实没摔疼，倒是吓了一大跳。”

霎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再不是想听戏又没钱买票，只好越墙而进的两个顽童了。

“你想什么呢？”盛戎问我。

“我们都长大了！那时我们多么羡慕名角能在台上演戏，现在，我们到底也能上台演戏了。”我无限感慨地说。

“你猜我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咱们一边看戏一边吃的五香豆腐干……”。他这一提，我好似已咬了一口五香豆腐干，那香喷喷的五香汁又顺着嘴角在往下滴了。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边院墙里伸出一枝挂满青枣的枣树枝。我们俩刚才还为自己长大成人而颇感骄傲的心情顿时又消失了，只想摘几个枣来解口干之苦了。我们都有腰腿功，两下三下就站到了墙上。我放哨，他摘枣，一人装满一兜才跳下

地。急不可待地挑个大些的枣塞在嘴里。嗜！不甜、不酸、膏楞楞什么味也没有。不过，也将就着将枣边走、边嚼、边吐地都“吃”了。

我们走得浑身是汗，又热又渴，看见清凉的永定河水缓缓地流着，迅速地跑过去，脱下竹布大褂，在河边洗洗脸，洗洗脚，凉爽多了。他猛地用水撩我，我不示弱，用水回击他，好一场岸边的水战！我们真像是两只飞出笼的小鸟，玩得开心极了。

猛然，我们想起了还要去车站呢，只顾在这里玩，耽误了接盛文哥怎么办？我俩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了，撒开腿就跑。从永定河跑到火车站路程不算近呢，一会儿就跑得汗流浹背。我俩脱去了大褂，又脱去小褂，赤着膊，一口气跑到车站。还好，上海来的火车没有进站，我们这才放心地找个树荫凉，坐在地上歇息。汗落了，我劝盛戎：“快穿上衣服，免得着凉。”他也笑着说：“别光让我穿，你也得穿！要不你的嗓子又……”他说着用手揪着嗓子，张开嘴做了个表示嗓子哑了的鬼脸。

火车来了，我看见盛文哥从前边的车厢上走下来，四处张望着。车站的人很拥挤，我们跑不过去，又怕盛文哥看不到人着急，就使劲地大喊：“盛文哥！盛文哥！”我俩的大嗓门真灵，人们齐扭头看我们不说，还主动地给我们让开路，我们很快就到了盛文哥身边。盛文哥像见了久别的亲兄弟一样，用胳膊把我俩搂住：“我猜着你们准会来接我的！盛武呢？”“他有戏，肖先生让我们当全权代表。”盛文哥笑着点点头，他感到莫大的安慰。

我们帮他办好出站手续，雇好车，将灵柩抬放到车上。因盛戎要赶回广和楼演大轴子《五花洞》的包公，肖先生临来时要我

俩必须同去同回，未跟车去松柏庵下葬，就返回了。我们走了很远，盛文哥还站在那里不放心地张望着。

我俩顺着永定门、天桥、珠市口、前门回到广和楼，向师父和肖先生汇报了经过。师父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不枉养儿一场啊！盛文真是个好孩子。”

这天晚上临睡之前，盛文哥将我俩叫到他的屋子里。

“伸出手来，闭上眼睛，我给你们点东西。”我和盛戎照办了。他把几个又凉又硬的东西放在我们手上。我睁眼一看，是四枚铜子，盛戎手里三枚铜子，我们楞住了。

“这是我每天发的七枚小份钱，出科后，也一直没取消，以后就归你们每天领吧！你们每天演戏够累的，年龄也渐大了，别亏了嘴，七枚钱不好分。今天你四枚，他三枚；明天他四枚，你三枚。可不许打架啊！”

亲切的言语，深切的情意，似一股暖流温热了我们的内心。我们俩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师哥给的钱。按照他的安排，领用了好几年，直到科班内重新调整，免去出科学生的小份钱后，才算停止。

在过去的旧科班里，师兄们往往依仗自己年龄大一些，早学几年艺，对师弟很是看不起，经常随意欺侮、打骂师弟。至于占师弟的便宜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的盛文师哥呢，几年来，不仅在艺术上精心、耐心地教会了我们本领，希望我们将来在艺术上能有所作为，而且在生活上体贴、关心、爱护我们。他给我俩的这几枚铜钱，凝结着盛文师兄对我们的真诚情谊。这钱就是盛文师兄对我们的一颗火热的心哪！

三十、双淘气 师兄训弟

几天后，我和盛戎分别在《穆柯寨》中饰演焦赞、孟良。

这天的戏太长了，管事的苏先生为了不使戏太大，让我俩“马前”（即戏往前紧着演）。前边的戏结束了，苏先生一算时间，戏长的太多，决定删去《穆柯寨》的头场。

这着棋使我和盛戎都很不满意，头场是杨六郎“坐帐”，焦赞向六郎吹出“‘降龙木’在穆柯寨用脚扒拉扒拉就是一大堆，用手拢巴拢巴就是一大捆”的大话后，不得已领命去穆柯寨盗取“降龙木”。第二场孟良回令路遇焦赞，焦赞假借元帅之命，将盗取“降龙木”的将令转交孟良，孟信以为真，反请焦赞同去助力。如将头场删去，一来情节交代不清，二来焦赞对孟良的蒙骗都变成真的，戏的铺垫起伏没了，许多“包袱”相应减色，他这个孟良不好演，我这个焦赞更甭提。怎奈将令已下，我们只好遵命照演。果然这场戏没有了往日的活跃气氛，几乎吃了素（台下无效果反应）。当快要演到穆桂英和杨宗保会阵“烧山”一场时，后一出戏的演员还没来后台，苏先生怕他误场又要我们“马后”，我俩的情绪更大了，心里有点起火。临上场，盛戎偷偷告诉我：“不是要‘马后’吗？咱们使劲地多烧烧！”我会意地笑了。

往日孟良用火葫芦放火后，穆桂英用分火扇将火扇向焦、孟，二人慌忙躲闪，扑打向自己烧来的火焰。演时，孟良扑火，焦赞遂转身钻到桌下躲藏，露出一条腿。孟发现，揪焦腿，焦出扑火，孟又钻桌下，焦又将孟揪出，反复三番，示意身边火被扑灭，显得精疲力竭，同时坐在地上高低声轮流呼叫“咳哟！”接

着无可奈何地站起身来回营交令。这回可好，他将我拉出来，他钻桌下，我又将他拉出来，我钻进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我俩那时都有点人缘，观众见我们特别“卖力”感到有趣，鼓掌叫好。这出乎意外的效果，更“刺激”了我们的“表演激情”，越发上劲，演个没完，真成了“扑不灭的火焰”。台下观众喝彩声、鼓掌声，与舞台上配合我们动作的“乱锤”声混为一体，震动了整个广和楼。

后台无事的师兄弟扒开台帘，见状跟着捧腹大笑。苏先生初还以为要我们“马后”多加一番动作，后越听越觉不对碴儿。

“乱锤”打个没完，台上、台下、后台一片沸腾，急去扒开台帘，看见我们正在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扑火”，打鼓的刘富溪师兄一眼瞥见，见势不好，警告我们“收了吧，收了吧！”我们已狂热到极点，哪顾得了许多。苏先生不看则已，一看十分恼火，揪着台帘，跺脚冲我们高喊：“你们还完得了完不了啦？都给我滚下来！”

火算是让苏先生给扑灭了。

止戏后，苏先生严厉地指责我们。盛戎依旧用他那惯用的憋声憋气的语调反问：“您不是让我们‘马后’吗？”

“让你们‘马后’就没给没完，只两、三分钟的戏，唱涨出一刻多钟来，太不像话了！回去告诉你们盛文师哥，好好地管教管教！”

苏先生若在后台打我们的板子，他是完全有权力的，为什么偏要再去告诉盛文师哥来管我们呢？这也是老先生平日比较喜欢我俩，再者台下得的是正好，不是倒好，不忍加罚罢了。我们很放心，盛文哥绝不会打我们板子。

晚饭后，盛文哥将我俩找去先问明原委，然后说：“吃饭时苏先生和我讲了，要让我管管你们，我听了这话很难过。打你们吧？舍不得；不打你们，你们今天的事做得很不好！苏先生让‘马前’，删了头场。后又让‘马后’，都是有原因的，是为了全场戏演得别撒汤漏水，我若是管苏先生的这份事，我也得这样办，有什么不应该呢？你们的戏不好演，也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无论怎么说，也不能在舞台上起哄、开搅，这是多坏的毛病呀！你看，咱们科班的马师兄，论条件，论嗓子，既能文，又能武，各方面都很好，就因为养成了开搅的习惯，他自己不知不觉地就将戏给搅乱了，闹得哪个班社都不敢用他。难道你们要学他吗？”盛文哥说到这里顿了顿，指着我说：“你不是着迷地学郝先生吗？你看过他不少的戏，什么时候见他在舞台上开搅？哪场戏不是在认真、严肃地演？这是艺术，你们懂吗？不能糟蹋艺术！”他又指着盛戎接着说：“还有你爸爸，裘先生，在咱们这儿串演《白良关》，隔着两出戏就提前将头勒上，为什么呢？怕误场，怕戏演不好，怕不尽责任。你继承父业，这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咱们侯大师兄，在这方面都是让我们佩服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要知道，现在广和楼的观众都知道，富连成科班有两个好花脸：一个‘铜锤’，一个‘架子’。你们千万要珍惜这种荣誉，要学真本事，走正路，我想你们心里会明白的。”

这番苦口婆心的劝导，既有批评，又有鼓励，直说得我俩痛哭流涕，真比打我们十板还起作用。从此我开始懂得怎样才是真正热爱我们自己的艺术。我和盛戎齐声表示，决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在不讲说服教育的年代，盛文哥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非浅，我们的感情也更加深了。

这几件往事回忆起来，犹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激动着我的心。几十年来，我们虽都忙于自己的工作，但我们都十分珍重这青少年时代所留下的珍贵友谊。不断地互相联系，探讨艺术表演的问题。特别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我和盛戎多次聚会探讨“铜锤”和“架子”的表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自身难保，但还在互相打听对方的消息。我刚获“解放”，盛文哥就派孩子来向我祝贺，盛戎还带着毕英奇亲到我家来看望。几天后，我也到他家去拜望。我和他的住处虽然相离得越来越远，关系反觉更亲近了。谁知盛戎不幸患了癌症，我去医院探望他，竟成永诀。他过早地离开我们，至今已有十年啦！幸而他培养了众多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最近又看了盛戎之子——少戎的演出，可喜裘门有后，甚感欣慰。盛戎若活着看到今天，他该有多高兴呀！盛文哥解放后一直在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突患冠心病也去世了。就在我接到戏曲学校的通知，赶去医院探望的前十几天，他还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将《青梅煮酒论英雄》整理排演，并且说这是郝老师的独创，曹操的表演吃重，表演艺术很高，若不整理演出，就要失传于后人了。实难料到，不几天就传来了盛文哥病逝的噩耗。此次谈话是盛文哥对我最后的嘱托和希望，最后的叮咛和要求。

盛文哥！我的好师哥！好老师！安息吧！

盛戎兄！我的好师哥！好伙伴！安息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的友谊，你们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继续去努力奋斗！

思念旧日之情，不禁潸潸泪下，只有落笔成文，以寄托我对你们永久的哀思和悼念！

三十一、蒙指点 巧演伊立

夏去秋来，富连成科班为富商刘家演堂会。按照一般的惯例，主家要额外约请名角来串演一出或几出精采的剧目。这天的堂会循例约请了马连良(字温如)先生外串《黄金台》。

马先生此时已名噪南北了，他是怎样一举成名的呢？

李华亭先生(解放前天津中国大戏院的经理、邀角人)向我介绍过。马先生出科后，曾在名旦朱琴心先生班社演出。那年，李华亭先生邀请朱、马二位先生在天津北洋大戏院演出，合同只定了五天五场。第二天的剧目是《阴阳河》。朱先生主演的旦角是个鬼魂。马先生饰演王茂生，这是二路老生的应工。演出中朱先生挑着水桶——两个纸扎的蜡烛灯笼在舞台上走花梆子步，在做翻身、转身等较复杂的身段动作时，偶有不慎，蜡灯点燃了耳鬓所系的两条纸穗(鬼魂都有此装扮)。朱先生脸部烧伤，住医院治疗。后三场戏怎么办？钱已收下，不能再退，辍演观众更不会接受。剧团管事陈春玲、蔡荣贵两位先生已看出马先生的艺术光彩，在这为难之时大胆提议，将第三天的《审头刺汤》改成从《一捧雪》演起，马先生主演前莫成、后陆邴。李华亭先生别无良策，只好同意。临时约请了年青程派旦角陈丽芳饰演雪艳。贴出“朱琴心老板因病不能演出，改为马连良老板加演《一捧雪》连演《审头刺汤》”的告牌。出乎意外的是本来票座卖得并不算太好，改戏之后，反而卖了满堂。紧接第四天马先生又主演《打渔杀家》、《王佐断臂》两出；第五天主演拿手戏《借东风》。几天来，连演连满，声震天津。

回京后，马先生筹备自立班社。他自出科后，曾每日凌晨，

月色尚朦胧即挑灯去天坛一带喊嗓、背戏，经常与郝寿臣老师不期而遇。二位先生在艺术上互相切磋，彼此信任。此时，马先生欲与郝老师合作排演生、净并重的对儿戏。按照戏班的老规矩，净行的名次要排在生、旦之后。如果马先生与郝老师并排合作，一些较有名气的旦角、武生是不肯将名次排在花脸后边的。马先生不受陈规陋习的束缚，破例地约请了年青有为的旦角王幼卿先生和青年武生吴彦衡先生，以便和郝老师合作。又约请了久与余叔岩合作的钱金福、王长林前辈，来陪衬演出，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由此足见前辈们千方百计提高艺术质量的一番苦心。这正是我向吴彦衡先生学《南阳关》的后期。我有幸看了他们班社的很多戏，打泡在庆乐园，《失、空、斩》、《定军山》、《问樵闹府》、《打棍出箱》、《阳平关》、《连营寨》等，剧目丰富多彩。马先生与郝老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观众大加赞赏。至此仅几年时间，马先生便独树一帜，跃为名须生，成为富连成科班毕业的最响名的一位了。

这天演堂会，马、郝二位分手，郝老师和高庆奎先生合作。马先生约请刘砚亭先生饰演太监伊立。刘先生晚七时要赶到吉祥园饰演《吕布与貂蝉》中的董卓（杜丽云主演貂蝉），故预先订好的《黄金台》最迟下午六小时前结束。刘先生很早就来到后台化装，等待演出。无奈本家的主要客人未到。《黄》剧一再“马后”（即往后拖延时间），推至六点还迟迟不能上演。刘先生见时间紧迫，找到马先生的管事蔡荣贵先生说明原因，蔡先生也毫无办法，刘先生只好卸装告辞。

这场“小动乱”我在后台听得真真切切，心中似有预感，会不会让我们学生临时替演伊立呢？当时科班只有我演“伊立”。

想到此，我不由自主地迅速默默背诵着伊立的台词。果真不出所料，功夫不大，我就被师父叫到后台的帐桌前：

“伊立的戏你忘没忘？”

“没忘！”

“好！先去找你师哥对对戏，词背熟一点，别砸锅，就勾脸吧！”最后，师父点头叮嘱我。

《黄金台》是全本《火牛阵》中一折，写列国时代齐国宦官伊立为篡夺王位，勾结邹妃谋害东宫世子田法章。田出逃，至县官田丹府中，田丹见义勇为，将世子男扮女装，佯装自己的女儿。伊立前来追查，搜府未获，落空而回的一段情节。

对戏过程中，按马先生对此剧的演法，伊立念到“咱家我就要……”时随着“大大八仓仓另仓”款“夺头”的锣经，伊立拔出半截宝剑，脚蹬椅子，威逼着田丹亮相，再接念“搜哇！”不想马先生在舞台上所用的座椅垫比科班的椅垫高得多，我的个子矮，脚蹬上去既吃力，亮相又不太漂亮，我只好不蹬。

“停！这里一定要蹬椅子，伊立蛮横无礼的神气才足。”他边说边看。

“椅垫高，你个子矮不好蹬……”他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吧，我给你配合好，在你抬腿时我略一欠身，你赶快用脚轻推一下椅垫，将脚蹬在椅面边上，就可以了。”我们试验一回，满行。有了这个俏头，可方便多啦！马先生这种统筹全局，想方设法搞好角色之间的配合，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戏开演了，当演到“搜府”时，“急急风”中校尉过场后，伊立上场，竟来了个嫩声嫩气矮人一头的小演员与已负盛名的马

先生配戏。观众初觉诧异，随着我认真严肃地紧密配合，观众倒也觉得这场戏别有风味。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而且，最后“四击头”亮相下场，观众一直用热烈的掌声将我欢送到后台。

台下，一位马迷冯某人（他从学生时代就学马派，不能唱，只能教。是马先生家的座上客。）戏结束，他就到后台，将还没来得及卸脸的我，叫到马先生的化装室，拍手说：“温如！咳！他一上场我就愣了，我明明看见刘先生已扮好了‘伊立’，却突然换了个孩子上台，他万一晕场（指舞台经验不足、发慌、出差错）岂不把戏全搅了，没想到还真……”他笑着拍我的肩膀顿了一下，“还真不错，放得开。您瞧他最后下场的‘三笑’和‘小踩泥’多像郝爷（当时大家对郝老师的称呼）！”

的确，戏中伊立的神气、念白的语气，连同最后狂笑下场时射雁式的身段，都是仿效郝老师的，在私下练得有了把握，今儿借机会全盘托出。

“你十几岁了？”马先生洗过脸，回身热忱地问我。

“十四岁。”

“还有几年出科？”

“三年多。”

听此话，他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三年……等不……”随后对我说：“你快去卸脸吧，今儿辛苦了！”

卸完脸，我又被师父叫去，帐桌前的场面使我感到新奇，马先生居然坐在桌前长凳上，与坐在桌子对面长凳上的师父和肖先生讲话。这是绝无前例的。就是喜字辈大师哥也要毕恭毕敬，垂手直立地与师父讲话，足见师父对马先生的喜爱。

“把你师哥给你的点心钱拿走。”师父指着帐桌上，蔡管事

刚送来的一个红封纸包。

“以后有时间，你师哥准备给你们排全本的《火牛阵》。”师父高兴，话也比往日说得多。噢！原来他们在商谈给我们排戏的事情。

我再次道谢后，转身返回化妆室，见红封里面是四块大洋，心里更加美滋滋。

几天后，我将钱如数交给母亲，母亲欢喜非常，不过只拿走三块。我们母子推让了半天，她还是将那一块大洋强塞在我衣兜里，嘱咐我买些可口的东西吃，补养补养身体。这一块钱，约合四十吊钱，我哪里舍得花这么多钱呢！我考虑了几天，才决定和盛利师兄一起出去吃顿饭。为了使嗓子不生痰，盛利兄提议去李铁拐斜街的“两宜轩”回民饭馆吃牛羊肉。那天我俩人没戏，请假出来。说来也真巧，我们刚一进门，就看见马先生在正厅摆了几桌酒席待客，我们行过见面礼，去到后面小间里坐下点菜。跑堂的李瑞师傅招待我们，向我们推荐“清炒虾仁”，盛利用脚在桌下使劲踢我，暗示要。我听师兄们讲过这种菜很贵，惟恐钱不够，没敢应声。只要了一个“烩银丝”（烩肚丝）和一个“卤拌粉皮”，几张家常饼，共用九角多，连买碗汤的钱都没有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较好的饭馆吃饭。正吃得高兴，马先生的管事陈信亭先生在门口掀起帘子和我们笑着打招呼，我们应声问好，他就回身走了，我们也没介意。一会儿刘瑞师傅进来说：“你们二位的饭钱，马老板候了（代付了）。”盛利一听后悔得直拍大腿：“你看，听我的多好，蹦到嘴的虾仁让你给放走了！”我也略觉可惜，转想，好饭菜吃了，钱还能给母亲交回，心里特别高兴。

师父和肖先生对我们排全本的《火牛阵》一剧很重视。特意集中“优势兵力”：盛藻哥演田丹，盛兰饰世子田法章，陈盛昆饰荫小姐，刘盛莲饰丫环，我还饰伊立，孙盛武饰衙役，叶盛章饰齐湣王，全是当时科班的尖子，搭配得非常整齐。很快发下总讲（剧本），每人抄单词。盛藻到马先生家里去学唱和动作。他兴奋地悄悄向我称赞马先生：“师哥真不错，一句一句地教，一点儿不含糊。”之后，马先生又抽出时间来科班负责合排。排到《花园》一场，马先生介绍说，原来这场戏是世子扮成女装由田丹府中逃出闯入荫丞相府中花园的十几分钟的过场戏。后来，在天津与周信芳先生合演此剧，周先生饰世子，将这场戏大加丰富，女装的世子与荫府小姐结拜为异姓姐妹，后吐真情，订下婚姻。增加了不少唱段，将十几分钟的过场戏发展成四十多分钟唱、做、念兼重的重点场子，让盛兰就按这个路子排演，并将其中的表演详细地教给了盛兰。我心中愈加为当初在天津没能看到他们合作的精采演出而惋惜。

至于《搜府》一场，马先生没给排，他指着我对盛藻说：“他和我演过了，你自己和他排排就行了。”过后我在排练中又向盛藻哥述说了上次和马先生同台演出的一些体会。如：伊立威胁着要搜府，田丹先是一惊，马上想到世子已“变”成自己的女儿，还怕他搜不成。立时镇静下来说：“请搜！”这个微妙的思想变化，就在大锣一击的瞬间完成。马先生表演得真切、细腻，我协助盛藻哥将这些较细微的表演加进去。

此剧演出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连演数十场，盛况空前。

《文化史料》第一辑至第三辑目录

第一辑

- 花虽凋谢，卖花声将永留人间
.....陈叔通
往事追忆——记砚秋生平...果素璞
师事程门记.....赵荣琛
难忘的回忆——记程砚秋与周
总理、任弼时的初次会见
.....王吟秋
徐悲鸿的少年时代.....廖静文
回忆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
.....黄警顽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回
忆我的父亲欧阳予倩...欧阳敬如
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何秀君
回忆母亲白玉霜.....李再雯
铁马响叮当.....常书鸿

第二辑

- 柳亚子及其革命诗文.....陆丹林
邹韬奋的早年生活.....沈粹蓂
谈南社.....黄娄生
延安新秧歌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
.....李焕之
艺坛生活漫忆.....王人美

- 赵丹在新疆狱中.....方未艾
我和《流民图》.....蒋兆和
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朱蔚柏
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黄警顽
回忆我的伯父胡也频烈士...胡少璋
我的舞台生活（一）.....袁世海
回忆解放前的天津《益世报》
.....《益世报》专题小组

第三辑

- 追忆朱自清.....陈竹隐
反对军阀的进步报人林白水
.....张次溪
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张琦翔
五四时期的长沙周南女校
.....全国妇联妇运史室
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黄炯华
旧南开中学办学的一些作法
.....杨志行
我和明月社（上）.....黎锦晖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一）...刘开渠
铁马响叮当——敦煌的春天
.....常书鸿
我的舞台生活（二）.....袁世海

《文化史料》第五辑篇目预告

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

拓者萧友梅先生……………廖辅叔
回忆我的叔父萧友梅……………萧淑贤
忆黎锦熙先生……………贺澹江
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吴作人
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
战斗友情……………田海男
张大千的生平和艺术……………黄苗子
当代著名画家张大千……………杨继仁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

和高剑文……………黎葛民 麦汉永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朱 侠
漫谈胡适……………高一涵
关于胡适的二三事……………洪静渊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下）
……………清华大学校史组
相声的起源……………张寿巨
五十年曲艺生活的回忆……………张寿巨
我的舞台生活（四）……………袁世海

附 告

由于发行工作中的问题，有不少读者买不到《文化史料》。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文史资料出版社青年服务社代办函购业务，凡需要购买《文化史料》第一、二、三、四辑的读者，可径向该社订购。该社地址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社青年服务社。